

2935
copy 2

AV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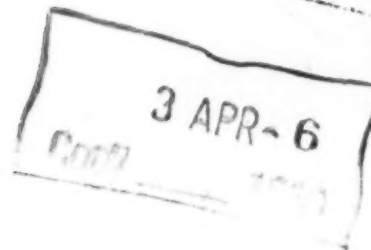
-7 AUG 1956

歷史教學

Li-shih

~~Yen-chia~~
chia-hsueh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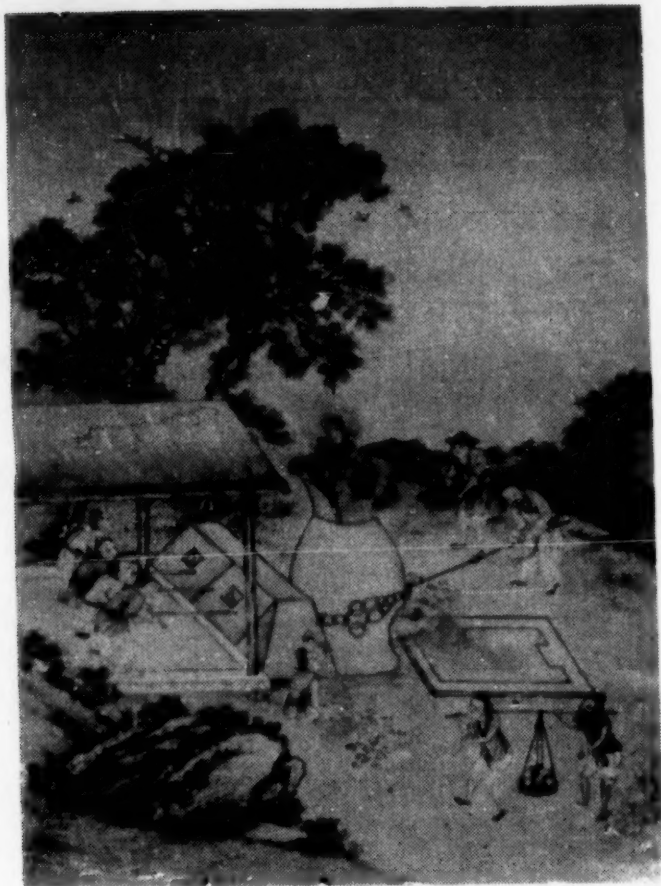


1956

中國歷史參考圖片(十七)

元 陳椿 熬波圖

公元1330年作，清画院摹永乐大典本。采自吉石庵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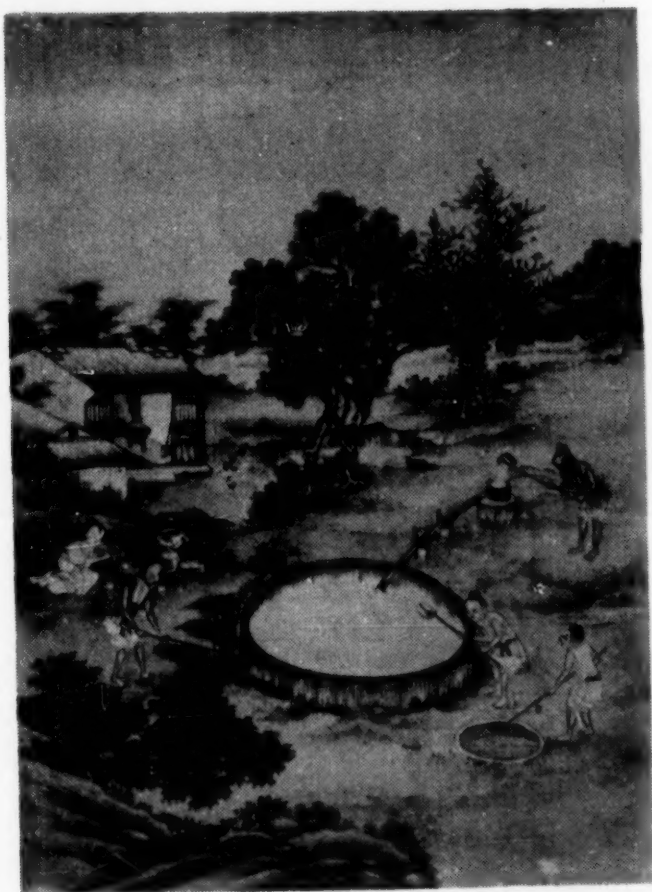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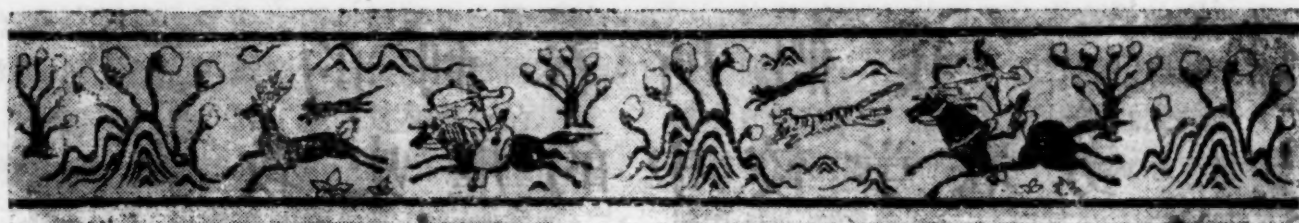
圖一 鑄造鐵桿

从这幅圖画里可以看到十四世紀的冶鐵爐和人力鼓風箱。必須指明，这里画的只是一种臨時性質的冶鑄工場，当时正規的冶鑄工場有許多都在使用水排（見王禎農書）。

圖二 上瀉煎鹽

这是十四世紀江浙一帶煮海為鹽的生產情况。作者有兩句詩：“人面如灰汗如血，終朝徹夜不得歇”，說出了制鹽者的辛苦。





我們所看到的苏联学校中的歷史教学.....中小学教师訪苏代表团(2)

教 学 参 考

宋代城市經濟概况.....程溯洛(12)

天地会.....蔡孟源(17)

太平天国的茶絲輸出貿易.....〔英國〕伶 俐(18)

我國的土地改革与党的土地政策.....宋祝勤(21)

法國的胡格諾战争.....楊宗遂(27)

第一次俄國革命和亞洲的覺醒.....N.M.列伊斯涅(34)

理論學習与學術思想討論·批判

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續二).....梁寒冰(42)

圖 片 · 地 圖

中國歷史参考圖片(十七)、世界歷史参考圖片(四).....(封里,封底里)

世界歷史参考地圖(十三、十四).....(51)

問 題 解 答

1. 屈原的故鄉是哪兒?.....孙作云(55)

2. 南宋的車船和海船桅杆的裝置及使用如何?.....程溯洛(55)

3. 人类文明的發源地为什么都在河流旁边土地肥沃的地方?.....華 明(55)

4. 希臘人从何时并怎样移入古代希臘地区的? 最早的城市國家斯巴达和雅典
各在什么时候形成的?.....華 明(56)

歷史教學

· 月 刊 ·

一九五六年五月号

(总第65期)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歷史教學月刊
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錦州道六号)

發行者 郵電部天津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局
代售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印刷者 天津印刷一厂

定價每册 0.28元

預定價目

三个月三期 0.84元
半年六期 1.68元
全年十二期 3.36元

本期印数 38,100

我們所看到的 苏联学校中的歷史教学

中小学教师訪苏代表团

我們在苏联与俄罗斯联邦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國教育部歷史教学法專家柯·伊·阿他安得烏諾娃同志談話和在莫斯科204、315、711、列寧格勒321、基輔136等中学听歷史課及与歷史教师談話，他們認為，使學生獲得系統的、巩固的歷史知識，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進行工作。

一、教师遵循教学大綱的要求，掌握教材的中心思想，有重点地处理教材，生动地進行講述

1. 教师于課前深刻地分析、研究教材，找出教材的最基本的問題。

怎样找出教材的最基本的問題呢？苏联歷史教师認為：

(1) 先熟習教学大綱，按教学大綱的要求返復地熟習教材。因为在歷史教学大綱內已經規定了給予學生的知識範圍。因此，教师在备課时，一定要緊緊依据教学大綱。教师处理教材时，按照教学大綱的要求來考慮教科書上的材料，哪些是主要的应告知學生，哪些是次要的材料可略提一下，或者不向學生交代。如果教师把教科書上的材料不分輕重地照樣复述一遍，不僅時間不允許，而重要的是使學生对主要問題不能很好地掌握，反而加重了負擔。

如列寧格勒321中学歷史教师安娜·維克多列芙娜同志說，她今年第一次教十年級的“苏联現代史”，因此，很費時間，每天都需要三小时來备課。先看歷史教学大綱，根据教学大綱的要求來返復熟習教科書中的材料，研究課文內容，甚至于逐段、逐句地咀嚼、分析教材，掌握本教材的中心思想，明确哪些是要教給學生的基本問題，哪些是次要的材料；对那些學生難懂的材料也把它找出來。

(2) 备課时还要閱讀有关的参考材料。

苏联歷史教师認為，这是为了更進一步掌握教材的中心內容、中心思想。如閱讀“教学法参考書”（有关部分）、教师進修学院的教材等；搜集報紙、雜誌上刊登的有关文章，因为報紙、雜誌上的文章，往往都是比較新的材料，如果报刊上的材料正是教学上所需要的，便把它摘錄下來或剪下來，以备教学用。其次，苏联歷史教师还經常閱讀些歷史文选和文学作品。他們說，課本上的材料虽然是系統的、問題虽然是明确的，但是，一般地还是死板些，帶有綱要性，是精鍊的东西。教师用死的、旧的材料講課，就不会生动。对自己沒兴趣，对別人就更不会有兴趣。因此，教师应不断地搜集新鮮材料來丰富教学內容。根据教学目的采用些文藝性的典型的歷史材料，來充分說明教材的重点問題，使死的歷史材料复活。这样，學生会更容易地理解和掌握教材的內容。

高年級根据教材內容的需要可应用馬克思列寧主义著作。如講世界近代史“科学共產主义誕生”，教师一定要看“共產党宣言”；講“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教师一定要看“联共（布）党史簡明教程”或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在高年級講課可以適當地引用馬克思列寧主义著作中的原句。但，在低年級引用馬克思列寧主义著作語錄时，一定要把它通俗化。在低年級講課更需要注意文藝性的材料。

苏联歷史教师一般地有几个筆記本，看到報紙、雜誌、文学作品、歷史文选上有关的材料，便把它摘錄下來，分类別地保存，以备教学时采用。

2. 教师在課堂上不是照教本材料一模一樣平鋪直叙地講；按教学大綱的要求，在教材的基本問題上着重地闡述。

如在莫斯科 204 中學所聽的歷史教師高拉斯考娃·波拉斯考維婭·彼得洛芙娜同志十年級“蘇聯現代史”課，便是這樣進行的。

題目：“俄國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這是第二課時）。提問兩個問題後便開始講新課。

教師：“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結果，產生了雙重政權，雙重政權的實質就是我們這堂課要研究的主要問題。”

接着，教師敘述工兵蘇維埃政府的誕生。

教師：“蘇維埃政府在二月革命初期便開始成立。它是工人代表、士兵代表——也就是被動員而穿上軍服的農民，所組成的。因此，這實際上就是工農的政權……”“當時人民是相信蘇維埃的。……雖然在彼得堡的蘇維埃政權亦為孟什維克所掌握，但在人民壓力之下，不得不實行些革命性措施……”

教師又敘述臨時政府的成立。先敘述三月一日晚杜馬會議，接着指出：“三月二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瞞着布爾什維克，暗地跟資產階級和地主黨派協議組成了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主要由沙皇尼古拉二世預定充任的內閣總理李沃夫來領導。另有米留可夫，他是‘立憲民主黨’人，還有其他資產階級和地主的代表參加。克倫斯基作為社會革命黨人代表參加了臨時政府。”

教師讓學生打開教科書念“三月一日晚杜馬會議”一段課文。而後提出結論性問題：“你們看這個政府是什麼樣的政府？”學生回答了這個問題。

教師又用列寧著“雙重政權”一文來闡述雙重政權的實質（念文章中有關部分）。

教師再度提出：“誰再說一說工農蘇維埃和臨時政府的階級成份？”“那末，雙重政權的階級實質何在？”學生明確地作出了結論。

教師引用了列寧的原話重復下結論：“列寧說，工農蘇維埃是巴黎公社的形式”；“臨時政府是‘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化的地主’代表組成的政權”。

從上述可以看出，蘇聯歷史教師的課堂教學，不是重復講述教本上所有的材料，而是着重闡述教材中的重點問題。

3 蘇聯歷史教師很注意教學的直觀性。

他們說：不放棄一切可能利用直觀教具的機會，哪怕是一点点的。利用直觀教具，可以啓發學生積極思維，避免機械地記憶史料，并使聽覺記憶與視覺記憶結合起來，對鞏固學生歷史知識是有重要意義的。

為保證教學的高度直觀性，按教學大綱題目的需要并結合學生年齡特征，蘇聯學校購置了全套歷史直觀教具，包括：歷史地圖、圖片、掛圖、幻燈片、影片……。更重要的是，蘇聯歷史教師在實際教學中，發揮了創造性的勞動，制作教具——地圖、掛圖、表格、立體模型等，在教學中加以應用。如莫斯科 315 中學歷史教師制作的教具：

模型：“埃及金字塔”，“人面獅身像”，“埃及吊杆打水”，照達·芬奇的設計制造的“橋、旋床和印刷機”，“中世紀的水輪”，“中世紀的堡壘”，“卡羅林王朝莊園”等。

平面掛圖：“阿基米德之死”，“波斯武士、戰車”，“武裝的象”，“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起義奴隸”，“哥里格利第七”，“貞德率法軍奪取奧爾良城”，“胡司運動者在行軍、在打仗、在野營”，“達·芬奇像”，“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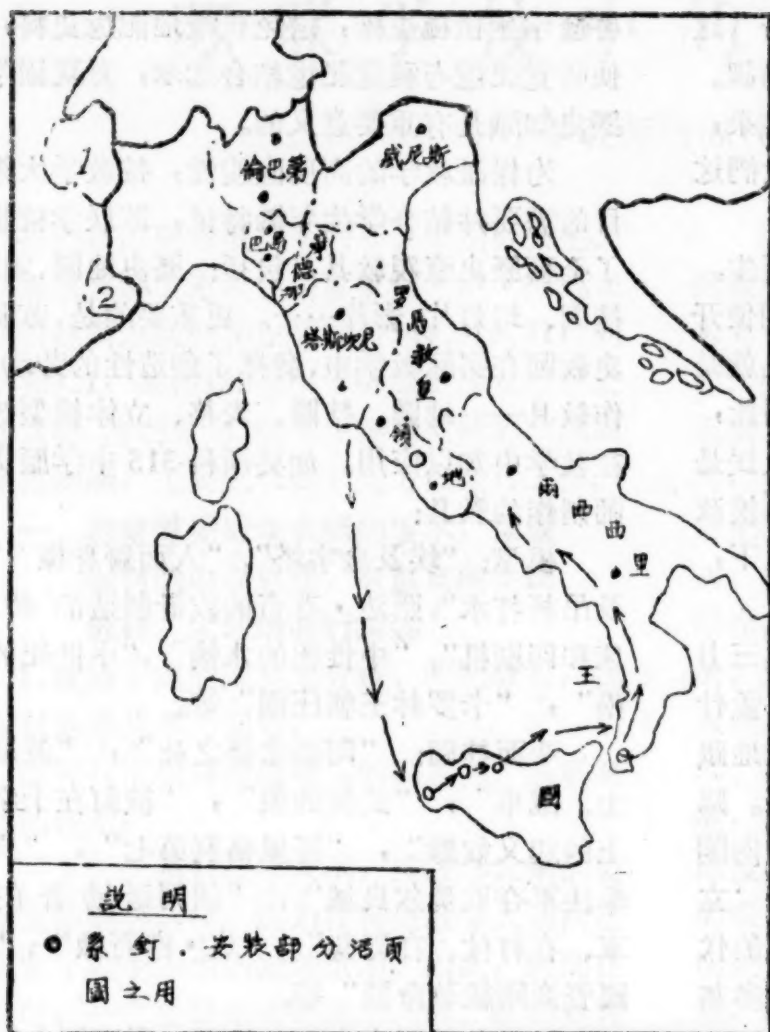
關於蘇聯歷史方面的模型、平面圖，制作得更多。如 315 中學一位歷史教師講“偉大衛國戰爭”一單元教材時，創制了“偉大衛國戰爭”全套歷史地圖。此圖經過蘇聯教學法研究所的研究和教育部審查批准，已在全蘇各中學廣泛採用。我們的課本亦採用了此圖。

當然，為了說明問題，我們只列舉了 315 中學歷史教師制作教具的一小部分材料，關於他們創造的全部教具，並沒有一一介紹。

蘇聯歷史教師在教學中除利用上述的平面圖、模型外，還經常利用小黑板進行直觀教學，把數字、表格、圖像、新課提綱寫在小黑板上演示。

同時，還運用“活動平面圖”。如新西伯利亞 36 中學歷史教師，講“胡司戰爭”時，利用活動“胡司運動戰役圖”；講“意大利統一”時，利用了如下的“意大利統一”活頁圖。

統一前的意大利



此圖要用木膠合板制成。紅点(•)处安設小釘
以備安裝部分活頁圖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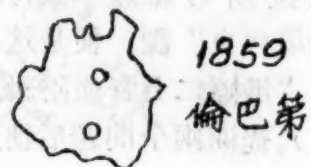
活頁部分 說明

活頁部分，要用較厚的木板作成（各活頁圖板厚度要相等），活頁圖板中間鑽兩孔（兩孔与全圖上的兩釘的位置要相等），以便往全圖的釘上安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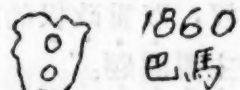
教師講意大利統一过程时，随課文內容、時間順序运用活頁部分（往全圖上安裝）。待教材講完，活頁圖全部安裝在全圖上，意大利統一完成。

（見下圖）

活頁部分



1859
倫巴第



1860
巴馬



1860
摩德那



1860
塔斯坎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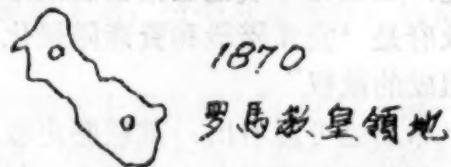


1860
羅馬教皇領地

1860
兩西西里



1866
威尼希



1870
羅馬教皇領地

意大利統一圖



其次，蘇聯歷史教師很注意講課的語言的直觀性。

用形象化的語言和充沛的感情來感染學生，這對學生獲得鞏固的歷史知識也是不可缺少的。他們說，因為用枯燥的語氣，刻板式的講話，學生不會感興趣；並只使其機械地記憶些史料，不能透徹地掌握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當然，要做到這點，是和充分備課、鑽研教材、不斷吸收新材料豐富教學內容分不開的。

如莫斯科315中學七年級歷史教師E·M·馬爾高斯同志講“十三——十四世紀的捷克”一課教材時，除用了“十三、四世紀歐洲歷史地圖”和“胡司在康士坦司宗教會議上的發言”圖畫外，他還用生動形象的語言和充沛的感情敘述了以胡司為首的捷克人民反對德國人的鬥爭。如教師說：“在宗教會議上，當胡司獲得發言機會時，他作了非常動人的演說。胡司最後說，‘假若有人能夠叫我相信我真正走上了歧途，並且可以說出我的錯誤在哪兒，那

末，我就可以承認我的錯誤。你們並不是強叫我來的，是我自己願意來的；假如我拒絕來的話，那沒有人能夠強迫我這樣作。’”教師又說：“最後的結局完全依賴于西吉斯孟皇帝，但，西吉斯孟是哪種人？馬克思稱之為：‘挺笨的壞傢伙，值得可憐的寄生蟲，放蕩不羈的酒鬼，胆怯的乞丐。’西吉斯孟把最後的結局依靠教會，不敢自己決定。西吉斯孟長嘯短嘆，他的紅色的臉忽然變白，眼睛恍惚，好像在找誰或者覺得自己正在造孽。陪胡司一同來的一個貴族發言：‘所有羅馬天主教是一群可惡的醉鬼，不要臉的壞蛋和傻子。賣贖罪券的牧師到捷克後遭到人民的憤恨，把贖罪券燒掉，叫那些牧師滾出去。胡司被叫到這兒來，假如你們繼續折磨他，或把他弄死的話，我代表我們的皇帝和一切捷克人發誓：捷克人將要替他向教堂、修道院和牧師報仇！誰有耳朵來听听，讓他聽到這些。生命和自由屬於胡司。’胡司被判決不出血的死刑。……在剛剛生起火的時候，胡司大聲喊出：‘為了我寫的、我教的、我宣傳的真理，為了它，今天我很高興地死去。’”

教師很生動、形象地刻畫了以胡司為首的捷克人反對德國人和教會的英勇鬥爭精神，也描述出了西吉斯孟皇帝的懦弱及其和教會一起陷害胡司的形象。

這樣生動地講述對學生獲得鞏固的歷史知識是很重要的。

4. 蘇聯歷史教師很注意學生記憶主要的歷史年代、人名、地名。

這是歷史課特點之一。蘇聯歷史教師一般地對這項工作是這樣做的。教師講課時，要講、給學生最主要的年代、人名、地名。哪些是主要年代？這些主要年代，已在歷史教科書後面有所規定。並根據教學目的來選定這一課教材中，哪些是主要的年代、人名、地名，哪些是次要的。這是必須讓學生記憶的。主要地名要在歷史地圖上特別圈出來，講課時指點給學生。主要年代、人名、地名，講課時一定要寫在黑板上，並用色粉筆區別開；次要的不

寫在黑板上，也不要求學生記憶。學生在課後，要按教師指出的主要年代、人名、地名進行復習。

這樣做一方面教師對學生要求明確；另一方面使學生視覺與聽覺記憶結合起來，對鞏固學生歷史知識是必要的。

二、教師對主要的歷史知識要經常地、系統地進行復習

1. 最經常的和系統的形式，是講新課前的提問。

我們在列寧格勒 321 中學和歷史教師安娜·維克多列芙娜等同志談話，她們認為講新課前的提問，是鞏固學生歷史知識的形式中最經常的和系統的形式。她們說，如果教師不經常提問學生，他們的知識就不會鞏固。提問的重要意義，就在使學生徹底了解史實的重要概念和思想，可以鞏固所掌握的史實，並培養學生運用知識的熟練技巧。當然，也幫助教師了解學生，檢查自己的工作。

提問要做充分的準備和有明確的目的性。提問時，不允許倉促想出來和偶然想起來的問題。因此，教師準備提問時，應當像準備講述新教材一樣的認真和細心，準備提問的問題，要有目的性。教師要想：哪些史實的基本概念及基本問題的思想，須再使學生在腦海中重現一遍；哪些主要人名、年代、術語……讓學生特別牢固地記憶起來。

提問時應遵循這樣的原則：提問問題的擬定，要根據學生的年齡特徵。提問高年級學生的問題，可以大些；而低年級要把大問題分成幾部分來提問。提問時，教師不應該也不可能把講過的教材不分輕重地都來提問學生，而是要提問教材中最主要部分。提問時要注意問題與新教材之間的密切聯繫，以構成知識的系統。

如安娜·維克多列芙娜同志在講“蘇維埃政權勝利前進”一課時，提問了三個問題。這三個問題是：（1）蘇維埃政權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最初的幾項措施；（2）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與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決議的比較；（3）蘇維埃民族政策原則在哪

個文件中宣布的以及這些原則的實質。她說，所以要提問這三個問題，是在課前經過充分考慮的。第一，這三個問題是過去幾個課時教材中最主要的部分，必須讓學生牢固地掌握；第二，這三個問題與本課教材有密切聯繫，因為這節要講“蘇維埃政權的擴展與鞏固”、“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可以在復習鞏固舊材料的基礎上，啟發學生獲得新知識。

同時，教師還要不斷地提問舊材料。如俄羅斯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部歷史教學法專家柯·伊·阿他安得烏諾娃同志說，一位好的教師一定經常提問講過的歷史材料。不好的教師往往只提問前課剛剛講的材料。如果教師不斷提問學生講過的知識，那末，學生也會不斷地復習講過的知識。當然，提問舊材料時，要注意與新教材的銜接。如講“十六世紀的英國”時，便可以提問“十二、三世紀的英國”。

提問的方式很多。不過，我們在蘇聯通過聽歷史課和歷史教師談話時，他們一般地採用兩種提問方式。最主要的是採用“口頭提問”，這是在課堂上組織集體復習的較好的方法。與“口頭提問”同時，教師給兩三個學生出些作業，讓他們在黑板上做。如在列寧格勒 321 中學聽安娜·維克多列芙娜同志歷史課時，她提問第一個問題的同時，讓另一個學生在黑板上寫出“第一次與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決議的比較”提綱。使用黑板提問能在較短時間內讓學生掌握歷史重大問題，並具有直觀性。

2. 有效地利用復習課，來鞏固學生歷史知識。

蘇聯歷史教師除注意提問和當堂鞏固外，還用相當多的時間來復習已學過的教材，如單元復習課、期末總結復習課。而在十年級歷史課復習的時間尤多。在教學大綱中規定，十年級歷史課授課時數為 132 小時，除講新課用 102 小時外（包括單元復習的時間），尚有 30 小時復習八——十年級的歷史知識。

（1）單元復習課，即一個單元教材講完後，用一個或幾個課時來復習。復習前，教師要把復習計劃（幾個問題）告知學生，以便進

行准备。更重要的，是教师不要也不可能把一單元教材所有的問題，都拿來复習。要复習教材中的最主要的或基本的問題。如歷史教學法專家柯·伊·阿他安得烏諾娃同志說，講“1848年歐洲國家的革命運動”用了七小時，用一個課時來复習。因此，在這一單元教材中應擬定以下幾個基本問題：

- ① 1848—49年法、德、奧革命有何區別？
- ② 1848年法、德、奧國革命最重要事件？
- ③ 為什麼說無產階級在1848年革命中是唯一的革命階級？
- ④ 資產階級在1848年革命中的反動作用？
- ⑤ 農民在1848年革命中的作用？
- ⑥ 1848年革命時，馬克思、恩格斯的活動？
- ⑦ 1848年法、德、奧革命的結果？

又如在基輔136中學，听过一節十年級歷史复習課。題目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準備和進行”。這一單元教材，按教學大綱規定講19小時，但教師用了一課時复習課把它复習完了。她擬定了以下幾個基本問題：

- ① 武裝起義的準備及黨的作用？
- ② 彼得堡武裝起義怎樣進行的？
- ③ 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哪些法令？
- ④ 蘇維埃國家的組織？
- ⑤ 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世界歷史意義？

這節复習課是很成功的。用該校校長的話說：“問題組織的很好，是單元教材中讓學生掌握的幾個基本問題。每答完一個問題後，教師都作了結論；思想性很強，強調了黨及列寧、斯大林和群眾在革命中的作用，也聯系了當前政治實際；組織教學工作做的很好，教師不只注意回答問題的學生，也注意組織其他學生的活動。中間不斷提出啟發性的問題問其他學生……。”

（2）期末總結复習課。即在期末用幾個課時，复習本學期學過的主要的歷史知識。莫斯科315中學歷史教師格·伽·格里加拉也芙娜同志說，复習時要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注意知識的系統性。如世界史一學

期講過好幾個國家，為使歷史知識系統化，最好以每個國家為單位來复習，把前後講過的材料連貫起來。如复習完“十二、三世紀的法國”時，便接着复習“十四、五世紀的法國”材料。复習完“十二、三世紀的英國”時，便接着复習“十四、五、六世紀的英國”材料。這樣使一個國家前後講過的材料能連起來。

第二，注意歷史事實內在橫的聯系，指出在同一个時間內各個國家史實異同之點。如“歐洲封建君主統一國家的形成”，法國由於城市和商業的發展，要求建立統一國家；俄國由於農業和手工業及商業逐漸發展起來，便造成了統一的條件。這是法、俄建立統一國家的經濟上共同之點。然而，俄國為抵抗蒙古人侵略而造成的團結又加速了國家統一。這是俄國與法國不同之處。

總之，蘇聯歷史教師很重視通過复習課來鞏固學生歷史知識。

三、啟發學生積極思維，對所學的資料進行獨立思考，引導學生自作知識結論

蘇聯歷史教師認為，學習是學生緊張的創造性的勞動，因此教師不應該把嚼爛了的东西給學生，這樣做學生便不去動腦筋了。只有經過學生自己深思熟慮的知識，才是鞏固的。所以，啟發學生積極思維，是當堂消化知識的一種很好的方法。怎樣啟發學生積極思維？莫斯科315中學歷史教師格·伽·格里加拉也芙娜同志說，啟發學生積極思維，應預先給學生一個可供思維和作出結論的前提——先敘述具體材料，教師不作出結論。如講“捷克反對德國的鬥爭”時，教師敘述：“封建主和城市貴族多數是德國人。他們盤據的教會有大量的財產，對捷克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故捷克的勞動人民很仇恨教會。而捷克許多貧窮騎士，看到德國人和天主教有錢有勢，又妒忌又憤恨。城市的商人大作坊主，對德國貴族把持城市政權亦很不滿。甚至於部分捷克大封建主對德國人和天主教的專橫亦有些憎恨。”之後，教師便引導學生作結論：“捷克反對德國人和天主教的鬥

爭乃是全民性的运动。”

莫斯科 204 中学高拉斯考娃·波拉斯考維婭·彼得洛芙娜同志在十一月三日講“俄國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教材时，她亦采用了先叙述具体教材，引導学生作出知識結論的啓發学生思維的方法。但同时，她还采用了另一啓發的方法——在旧知識的基础上，引導学生作出新知識結論。如她講“二月革命初期便成立了工兵苏維埃政权，可是在政权中占多数的是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但教师并不直接指出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政权中占多数的原因，而是向学生提問講过的材料：“这是为什么？这时布尔什維克党的主要領導者都在哪里？”学生：“这是因为当时布尔什維克忙于領導人民斗争；大战期間工人死的很多，小商人、富農、農民都变成工人，故工人階級成份有些改变，孟什維克依靠了他們；这时列寧在國外，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被流放在西伯利亞，有的同志被关在牢內……”教师：“对了，这就是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工兵苏維埃政权中占了多数的原因。”

总之，教师用巧妙的方法啓發学生積極思維，誘導学生作出知識結論，是使学生獲得巩固的歷史知識的重要条件。

四、歷史課家庭作業，在巩固学生歷史知識上也是重要的一环

苏联歷史教师每講完一節課，都要留家庭作業，即本課的習題。这个習題就是教材的基本內容，学生在家里以此來复習和准备回答教师提問。

教师每次布置家庭作業时，都要作充分的講解。如十一月十四日在列寧格勒 321 中学听安娜·維克多列芙娜同志講“苏維埃政权勝利前進”一課时，她用了五分鐘布置家庭作業。教师对每个家庭作業問題內容，都作了較詳細的說明。并指出：看教科書 187——191 頁。同时，也告訴学生教科書上哪些材料可以不看等等。

其次，結合学生年齡特征，依据教材內容，在高年級还可以適當布置些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文章，讓学生在家里閱讀，并把文章內容

綱要寫在作業本上，教师是要檢查的。如莫斯科 204 中学歷史教师講“俄國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时，布置家庭作業是：1. “双重政权的產生及其階級實質？”2. 閱讀“列寧論双重政权”一文，并寫出文章內容綱要。

另外，某段教材結束后，可以適当地做些書面作業。低年級学生繪制平面圖或添歷史地圖上的地名，作年表等；高年級学生对主要歷史事实作出各种表格等，如封建社会階級等級表、經濟發展数字表等。

五、歷史課的課外、校外活动，在巩固学生歷史知識上的意义

1. 歷史課外讀物：

在苏联与歷史教学法專家及歷史教师談話时，他們說，为了巩固学生在課堂上学得的歷史知識和擴大学生新知識領域，教师適当地介紹些歷史課外讀物是必要的。如低年級學習古代、中世世界史，可以介紹些通俗讀物：“埃及人的生活”、“公的出現”、“窩特·台勒尔的起义”、“頓河的基米特里”等。高年級學習近代史，可以介紹这样的作品：“彼得一世”、“青年近衛軍”等等；講“科学共產主义的誕生”可以建議学生看“共產党宣言”的主要部分。

介紹課外讀物时，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齡特征和結合教学大綱的內容來作这一工作。并且，只是建議学生看这些讀物，不是硬行規定，不要加重学生的負擔。介紹讀物时，教师事先应向学生說明讀物的主要內容和中心思想；学生閱讀时，教师要指導他們讀書方法及寫讀書心得等。

2. 歷史課外活动小組：

在苏联和几个学校歷史教师談話时，他們都提到歷史課外活动小組在巩固学生歷史知識上的重要性。他們說，組織歷史課外活动小組的目的，就在于巩固学生在課堂上獲得的歷史知識和擴大学生歷史知識領域，培养他們研究歷史知識的兴趣。这些是要通过歷史課外活动小組多方面的活动內容及多种多样的活动方法来實現的（詳見課外活动小組材料）。

3. 歷史晚会：

蘇聯學校很注意定期舉行歷史晚會。他們說，定期舉行歷史晚會的主要目的，在於鞏固學生在課堂上學得的知識。結合歷史課學習內容，一年可舉行三——四次歷史晚會。

晚會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

(1)綜合性題目的晚會。如他們曾舉行過這樣題目的晚會：“偉大的俄羅斯人民的歷史”(高年級學生舉行的)。內容從第一次衛國戰爭談起——和波蘭人、瑞典人的戰爭。搜集有關的歷史歌曲、詩篇、畫片、掛圖、名人畫、口號、幻燈片等，在會上朗讀或演示。並有一專人搜集史料，在晚會上作報告。

(2)革命歌詞晚會。主要唱各個歷史階段的革命歌曲，包括：古代俄國士兵的歌，革命戰士歌，內戰及衛國戰爭時的歌，直到現在的歌曲。演習前由一個人介紹歌詞及時代背景。

(3)專題歷史晚會。如“普加喬夫農民起義”晚會。在教師指導下，學生準備、搜集有關材料，在會上來敘述“普加喬夫農民起義”的故事。同時，也有當時革命歌曲、詩等。又如“1905年第一次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五十周年紀念”晚會。這個晚會在兩個月前便開始了準備，會上除唱歌、朗讀詩、表演文娛節目外，還請參加1905年革命的老戰士作報告。

歷史晚會除個別的以外，一般是以學年班級為單位來舉行。晚會的全部過程，都是在教師指導下進行的。

4. 歷史課校外參觀：

蘇聯學校歷史教師認為，組織歷史課校外參觀，是鞏固學生歷史知識的重要方法之一。

怎樣組織歷史課校外參觀？他們說，首先明確參觀的目的，通過參觀鞏固學生在課堂上獲得的知識和豐富學生新的知識領域。其次，參觀的內容是根據教學大綱題目來決定的。如講完“古代中國”，一定領學生去參觀歷史博物館中的“中國藝術館”部分；講完“埃及、古希臘”後一定要領學生參觀歷史博物館中的“古埃及、希臘”館部分；講完“基輔俄羅斯”時，在基輔的學校一定要帶學生參觀“老基輔城”等。

另外，參觀組織可分為二：一是以歷史課外活動小組學生為主，吸收其他學生參加，這

主要是由歷史課外活動小組主持的。除了學習目的外，有時還專為了搜集些材料，以便準備在課外小組內作報告或制作教具。一是講完某段教材後，組織全班性學生參觀。參觀時一般的不分組，必要時分兩組。參觀的解說員由歷史教師本人擔任。因為教師可以結合教學大綱的要求，有目的地進行講解，這樣做可以加深鞏固學生在課堂上獲得的知識。因此，要求教師在參觀前先到歷史博物館熟習一下要參觀的內容。

參觀後要通過各種形式來鞏固參觀的收穫和談談參觀的感想。如利用教育課時間或在課外活動小組會上，談談參觀的感想。在家庭作業或口頭回答提問時，結合教材內容可以應用參觀獲得的材料。

學期中間到本市歷史博物館或參觀附近的名勝古迹。

假期可以到較遠的地方如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等地方去參觀。

附件 1. 歷史教學小組工作

在莫斯科204、315、711、列寧格勒321、基輔136中學和歷史教學組長談話時，關於歷史教學小組工作，他們提到以下幾個問題：

一、歷史教學小組的工作任務

蘇聯歷史教師認為，歷史教學小組的工作任務，應該是：1. 提高歷史教師的教學業務水平；2. 總結與交流歷史教學經驗；3. 幫助新教師。所有這些都在於使課達到較高的水平，不使有一節質量不高的課，保證學生獲得系統的、鞏固的歷史知識。

他們說，過去他們有過偏差，歷史教學小組着重了理論性問題的研究，忽視了教學實際問題，這是不對的。因此，當時同志們感到理論研究，固然很好，但是，不能解決教學法上的具體問題。現在他們糾正了這一傾向。

二、怎樣提高教師的教學業務水平

一般地他們是這樣做的。小組會每月一至二次，充分發揮小組會的效能。在教學法小組會上討論兩種性質的專題。

一是教學法專題。即討論指導性的教學法

書籍、報紙、雜誌（“學校歷史教學”）等刊登的先進歷史教學經驗文章。如“歷史課堂類型”、“歷史教學中如何運用直觀教具”、“怎樣上談話課”等。集體閱讀文件，但，有一個教師負責搜集材料，在教學法小組會上報告。

同時，在教學小組會上，還討論組內在教學法上存在的具體問題。如“檢查歷史課的課時計劃”、“低年級歷史課成績考核問題”等。

另外，討論帶有歷史理論性質的專題。如“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生產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怎樣評價歷史人物”等。閱讀有關歷史文件，結合自己教學實際進行討論。

當然，示範教學（組內公開教學）及組內教師互相聽課，對提高教師的教學水平，也是良好的方法。（下面詳述）

三、怎樣總結與交流歷史教學經驗

主要從以下三方面進行這一工作。

1. 小組內公開教學——觀摩教學。組內公開教學次數並不多，每學季只有一次，一般是由教學經驗較豐富的教師擔任，因為組內公開教學是帶有示範性質的。通過觀摩教學總結豐富的教學經驗，借以提高其他教師的教學水平。

觀摩教學的準備工作是很重要的。如基輔136中學歷史教學小組於十月份舉行過“1812年衛國戰爭”一課時的觀摩教學。教師事先把觀摩教學課的題目和詳細提綱提到校長處審閱批准。然後，在教學小組長幫助下，鑽研該課時教材，搜集材料，組織初步的課時計劃。課時計劃要在講課前兩周提出，並在教學小組會上經過全組教師共同討論、修改通過後才得上課。觀摩教學時，組內全體教師參加，其他組的教師也可以參加。課後要評議，對該課進行分析，肯定優點，也指出不足之處。

2. 小組內教師互相聽課。學校規定每個教師聽課的時數。聽課時，要有目的與計劃性，並作充分準備，如看教學大綱、教科書等等。有時，甚至於幾個教師聯合一起去聽。

聽課後要及時個別交換意見。在學期中間，還利用教學法小組會專門討論互相聽課問題，會上把發現的先進教學經驗肯定下來，對

教學中缺點，加以分析，商定改進辦法。

3. 教學經驗總結專題。蘇聯學校教師很重視自己教學經驗總結工作。因此每個教師在開學初都要選定自己總結經驗的專題，如“怎樣進行提問？”“如何運用直觀教具？”“如何上總結復習課？”“在歷史課中如何利用鄉土志進行教學？”“怎樣吸收社會主義建設新材料進行學習？”……教師選定總結專題後，在這一學期中便有意識地進行準備，可以縝密研究有關自己選定題目的參考書和文章；並利用自己教學經驗，和視察一些教師的實際工作經驗，把這些帶有理論性的和實際的材料搜集在一起，加以概括、總結。

專題經驗總結，利用下一學期的教學法小組會上報告討論，把優良的經驗在教學小組內推廣，應用於教學實踐中去；同時，也可以在報刊上發表。如莫斯科315中學歷史教師，在教學中創造了“偉大衛國戰爭”全套歷史地圖，總結了這個經驗，得到教育部批准，在全蘇各中學廣泛應用此圖。我國高中“蘇聯現代史”第五章亦採用了此圖。

蘇聯學校對教師教學經驗的處理是很重視的，除在教學小組會報告討論外，還把各個教師總結經驗陳設在學校教學法資料室內。優秀的教學經驗可以在每年“八月教師會議”上報告。（區舉行的）

四、怎樣幫助新教師

組織教學經驗較豐富的或教過這科的教師，和新教師一起共同備課。如研究教學大綱、教科書、組織課時計劃等。一般是他們找出一個固定時間，在一起共同研究，把一周的課都备好。同時，老教師經常聽新教師的課（一節課或一個單元的），聽後對該課加以分析，進行具體幫助。

新教師在教學法上的具體問題，虛心地請教老教師，如歷史課成績考核、家庭作業、考試題、提問等；新教師有目的有計劃地聽老教師的課，如具體學習怎樣組織課堂教學和運用直觀教具、如何富於感情地講述等。

五、其他

苏联学校歷史教學小組，通过組織學生課外、校外活動，來巩固學生歷史知識，也作了許多工作。如組織學生參觀歷史博物館、名勝古迹……組織教師指導課外活動小組，幫助學校籌備全校性歷史晚會等等。

附件2. 歷史課外活動小組

苏联学校對歷史課外活動小組，像其它科課外活動小組一樣，是很重視的。

怎樣組織歷史課外活動小組？我們在苏联所接觸的幾個學校是這樣做的：

首先，要明確組織歷史課外活動小組的目的：（1）巩固學生在課堂上獲得的歷史知識；（2）加深和擴大學生歷史知識的領域；（3）竭力培養學生研究歷史知識的興趣。

其次，歷史課外活動小組的組織和活動的原則是：（1）根據學生的年齡特征，按年級組織。因為學生的年齡特征不同，因此學習內容及興趣也不一樣；（2）只有各科成績都及格的学生才能參加活動小組。並且對歷史科有興趣，自願參加；（3）活動內容要依據教學大綱、教科書的範圍。因為課外活動小組活動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學生歷史知識，並在這個基礎上擴大學生新的知識領域。

另外，歷史課外活動小組的活動內容是多方面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如：

參觀：參觀歷史博物館、革命博物館、画廊、名勝古迹等。參觀的人以參加課外活動小組學生為主，可以吸收其它學生參加。參觀時，要做簡單的筆記，如果可能的話，對某些實物可以用照像機照下來；參觀后要總結，在歷史課外活動小組會上談談參觀的收穫及感想，必要時，可以出刊小型板報。

出板報：主要配合慶祝有歷史意義的紀念日，如“第一次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五十周年紀念”，“烏克蘭與俄羅斯合併三百周年紀念”等等。歷史課外活動小組的學生，在歷史教師指導下，搜集有關歷史資料、圖片……進行展覽或出刊板報。

朗讀會和報告會：五、六年級學生很喜歡閱讀歷史文藝性作品及通俗歷史讀物。結合教學大綱題目的範圍，組織學生活動。如學習古代世界史，組織他們閱讀“史前時期一個孩子歷險記”、“埃及孩子的一天”，“中國火藥”、“中國指南針的發明”等。而後，在歷史課外活動小組會上，以幾個問題為中心，進行漫談、討論或講故事。同時，對某些歷史文獻如歷史詩、歌等，還採取了朗讀的形式。學生非常有興趣。

高年級學生可以組織專題報告會。結合教材的範圍，題由學生自己選定。如莫斯科204、315中學高年級學生曾舉行過“納希莫夫海軍大將”等題目的報告會。同時，配合節日高年級學生還給低年級學生作報告。如，他們舉行過“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烏克蘭與俄羅斯合併”等題目報告會。

組織歷史文藝性作品朗讀會和專題報告會時，要作充分準備，歷史教師要作具體指導，指定學生參考書或文件，幫助他們搜集和組織材料。

也可以和“名人見面”，如請參加“1905年革命”的老戰士報告等。

演示幻燈、電影：主要配合課堂教學，利用課外活動小組活動時間來進行這項工作。如學完“古埃及”、“古中國”便放映“古埃及”、“古中國”的幻燈片，講完“希臘”、“羅馬”時，便放映“希臘”、“羅馬”的幻燈片等。同時，還放映有關影片。放映幻燈、影片時，不只歷史課外活動小組學生參加，也要吸收其他學生參加。演示時，教師對幻燈片內容要結合課堂教材作適當的解說。

此外，歷史課外活動小組也可適當地幫助教師製造些教具。如莫斯科315中學歷史課外活動小組學生——低年級部分，在教師指導下，製造了“埃及金字塔”、“人面獅身像”、“吊杆打水”等模型。學習“中世史”組織學生制作“卡羅林王朝莊園”模型及繪制平面圖等。高年級學生繪制平面歷史圖、抽象的數字表格等。製造教具時，由教師選定題材及設計，

（下轉20頁）

教 学 参 考

宋代城市经济概况

程 溯 洛

一 宋代城市经济发达概述

宋代城市经济有很大的发展。

从全国商税收入来看：北宋至道（995—998）、景德（1004—1008）年间，每年商税收入在四百万贯以上，天禧五年（1021—1022）时岁收一千二百多万贯，庆曆（1041—1049）年间增加到二千二百多万贯^①。宋以前（例如唐代）的商税没有这样多。

从市场等级来看：北宋时第一等市场有三处，成都、兴元和汴京，每年商税收入，成都八十九万多贯，兴元和汴京各超过四十万贯。第二等市场五处，遂州（四川遂宁）、彭州（四川彭县）、梓州（四川梓潼）、蜀州（四川崇庆）和永康军（四川灌县），每年商税各在二十万贯以上。第三等市场（十万贯以上）凡二十一处，除寿州（安徽寿春）、杭州、开封府外，其余大部也在四川境内。第四等市场（年收商税五万贯以上）凡十三处，除东南的扬州、真州（江苏仪征）、庐州（安徽合肥）、苏州外，其余在今湖北的有蕲州（蕲春）、施州（恩施），在陕西的有西京（西安）、洋州（洋县），在陕西的还有兴州（略阳），在四川的有达州（达县），在四川的还有四处，资州（资中）、涪州（重庆）、普州（安岳）和昌州（大足）^②。南宋时，经济重心南移，重要城市偏在两浙、四川、江南与广南等路，商税详情，已无所知；试举鄂州（武昌）、岳州（岳阳）、汉阳三个城市为例，淳熙五年（1178）时，三处所收的“上供”钱同绍兴九年（1139）

额数相比，鄂州从一万九千多缗增到十二万九千多缗，岳州从五千多缗增到四万二千多缗，汉阳从三千多缗增到二万二千多缗，他处可以想见。

从沿海对外贸易城市来看：宋代海外贸易发达，沿海对外贸易城市设“市舶司”来管理。“市舶司”从唐中叶开始，初仅设广州一地，到宋代则设有下列八处出海口：（一）广州，设于开宝四年（971），（二）杭州，设于端拱二年（989），（三）明州（今浙江宁波），设于咸平二年（999），（四）泉州，设于元祐二年（1087），（五）密州（今胶州湾），设于元祐三年（1088），（六）秀州（今松江），设于宣和元年（1119），（七）温州，设于绍兴二年（1132），（八）江阴（常州），设于绍兴十六年（1146）以前主要出口品为布帛、瓷器、金银铅锡及缗钱，主要进口品为香药、蕃布、木料、珍宝及铁。市舶税率虽不大，仅值十抽一，但因政府独占，所以利益甚大，如熙宁九年（1076），仅杭、明、广三处市舶司，收净利三十多万缗^③，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时据提举两浙市舶张闳的报告，“（两浙、闽、广）三（市）舶司，岁抽及和买约可得二百万缗”^④，可见增加甚

①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续通鑑長編卷九七，太平治蹟統類卷二九，东征集卷二四，玉海卷一八五，宋会要稿食货五六。

② 宋会要稿食货十五至十七。

③ 参见宋史卷一六八及藤田丰八的考证。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繫年要錄卷一八三。

多。按南宋初年的歲收，“東南歲入不滿千萬”^①，紹興二十九年時，“經制錢、總制錢之收入，約當常賦之半，為千五百万”^②，可見那時歲入漸增至三千万。可知當時市舶司的收入二百萬緡，約當當時歲收額的十五分之一，在全國財政收入上，實占一個重要的比例。

從城市人口來看：北宋時全國都市人口在二十萬以上的，有長沙、汴京、京兆府（西安）、杭州、福州、泉州等六處^③。南宋時，都市人口集中程度遠超過北宋，如杭州在乾道時（1165—1173）戶二十六萬多，淳祐時（1241—1252）三十八萬多，咸淳時（1265—1274）增到三十九萬多^④。

從城市商業的規模來看：北宋時都市商業繁盛，規模超越前代，如孟元老描寫首都汴京城內有許多大街，街上酒店“彩樓相對，綉旛相招，掩翳天日”；金銀彩帛店“屋子雄壯，門口廣闊”，“每一交易，動即千萬”；有些樓店“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綉額，燈燭晃耀”^⑤。現傳宋代畫家張擇端畫的“清明上河圖”，就是北宋首都繁華情況很好的寫照。到了南宋，因為江南經濟的發達，城市商業比北宋時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如吳自牧描寫行都杭州“大街……中心，……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紛紜無數。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如遇買賣，動以萬計”。大街坊巷中“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空虛之屋”。耐得翁也寫過當時杭州的市容說，“自大內和寧門外，……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其夜市……與日間無異。”^⑥

最後，從城市中手工業的情況來看：北宋城市中手工業作坊（又稱“作”或“行”、“鋪”）分工很細，趨向專業化，如“東京夢華錄”（卷二、四）中所寫，當時京城內手工業作坊有金銀鋪、肉餅店、包子鋪。餅店中又分油餅店、胡餅店。從“北去楊樓以北，穿馬行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皆工作伎巧所居”一段，可見手工業人數之多。從“凡餅店……

每案用三五人，按劑、卓花、入爐，自五更，卓案之聲，遠近相聞。唯武成王廟前海州張家，皇建院前鄭家最盛，有五十餘爐”一段，可見不但制餅分工有“按劑”、“卓花”、“入爐”三個程序，而且一個制餅店“有五十餘爐”，已具手工業工廠的規模。“蜀錦譜序”載北宋成都織錦院中“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十一，所織之錦，總為六百九十四”，可見工場規模之大與分工之細。“夢梁錄”（卷十三）中記南宋杭州城內手工業作坊的分工更詳，如所舉有方梳行、銷金行、冠子行、散兒行（鑽珠子）、雙錢行（做靴鞋）、碾玉作、篋刀作、腰帶作、鋪翠作、標梢作、油作、木作、磚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釘鉸作、箍桶作、裁縫作等。

二 宋代城市經濟發達的原因

宋代城市經濟的發達是繼承了以前時期的發展，同時也是宋代生產發展的直接結果。宋代城市經濟較之以前時期更為發達，如在唐代時，大城市只有長安、揚州等地，而在宋代則發達的城市就開始遍于各地（見上節）了。宋代城市經濟的發達，約可分為下列幾個原因。

（一）由於農業的發展，農產品的銷售需要市場，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北宋統一以後不久，一方面因各地農民生產經驗的交流，新的生產工具“踏犁”的普遍應用，耐寒的外國占城稻種的輸入，另一方面也因統治階級對於農民的讓步，施行墾地免租獎勵的辦法，生產力得到很大的發展，到天聖年間（1023—1033）以後，宋史（卷一七八）稱“天下生齒日益蕃，辟田益廣”，熙寧年間（1068—1077）全國墾田達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因土地的開辟，生產的增加，鄉村市鎮的交易行

①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四。

② 要錄卷一八三紹興二十九年七月條。

③ 元丰九域志卷一、五、六、九。

④ 見乾道臨安志、淳祐臨安志及咸淳臨安志，轉引自我部靜雄：宋代財政史頁四六。

⑤ 東京夢華錄卷二。

⑥ 夢梁錄卷十三。

为也跟着發展起来，如熙寧十年时京东路青州諸六縣四鎮，每鎮每年商稅少的四百多貫，多的一千多貫，每縣多的有五千多貫，州城即达四万多貫^①，可見宋代城市經濟的集中。更重要的是：北宋建國，削弱地方節鎮，集重兵于首都，因此汴京需要鄉村糧食的供应特別迫切，在“漕運東南，廣儲軍食”的命令之下，当时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兩浙路等六路，每年約有六百万石的米粮由各路轉運使分別運送到真、揚、楚（江苏淮安）、泗（安徽泗縣）等州的倉庫中再行北運；同时淮南沿海出產的鹽也先集中在真州再運往江南、荆湖及兩浙等路的城市。当日南方各地的農產品，除東南六路的米粮外，其他北運的物品，如廣南的金銀、香藥、犀象、百貨先陸運到虔州（江西贛縣）而后水運。四川諸州的布、帛，从劍門（四川劍閣縣東北）陸運到嘉州（四川乐山縣），再水運到荆南（湖北江陵），从荆南再北運；有的轉運到山西、陝西。即汴京的附近，鄉村農產品運銷于城市的也很多，如“東京夢華錄”（卷一、二）說，“近新城有草場二十余所，每遇冬月，諸鄉納粟秆草，牛車闕塞道路，車尾相啣數千萬量”。又說，“南薰門……民間所宰猪，須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萬數”。

到了南宋，因北方人口大量南遷，集中城市，城市需要鄉村的供給更形迫切。当时因江南水利的開發同四川灌溉事業的發達，江苏、浙西、江西、湖南及四川都成为稻米生產充足的地方，如宋史（卷八八）地理志說：“江南东西路，茗荈冶鑄金帛秔稻之利，歲給縣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叶適上宋寧宗劄子說，“湖南……地之所產，米最盛，民計每歲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貿易”^②。这些地方生產的稻米除供給当地人口消費外，还有大量剩余，運輸他处城市：四川人民曾就当地用鹽換米，轉運湖北；湖南、江西生產的米先水運集中于長江贛江的交叉点南康軍（治今星子縣），除一部分在当地出售外，另一部分又順流水運到江浙的建康（今江苏江寧）、鎮江、杭州等城市，如朱熹在“李椿墓志銘”中說：“京師

（指杭州）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而省倉之儲多不能過兩月。公請給南庫錢以足歲糴之數，又糴洪吉潭衡軍食之余，及鄂商船，并取江西湖南諸寄積米，…以达中都，常使及二百万石，为一歲備”^③；其他江苏、浙西、淮、廣等地的米也有運往杭州的，如“夢梁錄”云（卷十六），“杭州人烟稠密，城內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鋪家，然本州所賴苏、湖、常、秀、淮、廣等处客米到來市”。粮食以外，其他農產品也以杭州为市場，上書（卷九）中又說：“其浙江船只，……則嚴、婺、衢、徽等船多嘗通津，……如杭城柴炭、木植柑橘、乾濕果子等物，多產于此數州耳。明、越、溫台海鮮魚蟹鰲腊等類，亦上津通于江浙。”

（二）手工業作坊或工場以城市为其集中地：宋代統治階級为加重剝削，維持統治，在全國靠近自然資源的城市中設立各種手工業作坊或工場，雇募、招募農村中農民到作坊中替他們做工，有时也用征役的办法入“行”，熙寧間王安石變法，始改用征收免行錢的办法，只要看一下“續通鑑長編”元丰八年九月条下載：“按在京諸色行戶，總六千四百有奇，免輪官中祇應。一年共出緡錢四萬三千三百有奇”，就可以想見当时汴京城內手工業工人為統治階級服工役者之多。宋代統治階級在全國各城市設立的手工業作坊，凡有下列數种：采冶、軍器制造、鑄錢、造船、絲織及印刷工業等。

采冶宋代又名“坑冶”，它的分布区域，据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所載，金產商、饒、歙、撫四州，南安軍，銀產饒、信等州，有三監五十一場三务，銅產饒、处等州，有三十一場一务，鉄產徐、兗等州，有四監十二冶二十务二十五場，鉛產越、建等州，有三十六場与务，錫產虔、循等州，有九場。其他还有水銀、朱砂、礬的礦区。宋代礦場的情况，如

① 宋會要稿食貨十五至十七。

② 水心文集卷一。

③ 朱文公文集卷九四。

苏轼“徐州上皇帝書”中所說：“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國監，…今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礦代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驚忍之民也”。可見宋代礦場規模很大，礦工多是窮苦農民。

軍器制造机关，宋初中央設“弓弩院”（后改为“軍器監”），諸州設“作院”（又称“都作院”）。天禧四年（1020），歲造弓弩箭劍甲冑箭鏃等六百二十余万。北宋首都汴京“御前軍器所”中工匠，有“以五千为額”，可見工匠之多。南宋时，諸州作院中匠人“多系远鄉農民，追呼騷援，离家失業”^①，可見宋代城市中軍器制造工人也是農民。

鑄錢工業，宋代分銅、鉄兩種，銅錢凡十七監，如西京阜財監，陝州華州監等，鉄錢凡九監，如嘉州丰遠監、邛州惠民監。工場規模，如“游宦紀聞”（卷三）所說蕪春鉄錢監的情況，“日役三百人，十月可鑄一万緡”，足見工匠人數之多。

造船工業，宋代造船業發達，船身長達十多丈，深三丈^②。又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六載从廣西航往南海的船，“舟如巨室”^③，直接开往阿拉伯去的，船上可容千人。造船中心，北宋时有溫、明、洪、虔等州。元祐五年（1090）时，溫、明兩州造船額年为六百只，可見所需工人之多。

絲織工業，宋代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区，首推江、浙与四川。工場的名称，如汴京有“綾錦院”、梓州有“綾綺場”，潤州有“織綾务”。工人數，从上引“蜀錦譜序”中已知成都織錦院中挽綜、用杼、練染、紡織等共有三百二十八人，又湖州絲織工場有女工五十人，汴京綾錦院中有机器四百架^④，可以推断那里的工人一定不少。

印刷工業，宋代也相当集中于各城市，陸游說“天下印書，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⑤，雕板的地方在苏州、紹興、福建三处，杭州權貨务印茶鹽鈔引工人每日有二百零四人^⑥。

宋代統治階級这样把手工業工場集中于城市，而工人數相当的多，所以这也是宋代都市

發達另一个原因。

（三）貨幣經濟的發展与統治階級的專利事業促進了城市畸形的發達：宋代貨幣經濟有很大的發展，北宋鑄錢的數量，至道（995—998）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1004—1008）末歲鑄一百八十三萬貫。信用貨幣——“交子”在北宋时已收归“官”办，規定三年为一界，每界發行額为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而有准备金三十六萬緡。南宋初更增發“关子”、“会子”、归專賣机关發行，流通市面^⑦。同时，宋代政府对于鹽、茶、酒、礬、香料等日用品实行归政府專賣制度，即或由政府生產并出售，或由人民生產，然后由政府收買，再轉賣于商人，或者由人民生產并自己售賣而由政府抽取重稅。鹽在銷区的公賣机关叫做“市易务”，同他貨交換的机关叫做“折博务”。商人運輸粮草到边地，地方官吏發給他們一种領款憑証，叫做“交引”，商人持交引到京城領款后，政府才指令各茶、鹽產区的專賣机关准許商人購茶或鹽，这种办法，叫做“入中”。在这种情形之下，京城中一部分商人，就可大做其投机倒把的買賣，設立“交引鋪”，用低价收買入中商人的交引，坐享重利。“夢梁錄”（卷十三）記杭州城內鹽引交易的情況說，“杭州大街……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街，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前列金銀器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备准權貨务算清鹽鈔引，……紛紜無數”。可見杭州的繁華同交引鋪的買賣有一定的关系。宋代茶在收購区設“山場”收購茶，又在大城市中設專賣机关叫做“權貨务”，商人買茶繳款，都在權貨务。雍熙四年（987），实行茶和鹽同被指定作为偿付入中商人之用，商人于沿边各地入中粮草，即可取得茶鈔，持往京城權貨务換錢，再往外地大城市中權貨务購茶。天聖元年（1023）茶法

① 朱子大全集卷二〇与曾左司事目劄子。

②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四客舟条。

③ 宋会要稿食貨五〇。

④ 李燾：續通鑑長編卷四三。

⑤ 老學菴筆記。

⑥ 夢梁錄卷九監當諸局条。

⑦ 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

改用“貼射”及“見錢”兩個實估的辦法，京城植貨務的收入增加了一百零四万多貫^①。這個例子也足以說明宋代專賣事業機關的設在城市同城市的畸形發展是有很大的關係。

三 宋代城市經濟的特徵

宋代城市經濟雖然如此發達，但它仍然具有很濃厚的封建性。它的發展，因此也就有着封建社會的各種特徵。這表現在以下各個方面。

(一) 宋代城市經濟的封建性特徵，首先表現在官僚資本對城市經濟的壟斷與封建政府對工商業的橫征暴斂上面：宋代因貨幣經濟的發展與統治階級的腐化，官僚中很多私營商業，如壟斷典當業，吃高利貸，蘇轍說過，“今官吏緣法為姦，……至於買賣之余，則又加以質當”，“夢梁錄”（卷十三）也指出杭州典當業的情況說，“又有府第富豪之家質庫，城內外不下數十處，收解以千萬計”。有時一個官僚同時在好幾個城市中進行營商，高利剝削，如朱熹在他和唐仲友的糾紛中檢舉唐仲友的罪狀說：（1）在台州開設彩帛鋪，在“本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所染到真紅紫色物帛并發歸婺州（浙江金華）本家彩帛鋪貨賣”，（2）壟斷生產工具，“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櫨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彩帛鋪充染帛用”，（3）高價出賣成品，“什物庫陸侃友支公使庫錢往仲友私家婺州所開彩帛鋪，高價買到暗花羅……匹”^②。

其次，宋代城市經濟也受到政府的橫征暴斂：如“續通鑑長編”（卷三六）說：“初京師供百事有行，雖外與諸州軍等，而官司上下需索，無慮十倍以上”。南宋周輝“清波別志”中有“哀扇工歌”中說：“某家竹扇名字著，織扇供官困迫捕”，是官吏壓迫城市手工業者最好的寫照。

(二) 同樣的性質也表現在城市商業被行會所把持：北宋初年，因為生產發達，社會經濟有進一步的發展，工商業本身需要較細的分工，加以熙寧新法“免行錢”法的實行，越發促成城市中工商業行會組織的發達。宋代商業行會的名稱常叫做“行”、“團”或“鋪”，如“東京夢

華錄”（卷三）說北宋汴京的商店有“城西花團、青果團、柑子團、鯊團”，又有“魚行、蟹行、蠶行、菱行、豬行、菜行、鮮魚行、布行、鵝行”等。夢梁錄卷十三說南京杭州城內的商店有職家羊飯、沈家、張家金銀交引鋪等。這些商店不但同類性質居住在一條街上，而且保持着封建性的行會組織。如“夢梁錄”（卷十六）說“行老謂之市頭”，又說“城內外諸鋪戶，每戶專憑行頭于米行做價，徑發到各鋪出糴，鋪家約定日子支打米錢”。又說，“其米市小牙子，親到各鋪支打發客。……且又袋自有賃戶肩駝脚夫，亦有甲頭管領船只，各有受載舟戶”。可見普通鋪戶不能同其他商行發生直接交易，需憑本行的首領“市頭”或“行頭”先去講好價格，才能發貨給錢；此外市場又有牙客“小牙子”及運輸行的首領“甲頭”：他們無非是商業中封建的把頭。

(三) 同樣的性質也表現在手工業的行會組織上：宋代城市中手工業的組織也叫做“行”、“鋪”或“作”，如“東京夢華錄”（卷二）及“夢梁錄”（卷十三）說宋代汴京及杭州手工業行會，“行”有“方梳行、銷金行”等，“作”有“碾玉作”等（已見前）“鋪”有“金銀鋪、漆器什物鋪”等。手工業的鋪子，也常用某姓或某人做字號，如“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鋪、徐茂之扇子鋪、張家鐵器鋪、舒家徐家紙筋鋪、彭家油靴鋪、宣家台衣鋪”等。

其次，宋代城市手工業行會對於本行的技術保守秘密，不肯公開，如“老學庵筆記”（卷六）說亳州出產一種輕紗，裁制衣服很好看，但當地只有兩家能織，這兩家怕被別人知道他們制作的秘密，於是世代聯姻，據說從唐朝以來名家，已有三百年的歷史了。宋代手工業師傅的職業，常用家世流傳的辦法，如“獨醒雜志”載一個例子，說當代制造硯台，只有武昌萬道人所制的最好，硯底刻有篆體萬字。到那時武昌還有制硯台的，仍是萬道人的後代。

“鐵圍山叢談”也說宣城有一家復姓諸葛的，世代制造樂器，一直流傳到七百年之久。

① 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

② 朱文公文集卷十八。

最后要指出的，宋代工業中也有封建把头——“戶頭”：如开宝四年左拾遺梁周翰說：

“在院見管戶頭逐人料錢七百文……各用女工三四人。有一戶頭并女工……每人只管机三四張；或布帛低弱，即科校匠人，戶頭不管。欲乞不置戶頭，今工匠自管供机，各与女工一分請受”^①，可見戶頭是帮助厂主剝削工人的。

（四）同样的性質也表現在商人和官僚的結合上——由豪商到官僚：宋代城市中交換，通用錢幣，但价格常有变动，如“东京夢華錄”（卷三）說，“都市錢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

七十五……”。城市中豪富即利用錢幣价格波动的机会，从中取利，有錢仗勢，可以入貲買爵做官，如上述南宋婺州的唐仲友，就是因为他本州开彩帛鋪大施掠夺，朱熹的奏狀中說他曾在行会中“补充行首”，而且后来竟以有錢做了台州知州。“清异錄”中載开封“皇建僧舍旁，有糕作坊，其盛不可言，主人由是大有金帛，入貲为員外官……都下人呼为花糕員外”。開設糕作坊而能買來一个員外，不能不說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① 宋会要稿食貨六四。

天 地 会

柴 孟 源

天地会为清朝二百多年間主要的秘密結社之一。它的拜会歌辭說：

- 一、拜天为父；
- 二、拜地为母；
- 三、拜日为兄；
- 四、拜月为嫂；
- 五、拜五祖（一作拜五聖賢）；
- 六、拜万云龍大哥；
- 七、拜陈近南先生（一作拜結二兄）；
- 八、拜兄弟和順（一作拜万年長）。

他們拜天地为父母，一切會員同为兄弟姊妹，即“忠义堂对联”所說：“忠义堂前無大小，不欺富貴不欺貧。”因此他們定名为天地会。在“拜天地会”詩中，把他們的名稱正式寫出來（每句第一字联起讀为“拜天地会”），把他們的主張也寫出來，那首詩是这样的：

拜請五祖奉我君，
天降真龍我主人；
地產洪兒兄弟众，
会聚洪英去滅清。

會員自称洪門，把“洪”字拆开就是他們的暗号“三八二十一”（即 𠂇 八廿一）。这个“洪”字，一說为紀念康熙十二年（1673年）起義的朱洪英，一說为“洪武”的隱語，总之都暗示“滅清复明”的宗旨。天地会为了避免清朝政府的注意，又取“洪”字偏旁“𠂇”，称为三点会。又把“洪”字解釋为會員团結，把“𠂇”叫作“三合水”。“桥边飲水詩”說：

又兄叫你拜灵神，三八二一不差分，
飲过桥头三合水，齐家都是姓洪人。
三河合水万年流，二十一人共登舟，
洗淨凡心見五祖，反骨奸心定不留。

三合水(𠂇)加上二十一人(共)就寫成一个“洪”字，所以又叫做三合会。

天地会的創立時間，很难考訂准确。据“洪門小引”和天地会的各种文献說，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出世。如“出世詩”說：

又兄問我乜生辰，
歲序排來是甲寅，
日系孟秋二十五，
鷄鳴丑位我生身。

一般都說是康熙十三年（甲寅年，1674年）創立，大概可信。

天地会的傳說：康熙時西魯國入寇，福建莆田縣九連山少林寺僧人挺身救國，打敗西魯。康熙忌僧人能力大，派兵燒燬少林寺，众僧慘死，只逃出五人（即前五祖亦称前五房，蔡德忠，方大洪，馬超兴，胡德帝，李識开），云游各地組織天地会。在廣東惠州石城縣高溪庙遇到万云龍，遂結拜起義，各地英雄多來投軍。于是拥崇禎之孙朱洪竹为主，万云龍为师（称大哥），陈近南为先生。这时鄭君达（原与僧众征西魯，并与僧众結拜，后为湖廣總鎮）也被清朝殺死，其妻郭秀英，其妹鄭玉蓮都來参加起義，还有馬販吳天成、洪太歲、李識弟、桃必达、林永昭等（即后五祖亦称后五房）都來参加。这一次起義失敗了，

万云龍战死，五祖就分赴各地运动起义。計：

長房	蔡德忠	福建	甘肅	陝西
二房	方大洪	廣東		
三房	馬超兴	廣西	雲南	
四房	胡德帝	湖南	湖北	
五房	李識开	江南	浙江	
	吳天成	西蜀		
	洪太歲	貴州		
	李識弟	江南		
	桃必达	雲南		
	林永昭	河南		

据上述傳說，一般人都認為最先立会地点为福建。創始人是鄭成功的部下和陈永華，大概可信。

天地会沒有完整的斗争綱領，就其文献看来，主要口号是“滅清复明”，“順天行道”。“滅清复明”是清朝統治下全國漢族和各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的口号；“順天行道”是歷史上農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口号。天地会反清朝的斗争，实为以民族斗争为形式，以階級斗争为內容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反抗斗争。他們有三十六誓和十款規約，是會員的紀律，也就是行动綱領。其主要內容是：滅清复明，不得私通官差；作事公平，不得恃强欺弱；义气相交，不得出賣兄弟；服从命令，不得泄露会內机密。

从清朝初年起，天地会不斷發動起义，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灣朱一貴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灣林爽文起义，太平天国革命前廣西、湖南的許多起义，太平天国革命时廣東陈开、李云茂起义，福建黃威起义等等是其中著名的事例。

康熙二十年（1681年）鄭成功后人所率領的反清力量在台灣失敗，一部分人逃到南洋，于是南洋華僑中也有了天地会的傳播。而后南洋各地、澳洲和美洲華僑中都有天地会的組織。華僑中的天地会在辛亥革命时期，对于这次革命运动曾有許多貢獻。辛亥革命以后，对于中國人民的革命运动仍有許多貢獻。

天地会的會員成份，主要是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和城市游民，此外各社会階層都有人参加，成份复雜，組織散漫。在封建社会中，它曾經組織人民進行过反抗斗争；在辛亥革命前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也曾通过天地会發動过武装起义；天地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是應該肯定的。但是这种秘密結社，成份不純，許多流氓野心家經常利用这种組織進行危害人民的活動，这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

天地会的派系很多，如小刀会、双刀会等等都是它的支派，其中最大的支派是哥老会。这些支派的組織形式略有不同，但其性質、成份以及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則是相同的。

太平天国的茶絲輸出貿易

（英國）伶俐

譯者按：著者伶俐(Lin-le)原名A.F. Lindley，是在英國海軍中服务的一个中級軍官。1859年夏到香港，那时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著者說：“1860年初太平軍的奇捷，引起人們的很大注意”，为了“很希望去深入了解所謂清帝國的敌人——太平軍的情况”，他就“决心辞去海軍職務去找一个比較更不受拘束的自由職業，可以乘机多觀察一些太平軍的实际情况”，于是他就在一艘名为英國人產業而实在是中國商人所有的小輪船上当副船長，船長也是他的一个辞去軍職未久的同僚。这艘船航行上海附近內河，到太平軍統治区域去收買蚕絲。

1860年8月，他第一次到太平軍統治区的甬直鎮（甬直在苏州东約四十里，南边就是澱山湖），看見“鎮外停泊了許多运絲船、本地船、上海船正忙于裝卸貨物，鎮上的商店無不貨物充足，生意兴隆。老百姓衣着整齐，熙來攘往地一片太平景象。特別是沒有看到一个乞丐。鎮外田間谷物丰收，農民們正忙于收割……太平区域人民的和蔼友善态度使我感到意外驚奇！”尤其是“軍士們的和平嚴整同所見到清政府官兵的粗野凶慘大大的不同”。他第一次見到太平軍統治区域的情况就給他一个“十分良好的印象”。

同年九月，他在苏州謁見忠王李秀成，受到“謙和”接待，深为感動。忠王对英國政府之干涉政策和背信弃义的行为所發表的遠見高論，使他十分心服，因此他决心“立志要竭尽所有能力拥护并协助太平軍”。忠王委他做名义上的參謀。

1863年冬，他因病回英國休養。

1866年他寫了一本太平天國革命史，由倫敦 Day and Son 公司出版。書的內容除了敘述他個人參加太平天國革命前后的活動外，搜集了當時英國政府的對華外交文件和許多新聞記載、私人函札筆記等材料，證明英國外交的不講信義，不但不實行正式承諾的中立政策，却暗地里幫助腐敗的清政府，以至於後來勾結了美、法侵略軍組織武力，不宣而戰地向太平軍進行慘無人道的攻擊；他極力斥責英國的侵略外交政策，指出那無非是為了“保護她的賠款和少數發橫財的鴉片煙商，因而得到鴉片煙商的大力支持”的可恥政策。書后附表之二，詳載太平天國未統治江蘇、浙江、安徽等地的茶絲產區以前和以后總共二十年間的輸出貿易數字，借以有力地證明“太平政權和清政府到底是誰摧殘和破壞茶絲的生產和輸出貿易”。

這些絲茶輸出貿易數字，零散地在一些外交書報中曾有記載。如美國人卡希爾 (H. Cachtill) 著的“一個新英格蘭浪人”中，曾指出太平天國革命沒有爆發以前的十年中的中國蠶絲輸出數量每年平均是16,000包——25,000包；在1861年到1863年當太平天國完全統治了江浙主要蠶絲產區期間，蠶絲的輸出數量增加到每年平均81,000包。但是像倫利這樣有系統地列表舉出二十年間的茶絲輸出數字還不多見，特為譯出供研究參考。

中國茶絲輸出貿易表

指明茶絲產區在太平軍占領以前、占領期間和撤退以后的貿易情況。（從下列各表的數字中來看，太平軍致力於商業的成就就可以得到明確証實。）

(1) 太平天國革命沒有爆發前五年的輸出貿易總數

輸出年度	茶	絲
1845—1846	57,589,000磅	18,600包
1846—1847	53,360,000磅	19,000包
1847—1848	47,690,000磅	21,377包
1848—1849	47,240,000磅	17,228包
1849—1850	53,960,000磅	16,134包

附注：這些正式報告數字是從西克斯上校 (Col. Sykes) 所寫的一本“對華貿易的進展1833—1860”小冊子和另一種定期刊物“中國之友”上摘錄的，這個刊物在廣州發行，它有系統地表列着從1843—1858年中各通商口岸（寧波除外）的輸出貿易總數。

(2) 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后的起初三年輸出貿易總數，其時太平軍正堅強地向北挺進中。

輸出年度	茶	絲
1850—1851	64,020,000磅	22,143包
1851—1852	65,130,000磅	23,040包
1852—1853	72,900,000磅	25,571包

附注：這可以看出來，革命的進展並沒有影響到貿易，它還是在不斷地增漲的。

(3) 自從太平軍占領南京和其他許多出產茶絲地區之日起到1859年的輸出貿易總數

輸出年度	茶	絲
1853—1854	77,210,000磅	61,984包
1854—1855	86,500,000磅	51,486包
1855—1856	91,930,000磅	50,489包
1856—1857	61,460,000磅	74,215包
1857—1858	76,740,000磅	60,736包

附注：從上表所列數字可以看出輸出貿易有某些程度的增減，太平軍占領區域內是繼續增加的，特別是在蠶絲貿易方面。

(4) 在太平軍沒有占領全部蠶絲產區和大約一半的茶葉產區以前的起初二年的輸出貿易總數

輸出年度	茶	絲
1858—1859	65,789,792磅	81,136包
1859—1860	85,938,493磅	69,137包

附注：這些統計數字是從“中國對外貿易報告”兩月刊上慎重地抄錄下來的。

(5) 太平軍占領了全部蠶絲產區期間的輸出貿易總數

輸出年度	茶	絲
1860—1861	87,220,754磅	88,754包
1861—1862	107,351,649磅	73,322包
1862—1863	118,692,138磅	83,264包

附注：1860年5月太平軍攻占了蚕絲的首府苏州（随后不久就攻克了那物產丰富的整个地區）。我們可以看出，在占領后的第一个貿易年度終了时——1860—1861年度，从1860年6月1日起到1861年5月31日止——他們不但沒有阻碍蚕絲貿易，相反地是使蚕絲出口数量增漲到88,754包，达到了中國在以往任何一个年度中輸出数量的最高峯①！1861—1862年度是73,322包，1862—1863年度是83,264包；同时輸出貿易中的茶叶，絕大部分是从太平軍統治区域生產的。从1860年的輸出66,000,000磅增加到1863年的輸出119,000,000磅②！这些数字包括着太平軍完全占領整个蚕絲產区和徽州、太平縣以及安徽、浙江、江西、江苏各省的其他產茶地区的輸出量，直到1863年5月底为止。

譯者附注：①在1861年7月里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Bruce）給英國外務大臣罗塞尔（Lord Russell）的报告中說：“……对我說來这倒是一件驚奇的事，商業还是繼續流通。……1860年6月到1861年6月間，情况是如此的不利，而蚕絲的出口数量却达到了85,000包！”卜魯斯是力言“太平軍所到之处，無不遭到徹底破坏！”上海的英國領事麥特赫斯特（Medhurst）也声言上海周圍五六十英里之外全在太平軍占領之中。可是在太平軍完全占領之下的蚕絲產区，遭受到他們所謂“徹底破坏”，而蚕絲的輸出量却打破了以往的歷史記錄的鉄的事实，怎能不叫卜魯斯感到驚奇！著者在表中列举1860—1861年度的蚕絲輸出数是88,754包，卜魯斯的报告說是85,000包，著者在原文卷上406頁中又指出在所謂居民逃避一空的混乱局势之下，怎能够在1861年还生產出88,112包蚕絲。这一年度的蚕絲輸出数量有三种不同数字（88,754包，85,000包，88,112包），哪一个数字是准确的，还待查考，不过在太平軍完全統治江苏、浙江的產絲区域的

（上接11頁）

而后向制造教具的学生說明制造这一教具的目的和用途，并介紹有关文件讓学生看，以便了解故事內容。这不僅培养学生制造教具的技巧，对加深学生理解知識也是有好处的。教具“样式”除从教科書、有关参考文件、雜誌等搜集外，必要时还去歷史博物館參觀，把有的

1860—1861年度中，輸出数量打破了最高記錄这是肯定的。

②根据原著者所引的 The China Overland Trade Report 的报告数字，1859—1860年度的茶葉輸出額是85,938,493磅，著者在原注里說是66,000,000磅，相差很多，不知是記錯了或是另有根据，也需待查考。目前南京各圖書館中沒有这项資料。不过，我們也可以明白看出在太平軍占領了產茶区域的徽州（祁門紅茶和屯溪綠茶都是有名的出口茶叶）和太平縣，以及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各省部分產茶区域期間，茶葉的輸出数量也达到了1862—1863年度的118,692,138磅的前所未有的高峯，这事实确定不移地証明了太平軍所占領茶絲地区的人民生活安定，和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对茶絲生產和輸出貿易的積極發展。

（6）自从太平軍从蚕絲產区被击退后的輸出貿易总数。

輸 出 年 度	茶	絲
1863—1864	119,689,238磅	46,863包
1864—1865	121,236,870磅	41,128包

附注：这些正式报告数字比任何狡辯都能更有力地証明在原先为太平軍占領区域内，到底誰是摧毁生產者。当革命政权攻占了并且統治着那些物產富饒的地区时，茶絲的產量和輸出量都大大地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自从英國人把这些地区当作戰場，最后是将太平軍从这些地区击退了，但是蚕絲的輸出就立时比太平軍統治期間的輸出数量下降了几几乎一半，随后第二年还更减少了。

（程万孚譯）

实物用照像机照下或画下來，照样子來制作。

歷史課外活动小組每兩周活动一次。高年級因准备專題报告需要時間，就不一定兩周活动一次。

总之，通过課外活动小組的活动，对巩固与擴大学生歷史知識來說，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國的土地改革与党的土地政策

宋 祝 勤

在土地改革這個問題上，我想應該教導學生明確以下幾個問題，這就是：（一）為什麼要進行土地改革？（二）黨的土地政策及黨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所採取的階級路線。（三）土地改革對於革命的意義。我在下邊就是按照這三個問題來寫的。

一、為什麼要進行土地改革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時代，土地制度是極不合理的。少數的地主、富農占有極大部份土地，而廣大的中農、貧農、雇農則只占有極小部份土地，很多貧農和幾乎是全部雇農沒有一點土地（俗語說：沒有立錐之地）。地主、富農占有土地後，殘酷地剝削農民，農民終年辛勤勞動，給地主、富農出地租、付債利、上稅款，受着各種壓迫和剝削。這種剝削的殘酷、毒辣與手段之巧妙、繁多，使我們一些對舊社會經歷較少的人和青年人聽來會震驚，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時代則是普遍的情形。這裡我不妨舉一個例子如下：

宜興埠是天津市近郊的一個鎮。在1949年初解放。

那時，這個鎮有地主、富農144戶，只占總戶數的6%，但占有土地36,910畝，占土地總數的92%，中農、貧農共700戶，占總戶數30%，只占有土地3,210畝，占土地總數的8%。貧民達1,114戶，占總戶數的47%，沒有一點土地。此外有工人120戶，商販252戶。

地主占有了絕大部份土地，以約75%的數目出租。大都先租給二地主，二地主再租給農民（二地主從中收一份“小租”），農民受着兩層剝削，租額約占正產物的30%到40%。並且都是在前一年的舊曆七月十五日前繳租，名曰“上打租”，很多農民是租不起土地的。地主又拿這些租糧做投機生意、放高利貸，再剝

削農民。土地的租佃權毫無保障，地主可以隨時奪佃。另有一部份地主，不出租土地，而是常年靠雇短工耕種，地主也不向地施肥，耕具也是由短工自帶，短工工資由“地主會”決定，一般都比中農出的工資低。還有一部份二地主，從大地主手中租到土地後，雇工耕種，進行剝削。

地主、富農放高利貸的“名堂”很多，計有：“月利”——即月利3%；“天利”，又名“打印子”——地主放錢給農民，期限100天，天利0.4%，地主給農民一個摺子，一天一付息，付息後在摺子上打一個印子；“六月換票”——規定六月一付息，利息3%（即相當年利6%），這種形式較多，地主所奪的土地及其他抵押品亦最多；“放糧牌”——在青黃不接時放的債，時間半月或20天，利息10%——20%，這是一種最厲害的剝削辦法；此外還有專營高利貸者，開設着“大當”“小押”等各種當舖，農民沒有不到當舖押當的，月利2%——3%，11個月後死當。

此外，所有村中一切稅負，如村款（村經費、辦學校等）、看青費（防盜莊稼的）、自衛團費、出差等，全由農民或小商人負擔，地主、富農是一個錢不出的。

地主、富農這樣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不僅造成貧農生活困苦，而且造成了大量的貧民（將近全村戶數的一半），形成“貧民窟”，他們沒有固定職業，經年以“打八叉”（打短工、賣蕎麥皮、賣破爛……）為生，飢寒交迫，苦不堪言。

上述雖然是一個鎮的例子，但是已可以看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時代農村的一般情況。地主占有着大量土地，却只靠土地進行剝削，絲毫不去想法如何增加生產；而農民勞動的結果，絕大部份被地主、高利貸者、富

農等用各種方法剝削去，連最低的生活都不能維持；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是極低的，當然更沒有力量去投資生產、發展生產。由此可見，這種地主的封建占有制度是嚴重地束縛生產力的。“這種嚴重情況是我們民族被侵略、被壓迫、窮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們國家民主化、工業化、獨立、統一及富強的基本障礙。”（中共中央關於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土地改革，徹底廢除地主封建占有制度，實現“耕者有其田”，是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的唯一道路。

二、黨的土地政策及黨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所採取的階級路線

我們黨一向是主張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這就是徹底消滅地主封建占有的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生產。黨的主張、目的雖然是這樣的徹底，但在不同的革命時期，從革命的長遠利益出發，從革命的戰略出發，在具体政策上則有所不同。現依據黨的鬥爭歷史概述如下：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1—1927）。這時黨的政策，主要是以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作為鬥爭的基本內容。在黨的宣言中曾指出：“……廢除丁漕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廢除厘金及一切額外稅則，規定累進率所得稅；……規定限制田租率的法律”（1922年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毛主席敘述湖南農民運動時所指出的農民在經濟上打擊地主的辦法就有“不准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不准退佃”“減息”等（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6年）。由於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指示之下，舉行了反革命政變，黨內陳獨秀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使革命事業受到極嚴重的損失。黨為了挽回革命的損失，繼續鬥爭，從新布置了黨的工作。以很大一部份力量轉入農村，領導農民進行土地改革與遊擊戰爭。黨認定了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這時黨的土地政

策是徹底地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耕種的政策，因此也稱這個時期為土地革命時期。黨的決議指出：“推翻帝國主義及土地革命是革命當前的二大任務”。“徹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中國的農民（小私有者）要將土地制度之中一切半封建束縛完全摧毀。”“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取消一切政府軍閥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1928年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在井崗山革命根據地還頒布了成文的“土地法”，土地法規定“沒收一切土地歸蘇維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種方法分配之：1.分配農民個別耕種；2.分配農民共同耕種；3.由蘇維埃政府組織模範農場耕種。”“一切土地，經蘇維埃政府沒收并分配後，禁止買賣。”後來在江西興國縣又公布過一次“土地法”，將前一個土地法中所規定的“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後來，并又將土地所有權“歸政府所有”改為“歸農民所有”；將“禁止買賣”改為“可以自由買賣”。經過這一時期，黨在土地問題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黨的土地政策日臻完善與正確。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年）。這時，全國人民的急迫利益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爭取民族解放。黨為了爭取當時的國民政府一致抗日，為了爭取團結地主參加抗日，故在土地政策上讓了一大步，把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黨宣布：“取消一切推翻國民党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1937年黨公布的國共合作宣言）又宣布：“……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救濟失業。調節糧食。賑濟災荒。”（黨公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各個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府，都根據上述原則，結合地方情況，制定公布了具體的土地使用條例或減租減息條例之類的法令。發動農民，在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普遍進行減租減息的鬥爭。例如晉冀魯豫邊區就是在1941年舉行的臨時參議會上，通過并公布了這個邊區的“土地使用暫行條例”。條例承認

各階層（包括地主）土地的所有權，實行減租減息，同時農民必須繳租繳息；條例規定實行“二五減租”就是按照抗戰前的租額一律減低25%，並限制最高租額不得超過正產量的37.5%（即產一石，最多交三斗七升半），經過“二五減租”後，其租額如仍超過此數時，得減至此數，低於此數時不得提高；同時實行“分半”減息，就是利息減至不得超過年利15%，利息已超過本之一倍者，停利還本，超過兩倍者，本利停付。這就是一方面減輕農民所受地主的剝削，適當改善農民生活，以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與抗日積極性；另一方面又照顧地主的利益，保留其一部份剝削，以便團結地主抗戰的政策。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1945年——）。原在抗日末期老解放區的農民運動，已經奔騰澎湃地开展起來，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內外形勢起了巨大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被驅逐出中國，農民普遍要求懲辦漢奸、惡霸，而漢奸、惡霸又多是与地主二位一体的。同時國民黨反动集團，代表地主和大資產階級利益，掀起內戰，人民解放戰爭開始，農民已不是要求減租減息了，而是要求土地，要求取消一切封建剝削。黨根據新的形勢以及農民的要求，就將減租減息的政策適時地改為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1946年5月4日，黨中央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就是這個改變的先聲。指示規定，對於日寇和大漢奸、惡霸、不法地主所強占的土地，加以沒收，分配給農民；同時實行反奸（漢奸）清算，清算租息、負擔等，從地主手中獲得土地。在陝甘寧邊區還曾發行土地公債，征購地主超過應留數量之土地，分配給農民。就是說通過上述這些方法，來達到“耕者有其田”。1947年10月10日，黨中央公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個大綱是徹底的土地改革的辦法。大綱規定：“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廢除一切鄉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債務”。“……鄉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鄉村農會接

收，連同鄉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鄉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統一平均分配，……使全村人民均獲得同等的土地，並歸各人所有”。大綱還規定沒收地主的牲畜、農具、房屋、糧食及其他財產，並征收富農的這些財產的多余部份；分配給農民及貧民，並分給地主同樣的一份。這個大綱的重大特點是：除了徹底沒收地主的土地、財產外，還明確規定了征收富農的多余土地和財產。對於少數富裕中農超出一般農民的土地部分，則只能在中農同意的情形下才能抽出，如果中農不同意，則絕不能抽（見1947年9月13日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並見1948年1月12日任弼時同志的講話）。1948年黨中央又曾先後兩次發出關於土地改革與整黨工作的指示，規定了根據各地具體情況進行土地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雖然標誌着人民民主革命的結束，革命基本形勢已經進入了社會主義的革命時期，但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務還沒有全部完成，特別是土地改革還沒有完成。根據全國大陸解放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的新形勢，中央人民政府於1950年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這個土地改革法規定沒收和征收的土地是：地主的土地；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在農村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工商業家在農村的土地；……。這裡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對富農的政策有很大的變更，規定：保護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及其他財產；富農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動，在某些特殊地區，經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只對半地主式的富農出租的土地才予征收。這樣就保存了富農經濟。這是由於當時的政治形勢的變化所需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立之前，人民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還處於殘酷的戰爭中，富農則多傾向於反革命方面，反對革命；同時人民革命戰爭又需要農民大力支持，以爭取戰爭的勝利，因此允許農民接收富農的多余土地、財產，是必要的、正確的。現在革命戰爭已在全國範圍內取得勝利，農民的各种負擔已經大大減輕，全國人民的基

本任务是恢复与发展经济，在这许多条件下，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也就成为必要的与正确的了。这个土地改革法是在全国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的一个土地法。

以上就是党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土地政策的主要内容。

要彻底执行党的土地政策，进行土地改革，达到“耕者有其田”，一般说用和平土改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坚决向地主进行斗争，才可能达到目的。因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时代，政权、武装及其他统治机构，完全掌握在地主手里，蒋介石集团就是代表地主及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特别从农村看，所有乡村政权（例如保甲政权）、武装（除了公开的团练外，还有秘密武装），都直接为地主所掌握。“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富农中亦常有小的土豪、劣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这些人，在他们统治时期对农民殴打、捆绑、审讯、凶杀，无恶不作，血债累累。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们顽强抵抗，进行破坏。我们不能设想：不把地主的政权摧垮，建立农民优势，不把地主的武器缴械，武装起农民，而地主会很驯服地把土地交出，那完全是一种幻想。因此毛主席指出：“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此可见，进行土地改革必须放手发动农民，以农民自己的威力来解决土地问题。过去，在土地改革期间，人民政府还曾专门组织人民法庭，惩办那些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所痛恨的或是进行破坏土地改革的分子，这样给农民撑腰，支持农民起来斗争，完成土地改革的任务。

土地改革是农民的基本要求，党洞悉了这一問題，一向担负着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这

一历史任务，一直到全国实现土地改革为止。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工农联盟的基础与内容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农民实行土地改革，建立与农民坚固的联盟，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党早经指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苏维埃工农兵独裁制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1928年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党在各个不同的革命历史时期所建立的“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抗日民主政府”“人民政府”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农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行土地改革，没有党的领导而进行土地改革是不能设想的。党怎样领导农民呢？下边就讲党在农村领导农民斗争的基本路线。

党在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但依据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形势与革命任务和具体政策的不同，在斗争的具体策略上也有所不同。现略述如下：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曾指出：党在“农村斗争中整个我们的策略，是依靠贫农，坚决的联合中农，并使雇农起先锋队作用，团结所有一切力量，去消灭地主阶级与反对富农”。（1933年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指出“抗日期間，中国共产党讓了一大步，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这个讓步是正确的，推动了国民党参加抗日，又使解放区的地主减少其对于我们发动农民抗日的阻力。”（论联合政府）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及旧式富农的封建的及半封建的剥削制度。”（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同志指出：“我们在今后土地改革中的总路线，应该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到了進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当然我們这里不是談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党指出：

“必須依靠貧農（包括土地改革后变为新中農的老貧農），巩固地与中農联合，逐步發展互助合作，逐步由限制富農剝削到最后消滅富農剝削。”（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綫的學習和宣傳提綱）

我們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党在農村依靠貧農、雇農、巩固地联合中農，这个基本的階級路綫，是在任何时期都是根本必須的；这不僅在实行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包括減租減息）的时候是如此，就是在实行農業合作化的时候，也是要依靠貧農，巩固地联合中農來進行的。对于富農，則依据各个革命歷史时期的不同形势，很多时候是采取了保存富農經濟的方針，有时候也采取了消滅的方針。对于地主階級，除了抗日时期以外，都是采取了坚决消滅的方針。就是在抗日时期，虽然实行的是減租減息政策，但毛主席也曾指出：“然后采取適當方法，有步驟地达到耕者有其田”（論联合政府），也是要达到消滅的。

党在農村为何要依靠貧、雇農呢？因为雇農是農村的無產階級，貧農是半無產階級，他們約占農村人口的70%。他們遭受地主、富農的压迫、剝削最深，对地主、富農同仇敵愾，革命性最强，对土地改革最拥护，最積極。因此他們是土地改革的先鋒、骨干，是党在農村中最可靠的力量。那么如何依靠呢？在“中國土地法大綱”中曾規定：成立貧農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員會，成为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農民大会、代表会及其选出的農民协会委員會，成为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在農民协会中，还应注意樹立貧、雇農的領導骨干。这就是把大权交給貧農团或農民协会，以充分發揮農民的威力，保證土地改革的徹底执行。

为何要巩固地联合中農呢？中農是劳动農民，約占農村人口的20%，也是党在農村的基本群众，是可靠的同盟者。一般中農在政治上受地主、富農的压迫，經濟上也受地主、富農的剝削与压榨。例如，不少中農租入土地，借高

利貸，尤其在負担上，地主、富農常常挤在他們身上。因此一般中農是仇恨与反对地主、富農的，同情、贊助土地改革的，并参加土地改革的斗争。如何巩固地联合中農呢？首先在土地改革中坚决不准侵犯中農的利益，这是党一再強調的，一部分中農还应分進土地与財產。在農民协会的委員會中，应有中農参加領導，一般应有 $\frac{1}{3}$ 的人数是中農，以使雇、貧、中農巩固地团结在一起。

这里还須特別对富農的問題談一下。一般說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其生產方式与地主比較是進步的，但很多富農又帶着封建尾巴，例如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貸等，政治上与地主結合一起压迫農民，因此又与農民有尖銳的矛盾。从党的歷史上說，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不是消滅富農的政策，党曾指出：“必須把地主、富農分別清楚，在無情地消滅封建殘余斗争中，決不容許任何消滅富農的企圖。”（查田运动初步总结）但对于富農中的反动分子則采取了嚴厉的办法。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減租減息，“对于富農，則鼓励其發展生產。”（論联合政府）第三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土地法大綱”是消滅富農的精神，而到1950年的“土地改革法”則又是保存富農經濟的精神（理由已如前述）。被保留下來的富農，在農業合作化的运动中將被逐步消滅。

三、土地改革对于革命的意义

土地改革不僅是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也有極大的意义。

在人民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以工人階級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組成統一戰綫，打倒帝國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資本主义的独裁專政統治。那么哪些人是民主階級，哪些人是革命动力呢？毛主席指出：“除了無產階級是最徹底的民主派之外，農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

（論联合政府）党早經指出过：“資產階級性的民权革命階段之中的动力，現在只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党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毛主席又說：“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

農民革命……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質上就是授權給農民。”（新民主主義論）這都說明在人民民主革命時期農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農民的問題主要是土地問題，所以黨領導農民進行了土地改革，滿足了農民的要求，充分發動起農民，從而就保證了革命的勝利。現就土地改革對革命的關係，舉出以下幾點：

一、武裝農民，進行革命戰爭，並贏得戰爭的勝利。大家知道，進行革命戰爭，必須要有戰無不勝的軍隊。中國革命特點，就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斯大林語）。武裝從何處來？毛主席指出：“農民——這是中國軍隊的來源，士兵就是穿起軍服的農民，他們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敵。”（論聯合政府）土地改革後，農民覺醒起來，拿起槍杆，保衛自己的土地，參軍成為農民自覺自願的行動。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紅軍發展到30餘萬人，抗日戰爭結束後，人民解放軍有128萬人。這些，絕大多數都是土地改革中的翻身農民。因此，黨在軍事方面所取得的勝利——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爭的勝利，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都是與土地改革分不開的。在各個戰爭的時期里，地方的農民武裝起了重大的作用。農民的武裝組織形式很多，例如赤衛隊或自衛隊，少年先鋒隊或青年抗敵先鋒隊，童子團或兒童團等，差不多所有少、青、壯都組織了起來。其中覺悟較高的精壯分子，組成紅軍預備隊或民兵，他們差不多都有槍枝，就成為正規軍的源泉。這些武裝組織，平時在村里站崗放哨、送信、盤查漢奸與反革命、控制坏人、監視地主。戰時就打游擊戰爭，幫助正規軍護送糧彈、傷兵。很多地主在國民黨的豢養下組成還鄉團進行“倒算”，民兵打擊“倒算”，有的地方几乎是天天打仗。在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的戰略方針就是：基本的是游擊戰，但不放鬆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民兵廣泛開展游擊戰、地道戰、麻雀戰、地雷戰，對於戰爭的貢獻是很大的。

二、發展農業生產，並進一步引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

實行土地改革，農民獲得土地，農民生產

積極性提高，農民在土地上深耕細作，進行各項耕作的改良，農業生產就有顯著的發展。根據記載：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33年在贛南閩西地區農業生產曾比較1932年增加了15%，而在閩浙贛邊區則增加了20%；在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1943年比1942年收成增加一倍；到1952年（全國解放後經濟恢復的最後一年）全國農作物總產量已超過抗戰前最高年產量的16.9%。這說明，雖然是在戰爭的年代里，但農業生產仍是逐漸上升的。

農業上的這種增加生產，是與發展農業的互助合作分不開的。土地改革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于農民是私有者而表現出的個體經濟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又是表現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趨向；另一方面是由于農民是勞動者而表現的互助合作的積極性，這種積極性是表現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在我國，因為有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實行土地改革後農民對工人階級的無限信任，以及工人階級與農民群眾的利益一致性，大家都希望擺脫資本主義的剝削，走共同幸福的大道；因而，就有可能克服、避免農民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走向社會主義的大道上來。互助合作逐步地發展起來。遠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江西等紅色區域內，互助合作已有發展，農民組織過消費、糧食、信貸和勞動互助組、耕田隊、犁牛社等各種合作組織。1933年，江西、福建17個縣統計，就有各種合作社1,425個。在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各種合作社與農業生產互助組織發展的更廣泛。在農業上組織起來很多變工隊、撥工隊、互助組等等勞動組織。1943年毛主席發表“組織起來”，指出了方向，農業互助組更加發展。例如陝甘寧邊區，有10%的全勞動力經常互助勞動，臨時性的以延安縣為例，達70%。農民說：“互助起來頂機器。”互助以後，一般兩個人頂三個人的勞動，生產大大提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在農業生產上，除了常年的和臨時的互助組之外，半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合作社也有很大的發展，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合

作社也出現了。特別在1955年7月以後，傳達了毛主席“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判了右傾保守主義傾向，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來了。到1956年1月底的統計，入社總農戶已經占到全國總農戶的78%，共有9,281萬多農戶，其中屬於高級社的農戶為2,459萬戶。根據“1956年——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規定，要分別在1957年和1958年全國基本上實現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化。這種偉大合作化的發展，與土地改革正是前因後果。

三、土地改革給國家工業化造成條件。毛主席曾指出：實現耕者有其田，“使農民從封建的土地關係上獲得解放，使農業從舊式的落后的水平進到近代化的水平，從而使工業獲得市場，造成了將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可能性。”（論聯合政府）這個問題現在看的更明白了。我們從以下兩方面來說明：一方面工業上用的原料，特別是輕工業的原料，例如棉花、煙草、甘蔗等等，必須農業上來供應；就

當前說，我國用農產品作原料的工業產品，要占工業總產值的50%以上，這就說明工業與農業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了。其次，工業上用的以及工人吃的糧食，也必須農業上來供應。沒有糧食工業生產是無法進行的。這說明必須首先實行土地改革，並進一步實現農業合作化，使農業從分散的落后的狀態，進到集體化和機械化，大大發展農業生產，才能充分供應工業上的這些需求，給工業化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只有農業發展了，農民購買力大大提高，農民要求工業上大量供應所需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如拖拉機、各種農業機器、化學肥料、運輸工具、煤油、電力，以及布匹、鞋襪等等，使工業有了廣大的市場，從而工業才能大大發展。再以當前的情況為例，自全國農業合作化的高潮到來，農民要求供應大量雙輪雙鐮犁、拖拉機、電話機等等，就很顯明。因此，從以上兩方面看，沒有土地改革、沒有農業合作化以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並使國家工業化是不可設想的。

法國的胡格諾戰爭

楊宗遂

發生於十六世紀中期的法國的胡格諾^①運動，以及隨後發展起來的胡格諾戰爭，一直到1598年“南特敕令”的頒布才算基本結束，到1629年阿萊和約的締結與“恩典敕令”的頒布才算徹底解決。這是一個歷時長久而複雜的問題。本文擬着重分析其發生的社會經濟背景，並對戰爭的簡單過程及性質加以闡述。

胡格諾運動及隨後發展起來的胡格諾戰爭的根本原因，必須從當時法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變化與矛盾，以及由此種變化與矛盾所引起的階級關係的變化與矛盾中去尋求。因為只有研究生產方式中的變化與矛盾，以及為它們所決定的、適應於它們的社會階級關係的變化與矛盾，才能闡明歷史上的問題。

一、胡格諾戰爭發生的社會經濟背景

十六世紀前半期，法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情況是：封建制度趨於瓦解，資本主義因素開始發生。

首先，讓我們考察一下當時工商業的狀況。

十五世紀末及十六世紀上半期，法國已開始出現分散型的和混合型的手工業工場。原來以行會方式組織起來的手工業部門，開始向著上述兩個類型的手工工場轉變，波亞迭的呢絨

^① 喀爾文派在法國稱為胡格諾（Huguenot）。關於這個名稱的來源有各種說法，有人認為這一名稱源於法文，有人認為是從德文變形而來，迄無定論。

業，綢緞與不列特尼的麻織業就是明顯的例子。除舊有手工業的轉變外，還有一些新興的手工業部門，其中最著名的有絲織品、彩色玻璃、琺瑯器皿、化妝品等製造業及印刷業。采礦和冶金事業也得到較大的發展，並且由於它們與武器製造有密切關係，受到國家的特別扶助。法國的絕對君主政體在其剛開始形成的時代——路易十一的時代（1461—1483），就已採取了保護和鼓勵工商業的政策，到十六世紀上半期更進而實行了保護關稅制度。這種對糧食與原料出口及制成品進口征收高額稅的措施，使法國新興的工場手工業獲得了發展的保障。

不過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當時仍然還是比較微弱的。分散型和混合型還是工場手工業一般的組織形式。這兩種形式是建基於細小的個體生產上的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它們還不是工場手工業中最先進的形式，因為它們還沒有把生產推進到完全社會化的基礎上，而這一點只有集中型的手工工場才辦得到。其次，手工業中行會的殘余勢力還相當濃厚，甚至在一開始就以集中型方式組織起來的印刷業里也看得到這種殘余勢力。在印刷業中，工人仍然被視為幫工，仍然存在著學徒制度，同時幫工們的組織仍然沿用著舊日依行業而劃分的兄弟會形式。

在商業方面，由於手工業的發展，區域分工已逐步形成，例如上面談到過的波亞迭的呢絨業，里昂一帶的絲織業等。區域分工使得國內經濟聯繫日益密切，全法蘭西統一的內部市場趨於形成。商業發展還表現在市集與廟會數目的增加上，1489—1515年國王就批准設立了四百個左右的市集與廟會。但是國內市場的形成還受到封建割據殘余勢力的阻礙，封建主在其領地內的道路與河流上設置著“合法的”以及非法的關卡，征收過境稅。度量衡及貨幣制度尚未統一；道路失修，河流淤淺，運輸遇到許多困難。十六世紀上半期曾經由國王發布過一些反封建主私設關卡的敕令。1540年頒布了全國商人必須使用的“國王的量度”——標準尺。統一貨幣的工作也在進行。在絕對君主

制與封建割據力量的殘余作鬥爭中，商業的發展和國內市場的形成逐步地向前推進。

對外貿易也有發展。地理大發現後，歐洲商路與商業中心逐漸轉移。法國西海岸的一些港口發達起來了。這些港口有波爾多、拉羅塞爾、南特、第厄普等。古老的商業貿易港口——馬賽與東方的貿易也增強了。同時里昂成為全歐有名的商業中心之一和重要的金融市場。法國資產階級當時主要的事業是商業、高利貸、包稅及國債事務。

現在讓我們再看一下農業。

十六世紀上半期法國國民經濟中農業占著主要地位，只要指出當時居民約有百分之九十是居住在鄉村這一事實就足以証明了。

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在農村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封建主中的絕大部分（東部和北部少數地區除外）已放棄了莊園制的經營，地租形態由勞役和實物轉向貨幣。勞役地租的消除使農民人身依附的束縛大大減輕。從十二世紀以來即開始進行的農民贖取自由的过程到十五世紀末已經基本上完成。法國的農民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封建的世襲租佃農。他們對於土地的占有權是世襲的，而且這種占有權還相當廣泛，農民甚至可以事先得到封建主的允許而出賣其占有權——把他所占有的土地轉讓給另外的人來進行耕種。這時農民雖然還沒有完全擺脫封建的超經濟強制（他們還要受封建主法庭的審判，還處於無權的、低下的等級地位），但是他與領主的关系主要是系在貨幣地租這個紐帶上的。土地雖然還是封建主所有，但農民由於贖得了人身自由，世襲地享有廣泛的占有權、地租額的固定，他們已經接近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了。所以馬克思把這樣的世襲的封建占有者稱作“自由的自耕農民（Bauer），儘管這些自耕農民的所有權，還由封建的招牌隱藏著。”（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905—906頁）由於封建社會里地租的傳統定額，此時法國農民每年所繳的貨幣地租是為數不大的。這種定額的封建地租（Cens）受到價格革命（開始於十六世紀）的影響，其價值不斷下降。因為這種地租當時

是以貨幣來繳納的，貨幣的價值在價格革命中下跌了，當貨幣的量沒有改變時，那麼這定量的貨幣所代表的價值自然隨着貨幣貶值而減低了。農民本身由於經濟獨立性的加強及與市場聯系的加強，日益走上小商品生產者必然要走的分化的道路。農村里出現了富有的農民與貧苦的農民。

法國的農民如果就只負擔這為數不大的定額貨幣地租的話，那就很幸運了。但事實並不如此，另外他們還有兩種負擔。建立在龐大官僚系統及常備軍基礎上的絕對君主制需要大量的財政開支，同時它還要付給它的主要支持者——官僚貴族及中小貴族以一筆為數不小的恩俸及養老金。所以隨着法國絕對君主制的加強，人民的捐稅負擔日益加重了。絕大多數的捐稅是由占人口數目中最多的農民來繳納的。沉重的捐稅、贖取自由的贖金、生產上的支出（這種支出在十六世紀上半期農業生產向上增加時是比以前一個世紀要多的）使中下層的農民不得不向高利貸者告借。當然這種債務農民是很少能償清的。債務就因之固定在作為債務擔保物的土地上了。有的土地不僅押過一次，而且押過好幾次；這種隨着債務的固定而固定在土地上的利息就像地租一樣每年要繳納，如果一輩人償不清債，下輩人還得繼續交利息。因此當時人把這種償付給高利貸者的、固定分配在土地上的利息稱作“額外地租 (Surcens)”。

除了這三種負擔——地租、國家捐稅、高利貸的利息外，農民還要受到其他形式的剝削。資產階級不但以高利貸的方式滲入農村，而且還和官僚一樣在農村購買土地。由於當時法國工商業發展的速度與規模不夠大，不足以向農村提出要求供給大量商品糧食與原料的任務，因而也就沒有促使在農村中組織大生產的動力。因此法國的資產階級和官僚就沒有以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組織生產，而是把土地租佃給農民耕種，收取地租。但他們所實行的租佃制已不同於封建的世襲租佃制，而是定期的分成制 (Metayage) ①。分成制是一個由封建的租佃關係轉變到純粹資本主義租佃關係的過渡形式，因為地主所得的那一部份已不是純粹的

地租，其中還包含着地主以種子、農具、耕畜等形式所供給予租佃者的那一部份資本的利息和一個地租餘額②。顯然，法國的農村還沒有出現像英國那樣的大規模資本主義經營方式，因此使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的原始積累過程也就不如在英國那樣迅速地、大規模地進行。但法國畢竟還是有着比英國與尼德蘭北部緩慢的原始積累過程。農民本身的分化為捐稅、高利貸、價格革命等所加速。貧苦的農民逐漸喪失土地而變為流浪漢。十六世紀的摩林 (Moulins) 法令便是與英國原始積累時期的“濟貧法”相當的法令。

簡略地說來，法國農村在十六世紀上半期，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生產關係已在瓦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正在開始產生。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農民不但受着沉重的封建剝削（國家稅收是封建地租的另一種形式，其中的相當一大部份是由國家以恩俸、養老金等形式補助給日感入不敷出的封建主階級，特別是其中的中小貴族及宮廷貴族），而且還受着開始產生的資本主義剝削。農民中分化加速了，中下層日益貧困，以致部份人喪失了土地。

根據以上對十六世紀上半期法國經濟狀況的分析，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十六世紀上半期在法國占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封建的生產關係，但是它已經在瓦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在工商業中，在較小的程度上，在農業中都發生起來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工商業和農業中的發展，日益要求擺脫封建制度的束縛，特別是殘余的地方勢力以及封建割據殘余的束縛。

由於經濟發展的变化，引起了階級關係的变化。現在讓我們來逐一地分析各階級的情況以及當時的階級矛盾。

封建主。大封建主由於地租額固定，已經感到收入不足以滿足他們奢侈生活的需要。十

① Metayage 有人譯為對分制。但對分只是 Metayage 租佃制中比較流行的一種形式，不能概括全體。故本文依中文本“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譯為分成制。

② 參看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048頁。

六世紀歐洲的價格革命在法國也不例外，據統計，在1520——1529年100公升的小麥在巴黎售價為50克銀子，到1580——1585年即增為125克銀子，60年間增加約2.5倍。價格革命使收取定額貨幣地租的大封建主們收支更加懸殊。絕對君主制在法國的加強，取消或大大限制了大封建主在舊日許多可以利用來增加收入的特權，如設置關卡、審判權等。十五世紀以來，王權日益具有絕對君主專制性質。而強大的農民群眾的反封建鬥爭之存在使大封建主一般地還不敢反叛，他們只希望從國王那里獲得大量恩俸，或者促使國王進行對外征掠，以解決他們面臨破產的危機。但是，在另外的條件下，大封建主企圖完全恢復割據特權的意圖却并未解除，毋寧說他們在時刻伺機以實現這一意圖。

中小封建主的情況却不是這樣。他們雖然也同樣遭遇着收入減少的困難，但他們中許多人長期在國王的軍隊和政府中工作，取得俸祿及額外收入。同時他們害怕大封建主的壓制，更害怕他們單獨無力鎮壓的農民起義，因而緊緊地依靠着既可限制大封建主力量、更可鎮壓農民的絕對專制王權。

資產階級。從工商業發展的情況中，我們已看到王權對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當時起着保護的作用。資產階級的企業在王權的羽翼下日漸擴大繁榮。另一方面，他們靠包稅和國債事務獲得了大量的利潤。在政治上他們又以法律家和官僚的身份參加到國家的管理中來，與王權結成聯盟。這些事實表明了法國資本主義發展與專制王權的關係。法國資產階級的前輩——市民，從十二世紀上半期路易七世時，即開始與王權結成聯盟，支持王權進行反對大封建主地方割據的無秩序狀態。在當前，資產階級發展的狀況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資產階級的利益，僅僅是與封建割據殘余勢力之間有矛盾，對於整個封建制度來說，它沒有力量加以顛覆，而且基於反對勞動人民的要求，基於反對殘余割據勢力的要求，特別是它與君主專制國家的經濟上的利害關係，決定了它寧願支持一個強大的君主專制體制。所以這種聯盟雖然曾

經破裂過，但它一直延續下來，而且越來越鞏固了。因此，在他們面前所提的問題是：支持專制王權反對封建割據的反動勢力，而不是立即走上資產階級革命的道路。

這兒附帶說明一下匠師（市民的主要組成部份）的問題。十六世紀行會制度已成為生產發展的障礙，匠師們形成了一個固步自封的特權集團，他們不是像資產階級那樣隨着新的生產方式一同前進，而是千方百計地保持舊有的行會生產。專制王權對城市自治與特權的取消、國家稅捐的增加、官僚的貪污舞弊使匠師們極為不滿。他們希望回到城市自治的時代，恢復行會特權。這種傾向使他們與封建割據勢力極易合流。

農民與平民。農民受着國家捐稅、地租、高利貸三重剝削，同時超經濟強制的殘余還束縛着他們。向上升的那一部分農民力求擺脫一切的封建桎梏，成為獨立自由的小商品生產者。向下降的那一部分（占農民中的絕大部份）受着封建的剝削和壓迫以及初起的資本主義剝削，在現存的封建制度下感到無法再活下去。他們決意抓住一切機會進行反封建的鬥爭。十六世紀前半期規模巨大的農民暴動便是明証。

城市平民（包括破產的匠師、幫工、學徒和工場手工業里的工人）身受到封建的與資產階級的剝削，工資本來就只夠維持極低水平的生活，加以價格革命時實際工資減少（十六世紀法國的物價平均漲2.5倍，貨幣工資只增加了25%），生活艱苦，但沉重的國家賦稅還有一部分要由他們來負擔。在他們中間，破產的匠師、幫工、學徒還喪失了以前在自治的城市中所享受的某些政治權利，因為城市自治機構被專制君主的官僚系統所代替。在喪失這些權利的同時，他們還受到專制王權所委派來的官僚的額外勒索。不消說，他們和市民及新興的資產階級有着矛盾，但這時他們的憤怒主要是指向封建制度。反對國家稅收及官僚貪污的城市平民運動時有所聞，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548年在法國西南部的波亞迭、桑通日、基恩、里木森（Limousin）發生的起義。在波

尔多城，起义者殺死了总督。

很顯然，正是人民群众的反剝削、反封建制度的斗争，成为决定法國歷史發展方向的主流。

总括对于各階級情况及当时階級矛盾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十六世紀上半期，在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存在着中央集权势力与割据势力間的矛盾。正在成長着的資產階級，就其力量而言，尚不足以建立自己的階級統治，而在割据与集权的斗争中，基于他們的利益，也就自然站在以君主为首的一端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与封建制度間的矛盾仍然是当时社会的根本矛盾；而人民群众反封建斗争的發展，向統治階級（包括支持君主專制的資產階級在內）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即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進行政治統治，俾使封建剝削得以維持下去呢？固然，这里爭論的問題是集权还是割据的問題，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封建貴族間、貴族与資產階級間的斗争是势均力敌的，因之当时即使維持等級君主制还是無法巩固这一集权的統治。因此，由于社会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各階級力量对比的变化就要求把权力集中于“超乎”各階級之上的絕對权力，以維持其共同統治，正如恩格斯說：“那时相互斗争的各階級达到了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國家权力暂时取得了对于两个階級的某种独立性，当作他們的假像的中間人。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專制君主政体，就是这样的，它使貴族階級与資產階級互保平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六五頁）于是絕對君主專制的統治形式問題便提出來了。

胡格諾战争就是在这一社会經濟背景上所產生的。1494——1559年法國对意大利的战争之失敗引起了王权的暂时削弱和大封建主势力之加强，因而將封建主內部的矛盾抬到了首位，而爆發了胡格諾战争。在該战争進程中大封建主与資產階級的矛盾亦被引發起來，而人民群众与封建制度間的矛盾則被封建主間的長期战争推到了矛盾的頂峰，終于迫使由于互相斗争而削弱了的大封建主不得不將國家权力轉归为資產階級所支持的王权，而形成絕對君主專制

的局面。

整个胡格諾运动与胡格諾战争是在宗教的旗帜之下進行的，在宗教旗帜下，法國統治階級分化为兩大对壘的集团。終致釀成在宗教旗帜掩盖下的封建的战争。

十六世紀二十年代路德派开始在法國的資產階級与手工業帮工中傳播。当时由于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正和德國新教諸侯联合反对查理五世，因而对于路德派未加迫害，任其在法國全境傳播。十六世紀三十年代，路德派的势力擴大了，王权与天主教开始感到不安，乃轉而采取迫害政策。十六世紀四十年代喀尔文教也开始在法國資產階級与帮工中間傳播。資產階級之所以接受路德教，或者是比它更激進的喀尔文教，主要是它們符合于資產階級对“廉价教会”的要求；同时，它們在宗教問題上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思想等等。但資產階級并無意把它們当作反对王权的工具。資產階級要求宗教改革，但是拥护王权。麻煩的事情是，他們所反对的天主教在当时的法國卻又是与他們所拥护的王权占在一边的。帮工們相信喀尔文派或路德派，主要是以反对正統教会的方式來表达他們的社會要求，表达他們反剝削、反压迫的思想。后来喀尔文派也在法國南部農民中傳开了。喀尔文教民主共和的組織制度与正統天主教的等級制度、封建社会的等級制度是直接对立的。因此農民們把它看作是以前流行于法國南部的農民、平民异端的复活，法國南部許多封建主也开始参加喀尔文教。他們借喀尔文教來反对天主教，以便把天主教会的土地世俗化。另一方面，利用喀尔文教的共和制組織來与君主專制对抗，作为向君主索取地位与恩俸的工具。后来，当这个目的不能达到时，他們更進一步把它作为反叛的号召。封建主参加喀尔文教，主要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所以他們被当时人称为“政治上的胡格諾”。資產階級、帮工、農民等普通信徒則被称为“宗教上的胡格諾”。很明顯，封建主在利用人民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力量逐漸增漲。1559年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的胡格諾教全國宗教大会，1561年全法國

已有2150个胡格諾的教堂。

法國北部有分离傾向的大封建主仍然信仰着天主教。这是什么原因呢？北部很早就統一在王权之下，而南部統一較迟，并且王权还没有在那里生根。因此，國王对北部的封建主总要信賴一些，觉得他們比較可靠，不会反叛。选拔高級官吏、頒發恩俸都以他們为主要对象。由于北部大封建主接近宮庭，他們就有“挟天子以令諸侯”的机会，專断朝政，以圖私利。所以，他們一般都采取以拥护王权为名而行分离之实的政策。于是，在兩大封建主集团——南部的胡格諾集团，北部的天主教集团的斗争中，北部集团一开始就戴上了“王权的保护者，天主教信仰的保护者”的面具。

南部的封建主集团以胡格諾教为号召。領袖是波旁·安东（波旁家族是法國王朝的旁系），柯蒂，波旁，亨利，科利尼。北部封建主集团以拥护天主教及王权为号召。領袖是佛朗素·介斯和查理·介斯。前者当时是朝廷的总司令官，掌握着全國的軍事大权；后者是天主教的樞机主教，同时在朝廷总攬民政。1563年，佛朗素·介斯死去，天主教封建集团由他的兒子亨利·介斯繼續領導。由于这个集团的領導者皆出身洛林的介斯家族，故它又可称为介斯集团。

在朝廷內，还有所謂“政治家”集团（Politiques）。組成成份是官僚及部份已与專制王权利益趋于一致的宮庭貴族。洛比特首相是他們的領袖。他們主張，調和宗教糾紛，容許新教信仰，反对封建割据，巩固君主專制。他們受到大多数普通貴族——中小封建主及城市的支持。

二、胡格諾战争的經過

战争的开始，意大利战争在1559年结束后，大封建主对外掠夺财富的机会喪失了，注意力又轉回到國內來。由于对外战争所造成的國庫財政的枯竭，國王已無力再發給封建主以大量的恩俸同时并使王权削弱，这就成为他們实行分离割据的好机会。亨利二世于1559年死去。后繼的法蘭西斯二世（1559——1560），

查理九世（1560——1574）及亨利三世（1574——1589）都是年幼即位或沒有才能的人物。他們的母親美弟奇的喀德鄰成为宮庭实际的主持人。她希圖利用兩個封建主集团之間的矛盾來保持王权的优势，但是沒有成功。1560年發生了胡格諾集团所策動的昂布瓦斯（Amboise）陰謀。胡格諾集团准备挟持國王，以其名义执政，排除天主教集团，召开三級會議以樹立他們的优势，保障胡格諾的信教自由。但这个陰謀被天主教集团粉碎了。1560年國王召开三級會議來討論“宗教糾紛”，但三級會議沒有解决兩派的紛爭。1562年國王頒布了正月敕令，在一定条件下允許胡格諾的信教自由，但是兩派对立的局面并未因此松馳。1562年3月1日弗朗素·介斯公爵在法國东北部香濱的瓦西城攻击一个正在举行礼拜的胡格諾集会，殺死23人，伤100人。这件事掀起軒然大波，成为敌对軍事行动的導火綫。

从1562——1568共經三十六年的封建內乱开始了，其中發生过十次大战役，七次和議。至亨利四世進入巴黎即位，才算平息下去。

战争的第一时期（1562——1572）始于瓦西屠殺，止于聖·巴托羅繆之夜的屠殺。这个時間，兩封建主集团皆以爭奪对國王的控制为目的。經過三次战役后，訂立聖·日尔曼和約。和約規定：允許宗教自由，允許胡格諾担任官职，允許胡格諾保有四个軍事据点，其中包括拉罗塞尔。胡格諾派獲得了勝利，他們在宮庭中的影响加强了。不滿意这种情况的喀德鄰及天主教集团乃于1572年策動了8月24日夜的聖·巴托羅繆節的大屠殺，全國被殺的胡格諾教徒在三万到五万人之間，在这以后，战争便發展到了第二階段。

战争的第二階段（1572——1585）从“聖·巴托羅繆之夜”起，至巴黎联盟的建立为止。这一段的特点是战争之激化和法國南部与北部澈底分离。

胡格諾派在受到打击后，开始在南方建立独立的胡格諾共和國——这實質上是封建主們的“共和國”。参加共和國的，不僅有南方許多封建主，而且還有許多城市。南方許多城市

里，行會力量還相當大。行會匠師不滿于專制政權對城市原有自治權的剝奪，不滿于沉重的國家捐稅，痛恨官吏貪污，因而對專制君主實行反抗。城市平民也行動起來，他們反對捐稅，反對官吏貪污。封建主利用城市這種反專制，反封建的力量來服務於他們割據的行動。

南北之間經過兩次大規模戰役之後，1573年訂立和約，在這以後，欲圖控制國王的北方天主教集團，於1576年組織了天主教聯盟，在巴黎方面，不滿意國王讓步政策和大封建主專橫的市民和狂熱的天主教徒於1584——1585年組成了巴黎聯盟。這一聯盟不久也轉于介斯公爵控制之下。法國從此陷於更加混亂狀態。

戰爭的第三階段（1585——1598）始於1585——1589年所醞釀的三亨利之戰，而終結於1598年南特敕令的頒布。這一時期由於亨利·介斯之企圖取得王位繼承權而於1588年為國王亨利三世所殺死，結果引起北方封建主和巴黎的反抗，亨利三世逃出首都，而與亨利·波旁（胡格諾派）結盟反對北方，這一時期不僅巴黎形成“共和國”，法國其他各城也成立了類似的共和國，於是法國更加陷於分裂狀態。

不滿意國王的北方封建主於1589年刺殺了亨利三世，亨利·波旁依照他與國王的協議繼承王位，稱亨利四世，在這以後，南北重新開始了戰爭。

這時，法國國內產生了新的變化。

長期的內戰使得法國人民遭到巨大的損失。不管南方與北方封建主的軍隊（其中有許多是外國人組成的雇傭軍），在戰爭中都大肆搶劫、蹂躪人民。同時，戰爭加重了人民的捐稅負擔。農民與城市平民開始大規模暴動。1586年在諾曼底發生了一萬餘人的農民暴動。起義者已不再僅是把王權或者某一封建主集團認為是他們的壓迫者。他們開始把鬥爭指向整個的封建主階級，不管他們是胡格諾派還是天主教派，專制王權或一般的封建主。這一點在不列特尼的農民起義及波亞迭、桑通日、里木森、貝里哥爾、瑪爾什五省中、西部省份的“克洛塔”^①農民起義中表現得最明顯。農民捉住貴族、收稅吏就立即殺死，不管他們是哪

一個集團的，不管他們是擁護國王的還是反對國王的。“克洛塔”農民起義延續了三年（1593——1595），國王軍隊費了極大氣力才把它鎮壓下去。因長期戰爭而被削弱了的法國所有的封建主都被這些規模巨大、氣勢洶湧，而旨在反抗整個封建主階級的農民起義嚇住了。他們認識到，只有立即團結到王權周圍才能保住封建統治。於是，許多天主教方面的封建主投到了波旁·亨利的一邊來。

巴黎的資產階級和貴族被行會匠師們的獨立行動及城市平民堅決反對專制、反對封建的起義所震動，也希望趕快和波旁·亨利妥協，以便重新樹立能夠保護他們利益的專制王權。介斯集團消滅了巴黎的“共和國”並和波旁·亨利談判。1593年7月波旁·亨利宣布改信天主教，這樣便掃除了他與巴黎的封建主集團及資產階級謀取妥協的道路上最後的障礙。1594年他進入巴黎即位，稱亨利四世。人民反封建的起義迫使封建割據勢力迅速投向國王，資產階級也被人民運動嚇住，希望國王趕快安定秩序，恢復統一。為了迅速結束彼此間的戰爭，按照1598年的南特敕令，宣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和允許胡格諾封建主保留其在法國南部的二百多個要塞等權利，胡格諾戰爭於是終結，到路易十三時（1610——1643年）這些特權終被摧毀，絕對君主專制已發展到完全鞏固的地步。

三、結束語

現在，給胡格諾戰爭作一簡短的結語。

胡格諾運動開始是一個宗教改革運動。但它很快就被封建割據勢力所利用，成為法國兩大封建主集團彼此之間以及他們與專制王權之間的內戰。其結果是相互鬥爭的兩大封建集團間實力之削弱與人民群眾反封建鬥爭的爆發，封建主階級才懾於人民的威力，彼此妥協。封建割據勢力才急忙轉向王權，以便支持王權來鎮壓人民起義。戰爭於是以前專制王權對封建割據勢力的勝利而告終。從此法國資本主義發展所要求的絕對君主制最後地確立了。

① 農民起義者攻擊貴族、收稅吏等時，便高呼“Aux croquants”（向鼠類進攻），所以1593—1595年在這五省發生的起義，被稱為“克洛塔”起義。

第一次俄國革命和亞洲的覺醒

И. М. 列伊斯基

如列寧所說，當“西方已完結了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東方尚未成熟到實現這種革命的地步”^①的時候，1905——1907年的俄國革命打斷了資本主義相對地和平發展的時期。二十世紀初葉，為帝國主義所奴役的千百萬亞洲人民，在自己的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起來為獨立和民主權利而進行自覺的政治鬥爭。在自己的名著“亞洲的覺醒”中，列寧指出在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影響下，東方國家所發生的顯著的變化：“隨着1905年的俄國運動，民主革命席捲了整個亞洲——土耳其，波斯，中國。在英屬印度，動盪是在增長着。”^②

列寧在這一著作中分析亞洲革命高潮的原因說：“世界資本主義與1905年的俄國運動最後喚醒了亞洲。”^③如我們所知，列寧把第一次俄國革命所引起的殖民地人民的解放運動廣泛展開的年代，分為兩個時期。這裡先簡單地談談這兩個時期。

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身，為亞洲革命爆發創造了先決條件。受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法則作用所制約的帝國主義國家經濟，不可避免地以對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剝削為前提，來擴大資本、原料和銷售市場的范围。這樣，正好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性質引起了殖民地國內商品經濟的廣泛發展。殖民地國家中資本主義結構某種程度的發展（雖然較為薄弱）也成為不可避免的。“資本的輸出，——列寧指出——在所輸到的那些國家中，是要影響到那里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且異常加速這種發展的。因此，資本的輸出，在某種程度上固然是引起輸出國發展上相當的停滯，但這種停滯又只會使資本主義在全世界上擴大加深其向前的發展。”^④

這樣一來，帝國主義的剝削，當它在殖民地中擴大商品經濟的時候，便為殖民地的資本

主義的一定程度發展創造了前提。可是，它同時又妨害了殖民地資本主義結構的徹底完成，保留了封建制的殘余，並阻礙了簡單商品經濟順利地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

這也是很明顯的。到了二十世紀初葉，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和附屬國中的主要社會支柱是封建地主，他們在和農民的鬥爭中無力保住自己的陣地，因而，只好匍匐在殖民者的腳邊。於是，在二十世紀初葉，大多數亞洲國家中的外國殖民者的統治，都變為保持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最主要的工具。帝國主義掠奪所造成的某些經濟後果，也有助於保存附屬國中的封建殘余。殖民者既然把殖民地國家當作宗主國取得農業原料的附屬品，因而便千方百計地阻撓輕重工業的發展。他們僅僅建立了一些最起碼的、為帝國主義本身所必需的原料初步加工的企業，緩慢地、畸形地發展若干輕工業部門。這種對城市工業的人為的阻撓，配合以商品經濟較廣泛的侵入農村，使亞洲各國發生了大量相對的農業人口過剩。千百萬破產的農民，不可能逃到城市去（如工業‘自由’發展中所發生的情形一樣），而被迫留在鄉村，只好在地主和富農任意的盤剝租賃條件下屈服。這就是亞洲農村中保持封建殘余的經濟條件。

因此，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就使得二十

① 列寧全集，第18卷，第545頁，俄文版。中文版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6頁。

② 列寧全集，第19卷，第65頁，俄文版。中文版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9頁。

③ 列寧全集，第19卷，第66頁，俄文版。中文版同②，第40頁。

④ 列寧全集，第22卷，第231頁，俄文版。中文版同①，第973頁。

世紀初叶在最發展的國家中形成了資產階級革命的經濟前提。在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伊朗、土耳其和一些其他國家中，商品經濟獲得廣泛的發展，形成了資本主義結構的最初的因素。同時在亞洲這些國家中保存着強大的封建殘余，它的繼續存在，主要是由於帝國主義的支持。沒有革命的改造，這些國家就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根據這直接結果的性質看來，這種改造只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這種革命的客觀特殊性就在於：它不僅反對封建主義，而且反對外國帝國主義，不僅要求反封建，同時也要求反帝國主義的運動。

當然，在亞洲的國家中為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所準備的基礎是各有不同的；但是，對革命來說，整個殖民地亞洲在二十世紀初叶却都已醞釀成熟了。

必須有一個強大的推動力來發動亞洲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力量。1905年的俄國革命，“帝國主義時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①，正是這樣的推動力。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幾萬萬被壓抑的、沉睡在中世紀停滯狀態中的人民醒悟過來，要求新的生活，為爭取人底初步權利、為爭取民主而鬥爭”^②。亞洲開始覺醒了。1905年伊朗爆發了革命，1908年土耳其開始了資產階級革命，1911年革命蔓延至全中國。在這些年代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亞也掀起了大規模的解放運動。

而且，亞洲的覺醒不僅表現在革命運動數量上的增長，同時也表現在它的質量上的變化。1905年以前，亞洲人民群眾鬥爭的基本形式是為落后的、中世紀的觀念形態所支配的自發的農民起義，按列寧的說法，也就是“中國舊日的騷動”。1900年中國人民的起義便是這種‘騷動’的鮮明例子。但是，1905年以後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卻採取了自覺革命和民主鬥爭的形式。

自然，亞洲覺醒的時代不曾具有、同時也不可能具有被壓迫民族革命民主運動的高級形式——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鬥爭。因工人階級力量還太薄弱，而且沒有組織起來。因此，二十世紀初叶，各亞洲國家的革命民主

陣營雖然在客觀上有無產階級和農民參加過，但是它唯一的政治代表者却是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在小資產階級必然動搖的情形下，他們在這個時期大體上貫徹了革命的政治路線。關於亞洲國家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1913年列寧曾寫道：“在那裡資產階級還與人民一同反對反动勢力。”^③在俄國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亞洲許多國家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開始和人民群眾建立了聯繫。在一些國家中，陰謀叛亂的小資產階級組織，變成了群眾性的政黨（中國的‘同盟會’，印度尼西亞的‘回教聯盟’）。

在亞洲覺醒時代，這些國家的大資產階級占有特殊的地位，它的政治代表者是自由派的份子（因此我們以下即把它叫做自由資產階級）。這些自由資產階級，一方面因畏懼群眾的革命運動而和外國帝國主義者緊密地聯系着，另一方面他們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的壓迫。這種情形和在整個民主革命期中反革命的俄國資產階級有所區別，亞洲國家的自由資產階級當時實具有一定的革命可能性。在革命的最初階段，他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但是隨着人民群眾越來越多地參加到鬥爭中來，自由資產階級便越來越向右轉，終於和帝國主義與反动勢力勾結在一起了。在覺醒了的亞洲國家中，革命運動的規模、徹底性和它的成就，主要是以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對自由資產階級的動搖性的控制達到何種程度，和在革命中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表現得怎樣為決定。列寧論述當時亞洲各國階級力量的對比的情形以1911年中國革命為例，這樣寫道：“中國的自由是由農民民主派與自由資產階級底聯盟所爭取的。未被無產階級政黨所領導的農民，能否保持自己的民主主義的立場來反對只待良機到來就會向右边奔去的自由黨

① 參閱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一月廿五日，蘇共中央馬恩列斯學院“第一次俄國革命五十周年紀念宣傳提綱”。

② 列寧全集，第19卷，第66頁，俄文版。中文版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0頁。

③ 列寧全集，第19卷，第77—78頁，俄文版。中文版同②，第43頁。

人，——不远的将来便可表明这一点。”^①

× × ×

现在进一步来谈在亚洲觉醒时代，1905——1907年俄国革命运动对殖民地东方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所发生影响的具体表现。

在七零八碎的奥托曼帝国中，资产阶级革命的基础不仅是亚洲被奴役各国所共同的土地问题，而且是民族问题。

土耳其民族问题的特殊性，是在于除了帝国主义所加给这一国家的包括土耳其人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压迫外，还有占统治地位的土耳其族（更明确说，是剥削阶级上层份子）对于其他许多非土耳其人的种族压迫。

这种情形，当然使土耳其各族的革命力量难于统一；而没有这统一便不可能对苏丹的专制进行有效的斗争。土耳其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组织是“统一进步委员会”，它的会员被称为青年土耳其派，在俄国革命之前，不论和人民群众（由于它的阴谋叛乱的策略），不论和奥托曼帝国其他各族人民的革命组织（马其顿的，阿尔明尼亚的，阿拉伯的）都没有联系。

俄国革命后以及在它的影响下，奥托曼帝国的革命运动加强了。马其顿成为它的主要策源地，农民的游击斗争在这里获得广泛的发展。1906—1907年在小亚细亚发生过多次的起义。骚动也波及了土耳其军队，军队中有青年土耳其派（其中很多是军官）在进行秘密活动。海军海员也屡次举行起义。有一批土耳其军官写给被沙皇刽子手处死的中尉西密特（Шмидт）的姊妹的信，证实了土耳其海员的起义是在俄国范例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信中写道：“我们也向伟大的公民西密特宣誓，我们将为神圣的公民自由而斗争至最后一滴血，我们将竭尽全力和采取一切办法使土耳其人民熟悉俄国的事件，以便共同努力来为自己争得像人那样生活的权利。”^②

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土耳其人和非土耳其人开始建立了对苏丹专制进行斗争的共同战线，这一事实，是更为重要的。1907年在巴黎召开的革命组织和反政府派组织的代表会议上，

青年土耳其派和阿尔明尼亚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Дашнакцутюн）之间，曾成立了对苏丹专制进行共同斗争的联盟。较后，马其顿的革命者和阿拉伯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也加入了这个联盟。这个联盟是奥托曼帝国各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组织间上层份子的和暂时性的协定，其目的是消灭苏丹阿卜都·哈米德第二（1876—1910）所采取的恐怖政策。但是，直接在俄国范例影响下所形成的这个同盟，把苏丹帝国的革命斗争提到了更高阶段。

在土耳其军队和当地游击队协同动作的基础上，1908年在马其顿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起义。这就是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起义后不久，即有大量苏丹军队投到革命这一方面来。土耳其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上层份子的、不彻底的革命。它没有发动人民群众，没有喚醒他们的革命主动性。相反地，在取得政权而且恢复了1876年的宪法以后，青年土耳其派即宣布结束革命，设法制止人民，而且把自己的力量首先用在镇压非土耳其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上。掌握了政权的青年土耳其派的反动政策，表现在对于马其顿，土耳其属阿尔明尼亚和阿拉伯国家的解放斗争的镇压，表现在和帝国主义的勾结（青年土耳其派听命于德国帝国主义），表现在对无产阶级刚开始的罢工运动的镇压。不过，土耳其资产阶级的革命虽是不彻底的、局限于上层份子的革命，但却很具有它的历史性的进步意义。这次革命，正如列宁所说，影响了“全巴尔干各民族渴望获得自治和实际民主的发展”^③，而且，至少（显而易见被感到的）这次革命刺激了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最后，这次革命也成为土耳其人民自己政治觉醒的开端。

与非土耳其各族人民革命团体组成的联盟，被青年土耳其派所拆散，而且他们并进而实行猖狂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其目的不仅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第372页，俄文版。中文版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4页。

② 引自“东方国家近代史”，第二卷，1952年莫斯科版，第385页。

③ 列宁全集，第15卷，第199页，俄文版。

要保持病入膏肓的七零八碎的奧托曼帝國，而且用新的侵略方法來擴充疆界。這些對於土耳其革命的命運都具有決定性的後果。

× × ×

伊朗和土耳其一樣，也是資本主義不發展的半殖民地國家。在某些方面，伊朗比奧托曼帝國還更落後些。

但是，俄國的革命在伊朗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熱情，使他們對於革命進程所發生的影響，比土耳其的勞動者要大得多。

緊接着俄國革命爆發後，伊朗的革命運動也加強了。1905年12月，革命的醞釀轉變為革命的行動了。在這壓力下，伊朗政府才在1906—1909年通過了憲法以及對憲法的補充。誠然，憲法通過之後，自由資產階級和高級僧侶們脫離了革命運動。可是這並沒有削弱革命，僅把它的基本中心移至北部，移至伊朗領屬的阿塞拜疆。

在這裡，人民群眾對革命運動的開展留下了顯著的痕跡。武裝鬥爭的形式占着首要的地位。伊朗的民主組織，即所謂的“聯合會”（энджумены），具有越來越大的影響，這個組織起先只作為監督選舉過程的機構而產生的，而後來却開始對地方的行政權也實行監督了。

工人的組織——工會和社會民主派“印德茲馬云尼——阿米云”（Эджтимаюне-Амиюн）最先積極地加入這一時期（1907年之後）的革命事變中。大不里士的英勇保衛戰，對國王的軍隊和地方封建主的自衛軍的聯合力量，抵抗了兩年之久（1907—1909年），這就使得這個城市成為伊朗革命運動的中心。

英國和沙皇的軍隊開始干涉伊朗後，大不里士於1909年被沙皇軍隊所占領；可是這時新的革命策源地又在勒什特（里海南岸基林姆省）形成了。革命武裝部隊，即所謂“自我犧牲者”（Федан）從這裡向德黑蘭進軍（1909年），結果推翻了國王，并使民主陣營獲得了短時期勝利。有三種情況使伊領阿塞拜疆在1905—1911年的革命中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這就是：這個省份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占全國第一位。資本主義關係在這裡比較發展，同時，並有

大量非從事農業的伊朗人離開伊朗到俄國去。這一事實尤其具有重大意義^①。其次，阿塞拜疆人不僅遭受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剝削和封建的壓迫（像全伊朗一樣），而且在民族關係上也是不平等的；再則，這個省份直接與俄國相鄰，和俄國有長久的、緊密的聯繫（經濟的和文化的），它同外高加索各國1905—1907年事變的革命中心巴庫緊密接壤，——這一切都保證了俄國革命對於伊領阿塞拜疆的革命鬥爭特別強大的影響^②。最後這一種情況尤須加以較詳盡的說明。當時外高加索的革命印刷品，廣泛地闡述伊朗的事變，這些文章對伊朗的革命者起了一定的思想影響。他們在外高加索組織了“大不里士革命促進社”，在巴庫、巴統、第弗利斯等地他們進行征集經費，分發武器，並且訓練人員，以便派到大不里士去。在巴統的布尔塞維克的地下印刷廠中，印出了革命宣傳品。

數百名忠實於自己國際主義職責的外高加索的革命者，秘密地越過俄伊國界，加入了為伊朗的獨立與自由而鬥爭的隊伍。在大不里士，外高加索的革命者展開了廣泛的宣傳工作，給“自我犧牲者”以軍事教育，設立制造炸彈和手榴彈的工場，並開設了醫院。他們積極地參加對反革命勢力的戰鬥。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大不里士革命者的領導人沙達爾汗（Сардар-хан）的炮兵隊長便是俄國的水手，鐵甲艦“波將金號”起義的參加者。將近二十個外高加索的革命者，在大不里士的街壘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1909年秋季，依照布尔塞維克黨巴庫委員會的決定，奧爾忠尼啓則（塞爾果）

① 1905—1907年俄國革命時期，從伊朗到外高加索做零工的人數共有五、六萬人以上。他們主要都在巴庫采油場工作。他們參加了俄國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受過深刻的革命鍛煉，回到祖國之後，便成為爭取伊朗獨立與自由的英勇鬥士。

② 關於1905—1907年俄國革命對伊領阿塞拜疆鬥爭的影響的概述，係根據1940年第11號“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中馬·西·伊凡諾夫（М.С.Иванов）的“伊朗簡史”和厄·保爾-拉赫斯基（Е.Бор-Раменский）的“外高加索布尔塞維克在1905—1911年伊朗革命中的作用問題”兩文。

同志前往伊朗。他在1909年末和1910年初，逗留于伊朗，親身参加了对反革命匪徒的战斗，并積極地進行了政治工作①。

但是正由于俄國和伊朗之間民主力量的緊密联系与合作，俄國革命的失敗，使为自己独立与自由而斗争的伊朗人民的情况，也急剧地惡化下去。由于1907年8月31日英俄协定（直接在俄國‘六三’反革命政变之后所訂立的）的結果，这两个帝国主义強國組成了反对伊朗革命的統一战綫。后来它們对伊朗進行了武裝干涉。1905—1911年伊朗資產階級革命失敗的另一原因，是它沒有得到農民战争的支持。尽管農民运动几乎籠罩了全國，但它完全采取了消極抵抗的形式（抗交賦稅，拒絕履行对地主的义务等），沒有發展为爭取土地的公开斗争。资本主义發展的軟弱性也影响到伊朗無產階級的处境，使它在政治上还不能把自己和小資產階級分开，不能成为足以領導農民的独立力量。

× × ×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完全变成了半殖民地。因而它的經濟完全受現代资本主义基本經濟法則作用所支配。所以俄國革命在中國也成为資產階級民主运动开始的信号。

当中國無產階級还没有形成独立政治力量的条件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义者起来充当整个民主陣营利益的代表者。孙逸仙是中國民主派所公認的領袖，他在1905年創立的政党“同盟会”在准备1911年的革命中起了巨大的作用。

1907年孙逸仙以三民主义的形式表現了中國民主派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就是：消滅清朝帝制（‘民族主义’），建立共和國（‘民权主义’）和平均地权（‘民生主义’）。

关于中國民主派的这种綱領，弗·依·列寧寫道：“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个真正偉大的人民底真正偉大的思想体系；这个偉大的人民不僅善于悲嘆自己成百年的奴隸地位，不僅善于夢想自由和平等，而且还善于同中國成百年的压迫者作斗争。”②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尤其后者——平均地权这一点，帶有民粹主义

的、“主觀的社会主义”的色彩。中國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似乎覺得，他們只要消滅了一种剝削形式（封建的），也就是消滅了所有一切的剝削，而中國就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發展階段，这在当时的条件下乃是一种空想。

1906—1910年中國革命高潮的特殊优点是“新精神”和“欧洲潮”的發展，按弗·依·列寧的正确說法，这使得“中國旧式的暴乱也必然会進为有覺悟的民主运动”③。1905—1907年的俄國革命对于中國覺醒的实际影响也表現在这些新思潮中。

1911年革命以前的革命高潮，其最主要的成果是小資產階級民主組織和農民群众之間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也積極行动起来。正因为这样，1911年10月同盟会在武漢所組織的起义的勝利，才在全國範圍內獲得了那么廣泛和迅速的响应。这次起义成为中國革命的开端。在十月至十一月間，中國中部和南部各省，多次起义接踵而起。緊接着在这种情况下，加入革命并改变了共和國面貌的中國中南部各省的自由資產階級，力圖攫取勝利果实，限制人民群众的積極性，并以和清朝妥协來結束这次革命。成为公开政党的同盟会，加入其中的不僅有劳动者，而且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者和許多革命的同路人也加入了这个隊伍中。和自由派資產階級分掌政权之后，同盟会在它的影响下，却沒有决心实现自己关于平均地权的綱領性要求。同盟会拒絕实现土地根本改革的結果，这就造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農民的联盟之中的第一道裂痕。

当时中國北部仍处于清朝帝制統治之下。在革命節節勝利的面前，清朝帝制对自由資產階級作了許多讓步，并提出給失寵的大臣袁世凱这个“自由派的偶像”以國家重要的職位。不久他就被任为首相。

① 参阅茲·奥尔忠尼啓則“布尔塞維克之路”，國家政治書籍出版局，1948年版，第80—82頁。

② 列寧全集，第18卷，第144頁，俄文版。中文版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5頁。

③ 列寧全集，第15卷，第162頁，俄文版。中文版見“列寧文集”第三冊，人民出版社版，第98頁。

这时，南方共和國与北方帝制之間的战争，仍互有勝負地延續着。革命战争激起人民的極大热情。假如內战繼續到完全摧毁反动陣营，那就更能提高群众的革命主动性，更能激起人民的巨大力量，更能增强他們的团结性与組織性了。可是，正因为这样，所以以袁世凱为首的北方帝制的自由資產階級，和通过了共和國政綱的南方自由資產階級，無論哪一方面都力圖停止內战，并以和談的方式取得妥協。不过，与革命最有利害关系的，还是帝國主义強國；他們很担心革命会动摇他們在中國的統治基礎。帝國主义強國蛮橫地压迫南方共和國政府，以威脅性地集中他們在中國沿海的海軍來支持他們的外交声明，并增加各港埠租界中的外國駐軍。这种压力并不是沒有效果的。在1911年12月北方和南方之間开始了关于停止軍事行动的談判。內战並沒有复發。同盟会放弃繼續內战以达到完全粉碎反革命力量这一点，造成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農民的联盟之中的第二道、更深刻的裂痕。

1911年12月29日在南方革命政府所召开的各省代表大会上，孚有众望的革命領袖孙逸仙被选为中華民國的臨時總統。他在多年的放逐之后很快地就回到祖國。針對这一事实，帝國主义者加强了自己軍事准备，依然如故地用武裝干涉來進行威脅。袁世凱从南京召还和談代表，并示威地着手准备恢复內战。至于孙逸仙呢，这个“充滿高尚意志和英雄主义”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在頗大程度上是孤立的。对于南方的自由資產階級，尤其是北方的，他是太“左”了。他也不能指望得到自己政党的支持。因为同盟会是靠自由派分子和革命同路人而擴充起來的，所以到这时已失去了自己的战斗精神。此外，帝國主义武裝干涉的嚴重危險也已臨到中國頭上。不要忘記，孙逸仙本人在他政治活动的年月中，也还完全沒有理解到群众在革命中的決定作用，他還沒有意識到，只有人民自己的革命斗争才能使他們獲得解放。孙逸仙認為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共和國，因此，他表示願意在清帝退位的条件下，把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①。在北京握有实

权，而且依靠自由資產階級和利用帝國主义的支持，袁世凱毫無困难地履行了这个条件。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帝國主义奴役殖民地中國的工具和封建反动势力的堡壘——清帝國崩潰了。中國成为共和國了。中國的自由是由農民民主派和自由資產階級的联盟所爭得的，但是，農民因為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所以不能保持住自己的民主陣地來对抗自由派。政权落到不久即公开投入反动陣营的袁世凱的手中。

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真正展开之前便被破坏了。但它在偉大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發展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鍛鍊了他們走向反帝國主义与反封建主义的進一步斗争。同时，第一次中國革命对于朝鮮、蒙古和南洋各國民族解放运动的發展，發生了巨大的影响。

× × ×

和中國、伊朗、奧托曼帝國及其他半殖民地國家都不同，印度是殖民地；不列顛帝國主义在这里直接地、独占地統治着印度。和附屬國与半殖民地國家不同，國外侵略者的專政，他們那种集权的軍事官僚機構，公开地和印度民族解放与民主运动的力量相对立。当然，这使革命运动更加困难。同时在印度資本主义比东方其他國家都要發展得多，因此構成資產階級民主主义改造的基礎的社会矛盾，在这里也表現得更为尖銳。此外，在印度已經形成了比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人数更多的、已有一些經濟斗争經驗的無產階級。結果，英國殖民者虽然在这一时期能够防止印度發生革命，但他們并無法阻撓随着俄國革命之后而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高潮。殖民者自己也被迫承認了印度革命运动高潮和俄國革命之間的直接联系。例如，英國記者弗·齐罗里(В. Чироль)寫道：“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屢次把英印政府及其万能的官員比作專制政体：在印度的英國官員被宣称为統治俄國并使俄國破產的那些沙皇官吏的化身。从这里得出結論，印度人必

① 后来孫逸仙也認為自己这一做法是錯誤的。

須採取俄國革命者在反抗沙皇的過程中所成功地使用的方式。”^①

1905年10月，英國總督克爾莊（Керзон）公爵所實施的孟加拉行政區劃分，成為革命高潮開始的直接導火綫。這個措施人為地把印度民族最先進的部分——孟加拉的人民分為兩部。也許，在別種情況下，英國殖民者能較順利地進行這一措施。但在1905年灼熱的政治氣氛中，在俄國范例的直接影響下，這種硬把孟加拉民族生氣勃勃的整體劈為兩半的企圖，便引起了轉變為民族解放運動巨大高潮的堅決反抗（1905——1908）。

印度全國展開了政治集會和抗議示威的浪潮。劃分孟加拉的法令公布的日子，被宣布為民族的哀悼日。他們開始抵制英國貨。而且很快地革命即越出要求合併孟加拉的範圍。鬥爭的共同口號是：“斯瓦拉特西”（स्वराज 意即——“自治”）和“斯瓦德西”（स्वदेशी 意即——“自產”）這就是印度的政治和經濟獨立的要求。

像在亞洲覺醒時代的其他附屬國的情形一樣，印度的革命高潮也以自由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共同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者為開端。但是在印度，矛盾更高度的尖銳性，在各階級和政治集團的立場上留下了顯著的痕迹。

印度的自由資產階級比中國或伊朗的自由資產階級都更清楚地看到了工人階級的力量。因此它的最大組織——自由資產階級和地主的代表占絕大多數的“國民大會”——的政治路線是極端溫和的與不徹底的。“國民大會”的大多數把“斯瓦拉特西”理解為在不列顛帝國範圍內的有限的自治，把“斯瓦德西”視為保護本地輕工業利益的關稅政策的手段。

就是這種社會矛盾的尖銳性，使得印度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集團比中國或伊朗的都較為軟弱。他們沒有自己獨立的政黨，在“國民大會”中占着少數，即所謂“極端派”。整個說來，這既可以表征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急進派，也可以表征尚未達到孫逸仙那樣完整的民主主義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只有一小部

分“極端派”接近革命的民主主義。他們的領袖是勇敢的革命家巴爾·漢達哈爾·提拉克（Бал Гандахар Тилак）。“極端派”中的先進活動家，把“斯瓦拉特西”與“斯瓦德西”和爭取印度的政治經濟獨立與建立共和國制度，看作是一回事。很值得指出的，就是這個集團完全充分地運用了俄國革命的教訓。“不負責任的和無所約束的官僚暴虐——提拉克宣稱，——迫使不列顛帝國的印度臣民仿效俄國人民鬥爭的方式，而且越出了法律所規定的界限。”然而，即使是印度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的最優秀的代表，也並沒有下決心提出土地改革的問題，而且和群眾的聯繫也很薄弱。他們認為陰謀和個人恐怖是鬥爭的基本方式。

印度自由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隨着群眾鬥爭發展的程度而增長的，而它的動搖性使得英國殖民者用小恩小惠就能很快地把它拉到自己這一邊來。自由資產階級投到帝國主義方面，使得“國民大會”分裂了，使得“極端派”退出了它的行列（1907年）。但是，脫離群眾的“極端派”，也不能領導革命運動。1907年他們所建立的民族主義者的獨立政黨，在提拉克被捕之後就解體了（1908年）。

但是，如果說印度資本主義較深刻的發展縮小了資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性，那麼它同時却引起了勞動群眾鬥爭的非常廣泛的發展。當然，在亞洲覺醒時期，甚至印度的勞動者，也還沒有完全提高到獨立政治鬥爭的地位。可是，也只有印度的工人，在這一時期比較最接近於這一點。印度無產階級在個別場合下已經使用了大規模政治性罷工的武器。

在革命高潮時期，孟加拉和馬德拉斯的農民運動，也積極起來了。1907年農民運動在旁遮普（Пенджаб）發展為武裝起義，在起義過程中起義者占領了拉瓦爾平迪城。印度無產階級的罷工鬥爭也展開了。1907年發生了旁遮普鐵路工人的政治罷工，工人拒絕運送派去鎮壓拉瓦爾平迪起義的英國軍隊。就在1907這一年，東孟加拉鐵路的工人、加爾各答的鐵路工廠工人

① 弗·齊羅里：“印度”，1926年倫敦版，第114頁。

和印刷工人進行了罷工。1907年夏季爆發了印度郵電員工的大罷工。

但是沒有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勞動者罷工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至1908年，革命的高潮開始逐漸低落。印度的愛國者遭到空前未有的迫害。然而，即使在這些困難的歲月里，印度的工人階級仍表現出忘我鬥爭的榜樣。1908年在孟買，和提拉克審判案有關的七月總同盟罷工，尤具有獨特的意義。

“國民大會”分裂之後不久，提拉克就被捕了。1908年7月他出庭受孟買最高法院的審判。在法庭上他表現得很自豪並很有勇氣，他堅持印度人民使用1905——1907年俄國革命時期俄國人所採取的方式來進行解放鬥爭的權利。英國的陪審員用投票方式反對印度的陪審員，七月二十二日提拉克被判六年苦役。

“極端派”號召孟買的居民到街上去，並加入抗議示威中作為對這次駭人聽聞的判決的答復。“極端派”在工人區鼓動展開政治性的罷工。雖然在反對判決提拉克的抗議運動中，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曾加入，但決定性的作用仍屬於孟買的工人階級。他們以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鬥爭方式來行動。七月二十三日在孟買展開了政治性的總罷工，這次罷工按提拉克的被判年數，延續了六天。紡織工人、鐵路工人、搬運工人和城市運輸工人都加入這罷工中，總數達到十萬人以上。罷工與市場和商店的罷市同時進行，它得到了城市小資產階級積極的支持與同情。在罷工的過程中，工人表現出卓越的階級團結與勇敢精神。企圖擊破工人的警察和軍隊，雖屢次向罷工者開火，但毫無收穫。工人建造了街壘，以雨點般的石塊拋到警察身上，在多次巷戰中，工人都表現出英勇堅忍不拔的精神和善于利用地形特點的才能。

1908年7月23——29日孟買的政治罷工，是1905——1908年印度革命高潮的頂點，也是俄國革命影響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最鮮明表現。

列寧曾指出這一事件的巨大意義說：“可

是，在印度開始起來擁護自己的作家及政治領袖的有游行示威的群眾。英國強盜對印度民主派提拉克下了卑鄙的判決（他被判處長期充軍），而且近日英國眾議院內的質問已經查明，印籍陪審員曾替被告人辯護，而罪狀是由英籍陪審員表決宣布的；——資本家走狗向民主派的這種復仇，引起了孟買的游行與罷工。在印度無產階級也已發育到有覺悟的群眾政治鬥爭了……。”^①

1905——1908年印度的革命高潮以孟買的政治罷工為終結。這一罷工的歷史性意義在於印度無產階級登上了政治鬥爭的舞台。

× × ×

1905—1908年俄國革命——帝國主義時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對於亞洲覺醒的影響，是由於世界革命運動中心轉移到俄國的合乎規律性的結果。1905—1907年的俄國革命開始把覺醒了的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反帝國主義鬥爭和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鬥爭匯成總流。因此，第一次俄國革命為今後（在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把集中了地球上大部分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從資本主義的後備軍轉變為它的革命破壞力量，準備了基礎。這些事件在中國和印度把將來反帝國主義鬥爭的領導階級——無產階級引上了政治鬥爭的舞台；這些事件喚醒了破天荒第一次作為爭取獨立和民主權利而鬥爭的有覺悟的戰士而發動起來的數萬萬殖民地奴隸走向政治生活。弗·依·列寧在總結亞洲覺醒時代的革命的歷史性意義時，指出：“世界上決沒有一種力量能在亞洲恢復舊有的農奴制度，能剷除亞洲國家和半亞洲國家人民大眾底英勇民主精神。”^②

（陳非譯自蘇聯“歷史教學”一九五五年第五期）

① 列寧全集，第15卷，第161頁，俄文版。中文版見“列寧文集”，第三冊，人民出版社版，第97頁。

② 列寧全集，第18卷，第545頁，俄文版。中文版見“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77頁。

理論學習与學術思想討論·批判

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

梁 寒 冰

第三題 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論學說

人類在長期生產過程中,逐漸地改變着周圍的自然環境。他們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日常生活所需用的一切東西,以維持人類的生存。勞動生產的實踐經驗,使人們逐漸地認識到物質的東西是客觀存在着的。這樣,就產生了一種簡單的、朴素的唯物論觀念。人類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實踐的繼續,使人們逐漸地從宗教迷信中解放出來,認識了世界的本來面目,相信了物質世界本來就存在着,並不是由什麼神靈創造出來的。爾後,由於自然科學的產生和發展,逐漸地証實了世界的物質性及其發展的規律性,因此就形成了一種唯物主義的世界觀。

自從人類社會分裂成為階級社會以後,一切社會的思想意識都有其階級性,同樣地,哲學上的思潮也有其階級性。唯心論是代表反動的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而唯物論則是代表先進的革命階級的思想意識。哲學上的唯物論和唯心論的鬥爭,反映了反動階級和革命階級之間的鬥爭。一切革命的先進階級為了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為了要改變社會生活的現狀,為了要推動社會歷史前進,就需要正確地反映客觀外界的情況,就需要發展唯物論的學說。因此,唯物論學說的產生和發展,不但有其認識論的根源,而且有社會階級的根源。唯物論和唯心論相反,它是作為先進階級的世界觀而產生的。

在馬克思主义的唯物論出世以前,唯物論

已經有了很長時期的歷史了。最早的唯物論學說,產生於古代希臘的奴隸社會。希臘早期的唯物論者,都以單一的物質元素解釋宇宙萬物的起源。希臘最早的哲學家和自然科學家泰勒士認為:宇宙萬物起源於水,萬物由水而成又復歸於水,水是宇宙萬物產生的本源。阿拿克西美認為:宇宙萬物起源於空氣,萬物由空氣產生又復歸於空氣,空氣是宇宙萬物產生的根本元素。赫拉克利特則認為:宇宙萬物起源於火,火是原始的物質。他說:“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並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造成的,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按規律燃燒着,按規律熄滅着的永恒活火。”^①

恩格斯指出,古代的唯物論是一種原始的自發的唯物論,“這個原始的、素朴的,但實質上是正確的世界觀,是古代希臘哲學所固有的,它第一次由赫拉克里特明白地列述出來:萬物存在着,同時又不存在着,因為萬物皆在流動着,萬物皆在經常變化着,萬物皆在不斷產生與消滅的過程中。”^②由此可知,赫拉克利特不但承認宇宙萬物起源於一種單一的物

① 引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1953年中文版,第141頁。

② 恩格斯:“反社林論”,引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頁。

質，而且已經認識物質現象的永恒的运动变化，宇宙万物是在不断地產生發展和消滅的过程中。宇宙間沒有靜止和不动，万物都在运动变化，一切变化按照必然的規律進行。因此，列寧把赫拉克利特的这种唯物主义观点称之为：“这是对辯証唯物主义基礎的一种很好的說明。”

琉西巴斯和他的学友德謨克里特創立了原子論哲学。琉西巴斯第一个提出原子是宇宙的最初本源。他說：“从原子產生無數的宇宙，而宇宙又分解成原子。”^①就是說，他已經提出了宇宙万物起源于原子的学說。德謨克里特又發展了琉西巴斯的原子学說，認為存在物基本上有兩個始源：一个是原子，另一个是虛空。原子是不可分的物質粒子，它是永恒的和不变的。宇宙間的一切自然現象都是由原子構成的。一切自然現象的產生和消滅，都是运动于虛空中的原子結合的結果。德謨克里特的原子論学說，是古代唯物論發展的頂峯。

伊壁鳩魯繼承了古希臘的唯物論，恢复了德謨克里特的原子論学說。他認為原子是以同一速度运动着，原子不僅有大小、形狀的差別，还有重量的差別，由于重量而引起原子的运动。恩格斯說：“伊壁鳩魯已經認為各种原子不但在大小上和形态上各不相同，而且在重量上也各不相同；他已經按照自己的方式知道原子量和原子体積了。”^②

总之，希臘的唯物論特別是原子論学說，是希臘唯物論者卓越的科学成就，虽然他們还缺乏物質構造的科学观念，但已具有顯明的無神論性質。希臘的唯物論者不但認識了世界的物質性，宇宙万物起源于單一的物質；而且認識了一切物質現象按必然規律运动着和發展着。当然，由于科学發展的水平与歷史条件的限制，他們还不能科学地說明矛盾斗争是事物發展的根源，还不能理解新事物產生与旧事物滅亡的辯証規律，把运动發展看作是一种永久循环的过程。他們也只能以唯物論的观点解釋自然現象，还不能以唯物論的观点解釋社会生活現象，还不理解实践在認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被当时希臘社会的歷史条件所限制的緣故。

希臘的唯物論是在奴隸制經濟基礎上成長起來的。由于氏族制度的解体，希臘出現了新兴的城市。在奴隸制度下，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促進了生產的發展，手工業、商業、对外貿易和航海事業的發達，引起了希臘文化的繁榮，推动了研究自然界的兴趣。因此，探求物質世界及其發展規律的思想，逐漸地代替了宗教神靈的观念。这样，就產生了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唯物論学說。希臘的唯物論產生以后和宗教、唯心論進行了一系列的斗争。他們在解釋自然現象时，同时也就批判了宗教和唯心論。這兩种世界觀的斗争，是以德謨克里特的唯物論和柏拉圖的唯心論之間的斗争为中心，它反映了希臘奴隸主民主派和貴族集团之間的政治斗争。

自从希臘奴隸社会解体之后，出現了一个漫长的中世紀黑暗时期，宗教和唯心論代替了希臘的唯物論，成为整个封建时期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体系。新起的封建統治階級，一方面極力摧殘希臘的唯物論，一方面又積極發展宗教和唯心論的世界觀。奥古斯丁在新柏拉圖主义的基礎上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宣称僧侶权力高于世俗权力，進行天主教会應該統轄世界的宣傳。此后，西欧產生了經院哲学，成为中世紀哲学的基本派別，支配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宗教唯心論哲学的一切派別。起初影响最大的是柏拉圖主义，以后教会把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学变成了“死板的經院哲学”。列寧在其“哲学筆記”中，指出：“僧侶主义殺死了亞里士多德学說中活生生的东西，而使其中殭死的东西万古不朽。”教会把哲学規定为神学的奴僕，使它为教会和封建統治階級服务。托馬斯·阿奎那的經院哲学体系，曾經發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企圖以伪造的亞里斯多德主义証明天主教的教义，企圖从哲学上証明封建剝削制度的合理性。

虽然，在整个中世紀封建时期，教会的經

① 引自恩格斯著：“自然辯証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4頁。

② 同上書，第24頁。

院哲学占据了統治地位，但唯物論思想即使在西欧也沒有完全被消滅。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唯名論”是唯物論在西欧封建主义条件下最初的歷史形态。唯名論者在反对当时的“实在論”时，提出了“事物先于一般概念而存在”、“一般概念就是名称”的論据。他們認為一般概念只是个別事物的名称，只有个别事物是真实存在的。我們的思維所創造的事物的一般概念，不能不依賴事物而存在，不能不反映事物的特性。顯然，这是一种唯物論的观点。而当时的实在論者却提出了“共相是实在”、“共相先于事物而存在”的論点。他們認為一般概念即“共相”，是真实地客觀地存在着，而且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着。顯然，这是一种唯心論的观点，是柏拉圖的“理念論”的反芻。由此可知，中世紀的“唯名論”和“实在論”的爭論，實質上是唯物論和唯心論的斗争。所以列寧指出：“中世紀唯名論者和实在論者的斗争具有与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斗争的相同之处。”

近代資本主义的生產方式，在中世紀封建制度的胎胞內，逐漸地成長起來了。在生長過程中的城市資產階級，为了推進新的社会生產力的前進，为了爭取它的自由發展，就和現存的封建生產关系不能并行了。因此，就爆發了城市資產階級反对封建制度的偉大革命斗争。恩格斯指出：“一切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在当时都要帶上宗教的外衣，而且首先必然要反对教会。”^①十六世紀初，德國的宗教改革直接引起了偉大的農民战争，農民向教会和世俗封建主進行了劇烈的生死斗争；但由于資產階級的不徹底性而失敗了。十七世紀上半期，英國資產階級領導了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斗争，由于農民和城市平民的積極參加使革命獲得了勝利，把查理第一推上了斷頭台。新起的英國資產階級窃取了革命斗争的果实，以与封建大地主妥協而結束了英國歷史上这一偉大的时代。十八世紀下半期，法蘭西的大革命是資產階級的第三次起义，这是一次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消滅了封建制度的最后遗迹，確立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这就是恩格

斯所說的資產階級反对封建制度的三次偉大斗争。十七、十八世紀的唯物論，正是資產階級反对封建制度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随着資本主义生產的日益發展，自然科学也大踏步地前進了。先進的資產階級为了要發展工業、商業和自由貿易，推动社会生產力的前進，就需要發展自然科学，就需要打破束縛科学發展的教会精神独裁。恩格斯說：“在这以前，科学是教会的恭順的奴婢，教会從來不允許科学跨出宗教信仰所限定的界綫之外，因此，那时是完全沒有科学的。現在科学暴动起來反对教会了；資產階級需要科学，它参加了这个暴动。”^②

真正的自然科学是从十五世紀后半期开始的。由于商業和对外貿易的發展，促成了美洲和通印度航路的發現，環繞世界的航行証明了地球是圓形的。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地理上的这些偉大發現，促進了科学的向前發展；特别是哥白尼所創立的宇宙的太陽中心說，打破了十六世紀以前一直占統治地位的地球中心說，証明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是太陽，地球環繞太陽运行，每晝夜又繞地軸自轉一周。这一科学理論的創立，有力地打击了上帝創造世界的宗教神学觀，宣布了自然科学的獨立，开始把自然科学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來。从此以后，自然科学就大踏步地前進了。天文学、数学、机械学、物理学等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伽利略奠定了理論力学的基礎，凱卜勒發現了行星繞太陽运动的規律。由于望遠鏡和顯微鏡的發明，大大地擴大了科学研究的范围。最后，牛頓發現了万有引力和力学的三大定律，并創立了天体运行的理論。十六世紀以來，自然科学上的这些偉大的發現，奠定了十七、十八世紀唯物論的基礎。

十七世紀开始以后，英國資產階級在資本主义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迅速地成長起來，領導了反对封建制度的偉大斗争。適應着英國先進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8頁。

② 同上，第18頁。

資產階級的革命要求，在自然科學發展的基礎上，產生了英國的唯物論。恩格斯指出：“自十七世紀以來，整個現代唯物論的最初發祥地，乃是英國。”^①

英國唯物論的創始者弗蘭西斯·培根，批判了中世紀經院哲學和神學阻礙科學的進步，開始把哲學放在真正的自然科學基礎上，創立了近代唯物論的科學世界觀。不過，培根所創立的唯物論學說，主要的是唯物論的認識論和科學的思想方法，他還沒有形成一種全面的、系統的唯物主義世界理論。培根唯物論的根本原則，是知識和觀念起源於感覺世界。馬克思指出：“按照他的學說，感覺是完全可靠的；是一切知識的泉源。任何科學都是實驗的科學，科學就在以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覺所供給的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底主要條件。”^② 培根的認識論是建立在唯物論基礎上的。首先，他承認自然界的永恒性，認為物質所固有的主要本質是運動。自然界、物質是我們認識的對象，我們只有“服從自然”，即遵循自然發展的規律，才能認識自然和支配自然。我們用實驗的科學方法所獲得的知識是客觀的科學知識。科學知識是在觀察的基礎上獲得，又為新的觀察所檢驗而證明的。培根確定了科學方法是求得知識的唯一方法。但是，培根的唯物論，正如馬克思所說，“充滿着神學的不徹底性”。一方面，他承認物質的永恒性；另一方面，他又承認自然神的存在。

霍布士整理了培根的唯物論，克服了他的自然神論的偏見，使之發展成為一種系統的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霍布士堅決地主張：物體是真實存在着的東西，物體的運動和機械的交互作用構成了物質世界。物體是唯一的實在，表象和概念只是物體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因此，他反對那種認為概念先於事物而客觀存在的唯心論學說，堅決否認任何非物質的實體存在，認為一切“精神”或“非物質的實體”都是人們臆想的產物。

霍布士把物體的基本特性看作只是廣延和大小，認為物體就是充滿或占據某種場所或位

置的東西。他不理解空間和時間是物質存在的普遍形式，也不懂得運動是物質存在的普遍屬性，而把物質運動的多种多样的形式看成只是機械的運動。馬克思指出，在培根的學說中，“物質處於感覺的詩意的光輝之中而對人微笑”。在霍布士的學說中，“感覺失去了它的詩意的光輝，而變為幾何學家底抽象的感覺。物理運動成了機械運動或數學運動的犧牲品：幾何學被宣布為主要的科學。唯物論變成了一種厭世論。”^③

霍布士從培根的知識和觀念起源於感覺世界的根本原則出發，認為人的思想、觀念來源於感覺，“因為人心中沒有一種概念不是最初地、全部或一部地產生於感覺器官之上的”。那末，感覺是怎樣產生的？他認為感覺是由外界的物體或對象所引起的。外界的物體直接地或間接地刺戟人們的各種特殊的感覺器官，引起人們的各種不同的感覺，如味覺、觸覺、聽覺、嗅覺等。在認識論上，霍布士基本上是一個感覺論者。他雖然採取了培根的原則，但並沒有把培根的原則加以進一步的發揮。

洛克繼承了培根和霍布士的唯物論學說，批判了笛卡兒的“天賦觀念”的學說，進一步發揮了培根和霍布士的知識和觀念起源於感覺世界的原則。笛卡兒否認觀念是由經驗產生的，認為觀念是天賦的。相反地，洛克則認為觀念不是天賦的，而是由經驗產生的。客觀外界的事物作用於我們的感官引起感覺，一切知識都是感覺經驗的產物，我們的觀念乃是實在事物的精確肖像或反映。這就是洛克唯物論的基本觀念。

但是，洛克的唯物論是不徹底的。因為他把物體的性質劃分為兩類：物體的廣延性、形態、運動屬於第一性的質，物體的顏色、聲音、氣味屬於第二性的質。我們關於廣延、形態、運動的觀念（第一性的觀念），是物體的

①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頁。

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聖家族”，引自恩格斯著：“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9頁。

③ 同上，第10頁。

廣延、形态、运动的精确肖像或反映。就是說，第一性的观念是有其客观内容的。我們关于顏色、声音、气味的观念（第二性的观念），是我們内心所產生的观念，它和物体所固有的实在的顏色、声音、气味完全不相类似。就是說，第二性的观念是主觀的、沒有客观内容的。洛克又認為：我們認識的对象不是物体自身，而是由物体所引起的观念。“我們只能与我們的物体观念关涉，而不能与物体自身关涉。”因此，我們只能思維或認識我們自己的观念，至于物質实体的本性是我們不能認識的。这样，就形成了洛克哲学的兩重性。一方面，他主張一切知識来源于感觉經驗，我們的观念，至少第一性的观念，是实在事物的摹本；另一方面，他又認為第二性的观念是由我們内心產生的，認識的对象是我們自己的主觀世界，物質的实体乃是不可知的。洛克哲学的这种兩重性，就成为尔后哲学發展中兩条路綫的思想根源。貝克萊和休謨利用了洛克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創立了主觀唯心論的学說；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則發展了洛克的唯物論学說。英國唯物論的不徹底性和洛克哲学的二重性，反映了英國大資產階級对封建貴族階級的妥协性。

十八世紀以來，欧洲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已經由英國移到了法國。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与英國不同，帶有徹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革命性質。因而反映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要求的唯物論，就具有徹底的战斗的無神論性質。

恩格斯指出：“培根、霍布士和洛克是光榮的法國唯物論者學派底生父。”^①法國唯物論者直接繼承了英國的唯物論，克服了它的不徹底性，把唯物論向前推進了一步。不过，法國的唯物論学說，也沒有超出形而上学机械論的界限。这是因为当时的自然科学只有力学特别是固体力学达到了某种完善的地步，而有机界的科学还处在萌芽状态的緣故。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概括了当时自然科学上的最新成就；他們企圖用力学的定律解釋自然界的一切現象，而把当时已經形成的自然界絕對不变的总观念应用到哲学上來。因此，就形成一种

完整的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論学說。这种机械唯物論从培根、伽桑狄和笛卡兒起，經過了霍布士、斯賓諾莎和洛克，一直到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才把它發展成为一个系統的完整的机械論学說。

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是徹底的無神論者。他們堅決地否認神的存在，反对灵魂不死的宗教信条，把宗教看作是人類愚昧無知的產物。愛爾維修公开地指出，信仰上帝乃是一些人愚昧無知和另一些人有意欺騙的結果。他的“精神論”一書，列寧称之为向宗教和唯心論世界觀發出的挑战書。

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徹底地批判了神学和唯心論特別是貝克萊的主觀唯心論，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哲学的根本問題。他們都承認：世界上只有物質的东西是真實地存在着。霍爾巴赫指出，自然界是永恒存在的，誰也不能創造它和消滅它。自然界是宇宙万物的本源，物質是对人的感官發生作用的客观实在。物質是第一性的，我們的思想和概念对物質來說是第二性的。就是說，他們已經明确地認識到了物質第一、意識第二这个唯物論的根本原則，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物質与意識的关系問題。

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特別是霍爾巴赫和狄德羅，已經正确地解决了物質与运动的关系問題。霍爾巴赫認為运动是物質不可缺少的屬性。狄德羅則更進一步，不但承認运动是物質固有的屬性，自然界中並沒有絕對的靜止；而且認為空間和時間是物質存在的客观的形式。狄德羅認為：物質是由分子組成的，每一分子都有其內在的运动泉源即“親和力”，这种力量的外在表現就是空間的机械的位置移动。自然界各种現象之間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有生命物質和無生命物質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它們是可以互相轉化的。由此可知，在狄德羅的哲学中，已經包含有許多辯証因素。虽然如此，但从总的方面說來，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仍然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論。正如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頁。

恩格斯所說，十八世紀的唯物論，按其自然科學的知識說來，遠遠超過古代希臘的唯物論，但在一般的自然觀上，却比古代希臘的唯物論低得多。因為他們把自然界看作是一成不變的永久如此的，把多種多樣的物質運動形式看作是一種機械的運動，把物體的運動看作只是物體在空間的位置移動。拉美特利在其“人即機器”一書中，把人體比作一架最複雜的機器，企圖以力學的定律說明人體內部的生理現象。

在認識論上，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是从洛克的感覺論出發的。他們認為感覺是人類認識的唯一源泉，感覺是外物作用于我們的感覺器官引起的；我們的感覺能力使我們能夠認識世界及其規律性。狄德羅指出：感覺、推理反映自然界客觀實在的相互聯繫，凡是正確地反映客觀物質現象的觀念都是真實的。但是，狄德羅還不了解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

十七、十八世紀的唯物論，是唯物論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歷史階段，是有其偉大歷史貢獻的。它在歷史上曾經起了革命的進步作用，反映了當時資產階級的革命要求，並與反動的封建主義的思想體系進行了公開的鬥爭。不過，由於當時自然科學發展的水平，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與資產階級的偏見，近代唯物論是有其歷史局限性的。

恩格斯在“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指出了十八世紀唯物論的三個基本的歷史“局限性”。首先，十八世紀的唯物論，主要是機械唯物論。由於當時所有的自然科學中，只有力學特別是固體力學達到了某種完善的地步。有機界的科學如化學、生物學尚處在萌芽狀態，進化論學說尚未形成，物種不變的理論仍然占據着統治地位。因此，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只能以純粹機械的原理解釋動植物有機體。這樣，正如恩格斯所說，“就構成了法國古典唯物論的第一個特有的、在當時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其次，十八世紀唯物論者的思想方法，是反辯證法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就是說，他們不是從運動、發展、變化的觀點去觀察自然界，而是孤立地、靜止地、一成不變地去觀察

自然界。正如恩格斯所說：“……不是在運動中去觀察，而是從靜止狀態中去觀察；不看作重大地變化着的事物，而看作永恒不變的事物；不看作活的，而看作死的。”^①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雖然也知道：“自然界是處在永久的運動中”，但他們還不能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種不斷發展的歷史過程，而是把自然界的運動看作是循環的反复產生同一結果的。這種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是和當時自然科學的發展水平相聯繫的。恩格斯指出：“康德的太陽系發生說，當時才剛剛出現，看來還只是一種奇談。地球發展史，即地質學，還是完全不知道的。認為現今的生物是起源于由簡單到複雜的長期發展過程的思想，一般地說，當時還不能夠科學地確立起來。”^②因而，對自然界的非歷史觀點，當時是不能避免的。這種對自然界的理解方法，自從培根和洛克從自然科學移植到哲學上來以後，就形成了近代唯物論第二個特有的局限性。

十八世紀唯物論的第三個局限性，就是對人類社會歷史的解釋是唯心的。當時的法國唯物論者，還不理解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決定人類社會歷史的面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相反地，他們把人們的思想、意志、理性、道德和法律及偉大人物的英雄行為，看作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源。他們認為：“意見支配世界”，“法律製造一切”；社會制度、政治組織是由法律產生，而法律又是由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決定的。愛爾維修曾經企圖用唯物論的原則解釋社會生活，提出了人是環境的產物、人的性格由經驗和環境決定的論點。從這一觀點出發，就會得出必須改變社會環境的革命結論。但是，他同時又認為社會環境是由現存的法律所造成，而法律又是由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決定的。因此，歸根結蒂，愛爾維修的社會觀仍然是唯心論的。

十七世紀以來逐漸形成的這種形而上學的

①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1頁。

②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6—27頁。

自然觀，差不多完全統治了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者。自從康德關於天體起源於熾熱的星云假說出世後，才把這種陳腐的形而上學的自然觀打開了第一個缺口。恩格斯指出：“康德的科學生涯的開始，就是把牛頓的太陽系自從有名的初次衝擊以來便永久存在之說，變成了歷史的過程：變成了太陽及一切行星是由迴轉的云雾產生的過程。在這上面，他已經作出這樣的結論，即太陽系的產生，也就指明太陽系在將來的不可避免的滅亡。”^①不過，康德的這個劃時代的發現，對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來說，仍然是一個秘密。直到半世紀以後，拉卜拉斯詳細地證明了“一個太陽系如何從一個單獨的云雾大塊中發展起來”之後，康德的“星云假說”才被人們所重視。從此，一種新的自然觀誕生了：“自然界不是僅僅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并消滅着。”（恩格斯語）

這種新的辯證的自然觀，從康德開始而完成於黑格爾的哲學中。它打破了傳統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確立了辯證的思維方法。黑格爾把整個自然界看作是永恆的運動、變化和發展的過程，看作是不斷地產生和消滅的過程，看作是由低級到高級的上升過程。這一發展過程通過量變到質變的轉化來實現，而矛盾鬥爭則是發展的內在源泉。從黑格爾的這個觀點看來，人類社會的歷史也是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其產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辯證法的哲學不過是這一過程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而已。這樣一來，辯證法的哲學就打破了一切所謂最終的絕對真理之永世長存的想法，認為：“真理是包含在認識過程的本身之中，是包含在科學之長期的歷史發展中，科學是從知識的低級階段上升到越來越高的階段，但是科學永遠不會達到這樣的一點，即永遠不會因它在發見了某種所謂絕對真理以後，就再不能越過此點，除了袖着手望着這個已獲得的絕對真理出神而外，再無事可作了。”^②

黑格爾是一個唯心論者。他認為：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出現以前，就已經有一種“絕對觀念”存在着。這種“絕對觀念”在其辯證的發展過程中轉化為自然界，而自然界不過是這種

“絕對觀念”的體現而已。人類只要自我意識到這種“絕對觀念”，就達到人類知識的最高峯了。黑格爾認為這種“絕對觀念”的認識，在他的哲學中已經達到了。就是說，黑格爾自認為他已經達到了最終的絕對真理的境地了。這樣，黑格爾的唯心哲學體系就和他的辯證方法處於尖銳的矛盾中了。辯證法指出：人類認識的發展過程是無止境的，絕對真理不是任何人所能達到的，而黑格爾卻認為他的哲學已經達到了最終的絕對真理的境地了。在辯證法看來，人類社會是永遠不停地向前發展着，而黑格爾則認為普魯士的君主制度已經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后階段了。

恩格斯指出：“這時費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一書出版了。它一下子把這個矛盾粉碎了，重新直截了當地恢復了唯物論的王位。”^③起初，費爾巴哈是一個唯心論的黑格爾主義者，雖然他還不是完全正統的黑格爾派。以後，他從唯心論轉向了唯物論。自從他和唯心論體系完全分裂後，就激烈地攻擊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他把黑格爾的“絕對觀念”轉化為自然界的學說，看作是上帝創造世界的宗教教義在理論上的一種表現形式。

費爾巴哈打破了黑格爾的唯心哲學體系，宣布了唯物論的勝利，是有其偉大的歷史功績的。但是，費爾巴哈不能“用批判的方法消滅它的形式，而救出它所獲得的新的內容”；相反地，他拋棄了黑格爾的唯心論，同時也拋棄了他的辯證法。他還不能吸取黑格爾辯證法的精華，把它放在唯物論的基礎上，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完成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

從十八世紀下半期到十九世紀上半期的一百年間，在自然科學上已經有了許多偉大的發現，特別是細胞的發現、能量不滅與能量轉化定律的發現與達爾文的進化論三大重要發現。當費爾巴哈在世時，曾經看到了這三大發現，

①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3—54頁。

② 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8頁。

③ 同上，第16頁。

但由于当时德國的政治条件，迫使他过着鄉村的隱居生活，以致使他跟不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因此，他还不可能从哲学上概括这些自然科学上的偉大發現，并根据这些偉大發現提出辯証唯物論的自然觀，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担負这个偉大的歷史任务。

費尔巴哈的唯物論，按其性質來說，仍然是直觀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論。但是，对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說來，是唯物論發展的一个更高階段。

首先，費尔巴哈正确地解决了哲学的基本問題。他認為自然界不依賴人們的思維，也不依賴任何哲学而独立存在着。人們本身就是自然界的產物，宗教幻想創造出來的最高存在物，不过是人类本質的虛幻的反映。恩格斯在評論費尔巴哈的唯物論时，指出：“……有一种意識用不可遏止的力量掌握了費尔巴哈，致使他認為黑格尔的‘絕對觀念’之永古存在，以及在世界發生以前‘邏輯範疇之預先存在’，都正是信仰超世間造物主的幻想的殘余；并認為我們自己所屬的物質的、在感性上可以覺知的世界乃是唯一的現實的世界，我們的意識和思維，不論表面上如何像是超感性的东西，但它們是物質的、肉体的器官即頭腦的產物。物質不是精神的產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質的最高產物。不言而喻，這是純粹的唯物論。”^①由此可知，費尔巴哈是正確地說明了思維對存在、精神對自然界的關係問題。

在認識論上，費尔巴哈一方面揭露了基督教的認識論根源；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論。他繼承了十八世紀唯物論者的感覺論，認為人們的感覺器官是認識外界事物的源泉，感覺就是客觀世界的映象。感覺不是把我們同外界分隔起來，而是把我們和外界聯繫起來。顯然，這是一種唯物論的認識論。由于費尔巴哈是一個直觀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論者，所以他不能理解從感覺到思維的辯証發展過程，也不能理解實踐在認識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馬克思說：“費尔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訴諸感覺的直觀，但是他把感性看做實踐的、人的感性的活動。”^②

費尔巴哈對於自然現象的解釋是唯物的，但對於社會現象的解釋則是唯心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在社會領域內，費尔巴哈仍然是一個唯心論者。費尔巴哈說：“人类的各个时期的彼此不同，僅僅是由于宗教上的变迁。”由此可見，費尔巴哈不是從物質的生產方式的不同，划分人类社会發展的各个时期；相反地，僅僅根據宗教的变迁，從意識形態上区分人类社会發展的各个时期。顯然，這是一種唯心論的觀點。

費尔巴哈把人看作是抽象的“一般人”，把人与人之間的關係看作是一種純自然的聯繫，特別是兩性之間的聯繫。馬克思指出：“……他只能把人的本質理解为一个‘类’，即一種內在的、緘默的、僅靠自然的結合把多数个人聯繫起來的一般性。”^③他不了解：“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乃是社會關係的總合”（馬克思語）。他也不理解人与人之間的真正關係，乃是社會的生產關係。費尔巴哈的唯心論就在於：他把人与人之間的以感情為基礎的一切關係，如兩性之間的愛情、友誼、同情、捨己精神等等，看作是一種新的、真實的宗教。由此可知，費尔巴哈並不希望廢除宗教，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真正的宗教。因此，他雖然和宗教進行了鬥爭，但並不了解宗教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因而也就不能揭露出宗教的階級根源。

費尔巴哈的唯心的社會觀，也明顯地反映在他的道德觀上。他認為合理的自我節制和人們的彼此相愛是道德的基本原則。人生來就具有追求幸福的意向，這種意向應當成為道德的基礎。我們要想得到幸福只有彼此相愛。恩格斯指出：“在費尔巴哈那里，愛永遠并且到處都是一個創造奇蹟的神，可以幫助克服實踐生活中的一切困難……”^④在階級對抗的社會里，費尔巴哈宣傳不分階級的彼此相愛，鼓吹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4頁。

② 馬克思：“費尔巴哈論提綱”，見恩格斯著：“費尔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附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3頁。

③ 同上，第74頁。

④ 同注①，第43頁。

階級和平，否認階級鬥爭。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道德觀。

十九世紀初期，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已經開始由法國移向德國，德國正處在新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夕，階級鬥爭已日趨緊張，思想鬥爭已日益加劇；但是，費爾巴哈卻站在政治鬥爭的圈外，沒有親身參加革命鬥爭的實踐。十九世紀以來，自然科學上已經有了許多新的偉大發現，特別是恩格斯指出的三大發現；但費爾巴哈卻過着鄉村的隱居生活，不能從哲學上概括這些自然科學上的偉大成就。這樣，就使得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不能克服十八世紀唯物論的基本缺點，不能超出十八世紀唯物論的界限以外。雖然如此，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仍然有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它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哲學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

馬克思和恩格斯概括了當時自然科學上的各種偉大發現，總結了工人階級革命鬥爭的實踐經驗，批判了先前的一切舊唯物論的缺點，吸收了費爾巴哈唯物論的精華，在唯物論的基礎上改造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創造了一種嶄新的唯物論即辯證唯物論。自從馬克思主義的

辯證唯物論出世以後，就結束了哲學史上的舊時代，開創了哲學史的新時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是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科學世界觀，它不僅是認識世界的武器，而且是改變世界的武器。馬克思在“費爾巴哈論提綱”中，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過世界，但問題是在於改變世界。”^①（待續）

① 馬克思：“費爾巴哈論提綱”，見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附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5頁。

主要參考書目

- 一、馬克思著：“費爾巴哈論提綱”。
- 二、恩格斯著：“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 三、恩格斯著：“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英文本序及第二章。
- 四、恩格斯著：“自然辯證法”，導言、反杜林論舊序及科學歷史摘要。
- 五、恩格斯著：“反杜林論”，引論。
- 六、列寧著：“卡爾·馬克思”。

廢銅中發現古文物

上海博物館最近在國營上海冶煉廠收購的廢銅中，找到了兩件珍貴的西周時代銅器。據上海博物館鑑定，一件叫“師趯鼎”（烹飪器）的銅器。在過去文件中，曾經有過兩個“師趯鼎”的記載，但從鼎上銘文的字跡考證，這個鼎是同銘的第三件，這是一個新發現。這件新發現的銅器外面鑄有一圈圖案，鼎腹上鑄着二十八個銘文，只損缺了一個字，對研究周代歷史有很高的價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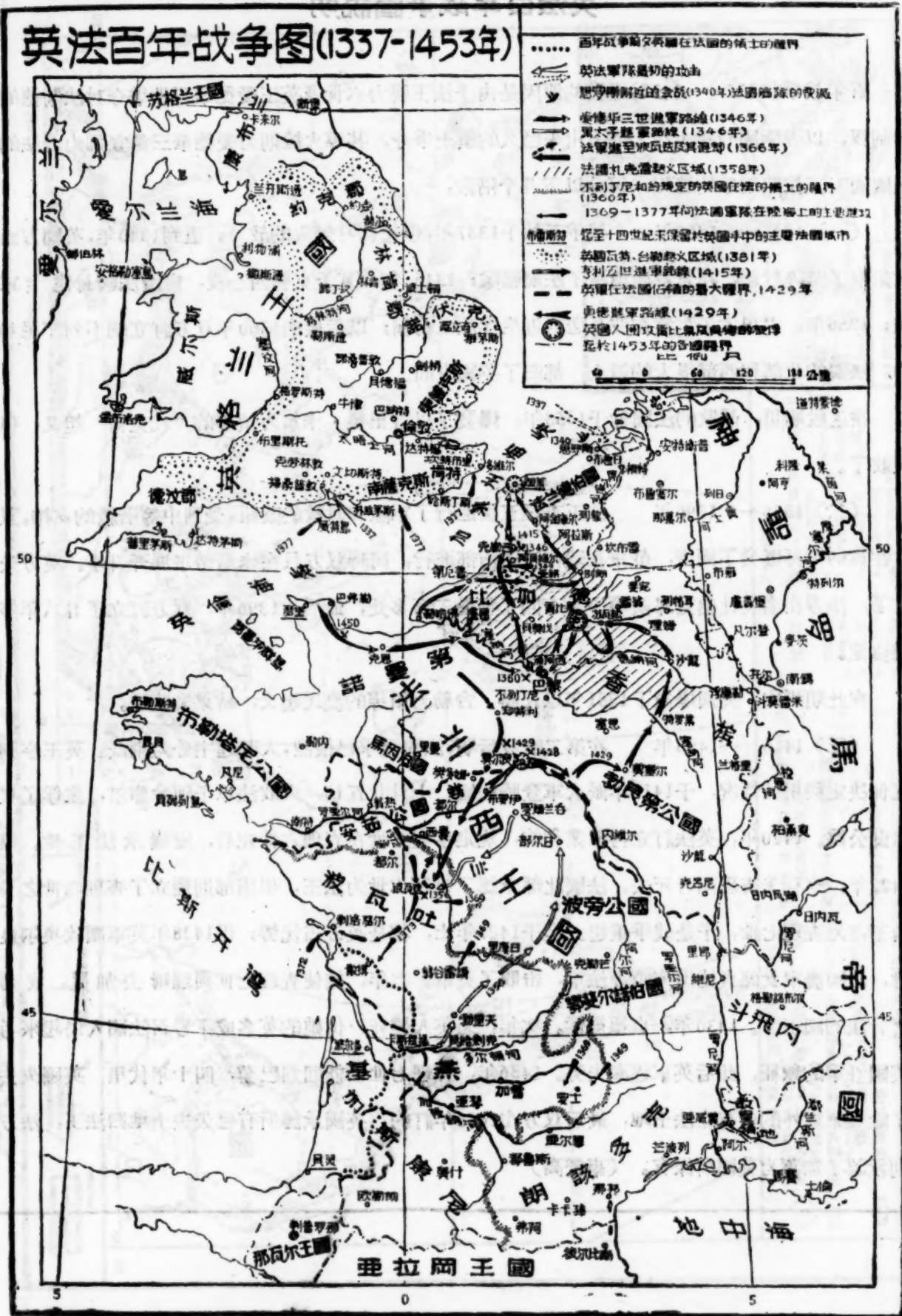
另一件是“賢簋”（食器）的蓋。那個蓋上的銘文同清代金石家吳大澂所記載的拓片完全相同。根據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所說，這件銅器是西周初年衛國的器物。

上海博物館從今年1月到4月13日為止，曾經在國營上海冶煉廠和中國五金機械公司上海採購供應站，找到了古代銅器四百零九件，其中包括有商、周、春秋戰國、秦、漢的烹飪器、食器、酒器、生產工具、兵器和少數民族的古代銅鼓、武器等。

（原載1956年4月20日光明日報）

世界歷史參考地圖(十三)

英法百年戰爭圖(1337-1453年)



(三十) 圖 說 英 法 百 年 戰 爭

英法百年战争圖說明

百年战争(1337——1453)爆發的原因是由于法王腓力六世及英王愛德華三世爭奪對法蘭德的控制权，以及兩國封建主在大陸上由來已久的領土爭奪，其導火線則為愛德華三世宣佈為合法的法國國王。按照战争的進程，可分以下几个階段：

(一) 1337——1360年 战争开始于1337年，但起初并無大的战斗；直到1340年，英國方面才采取了坚决行动，在思羅斯消滅了法國艦隊；1346年，复于克勒西一役，击潰法國封建主軍隊；1356年，“黑太子”复在波瓦迭附近生俘法王約翰；以后根据1360年双方訂立的不列丁尼和約，法國的北部和西部很大的領土，都归了英國方面。

在这段期間，战敗的法國曾于1358年，爆發了以吉里奧·卡尔為領導的“扎克雷”起义，但失敗了。

(二) 1369——1396年 法王查理五世進行了軍隊和財政的改組，受到中等階級的支持，双方在1369年再爆發了衝突，战争在現在法國南部進行，同時双方且在卡斯蒂爾展开斗争。英方失敗了，法方在名將杜給克郎領導下，夺回了堡壘二百多处，最后在1396年，双方訂立了廿八年停战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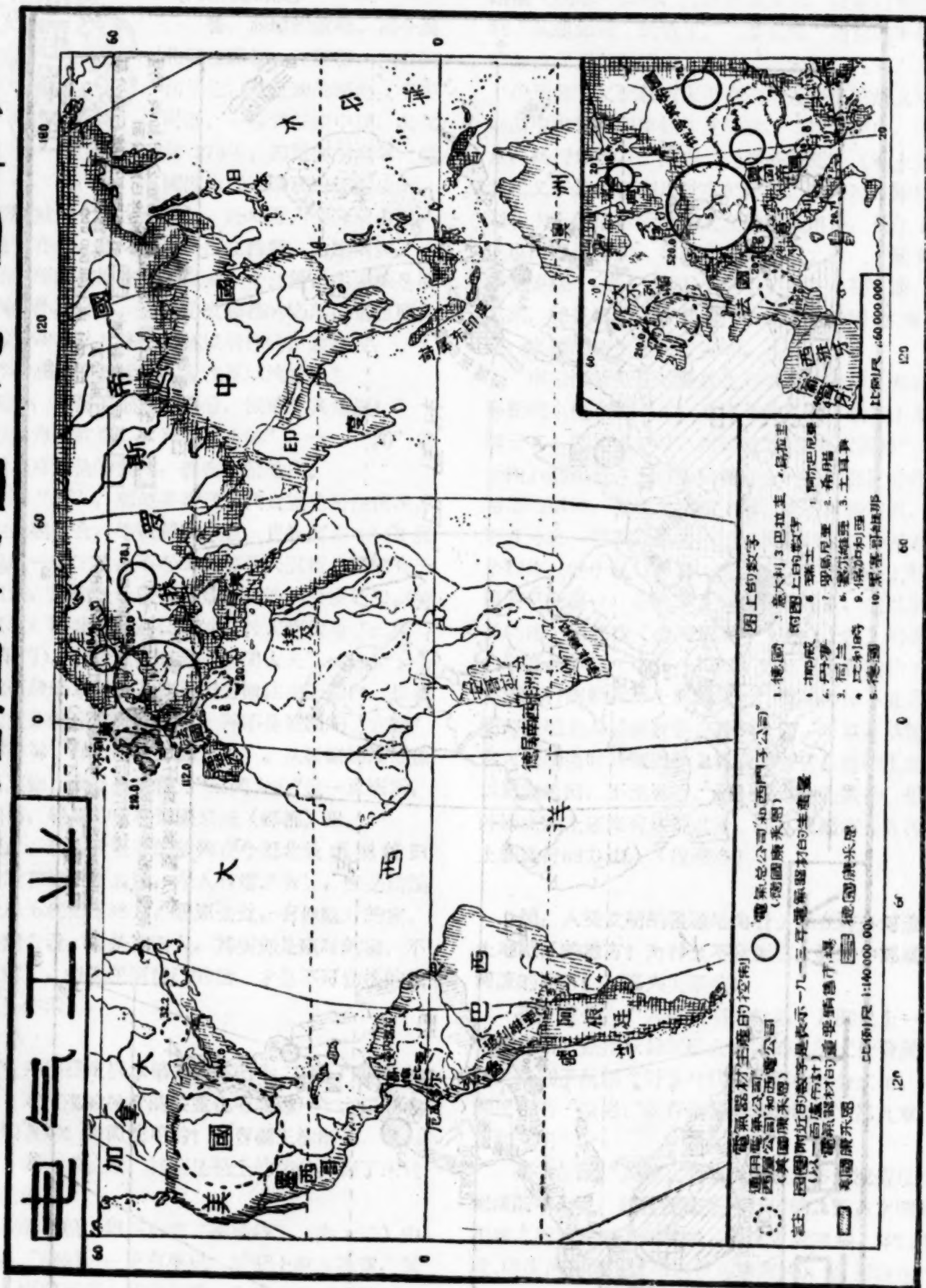
在此期間內，英國爆發了1381年以瓦特·台勒為領導的農民起义，結果失敗了。

(三) 1415——1453年 在第二階段后期，法國党爭已很烈，大封建主分为兩派。英王亨利五世決定利用此情况，于1415年派大軍登陸法國，十月廿五日，大敗法軍于阿金庫爾，生俘了奧爾良公爵。1420年，英法訂立特羅業和約，規定亨利五世在查理六世死后，應繼承法王位。但1422年，亨利先查理兩月死去，法國北部承認了亨利六世為法王，但南部則擁立了查理六世之子當王，為查理七世，于是战争重起。迄于1428年止，都是英方占优势；但1428年英軍圍攻奧爾良時，法國農家女郎貞德出來領導法軍，击败了英軍。次年，她使查理七世到理姆去加冕，成為“合法的國王”。1430年，貞德被俘。次年，為英人燒死，但她的英名成了号召法國人民起來與英國斗争的象征，此后英軍逐漸失勢。1436年，查理七世已能回到巴黎，四十年代里，英國失去了除加萊以外的所有在法土地，最后双方在1453年訂約，英國承認所有已失去土地归法王，法方則承認了加萊為英國所保有。(辜獎高)

世界歷史參考地圖(十四)第一圖

資本家同盟分割世界(至一九一四年)

电气工业





問：屈原的故鄉是哪里？

（河南姚立政）

答：屈原的故鄉，在今湖北省江陵縣。江陵縣，從春秋初年起，是楚國的國都，名字叫郢。一直到戰國中期，公元前 278 年、即楚襄王 21 年，楚國因為受到秦將白起的攻擊，

才東遷陳城（今河南淮陽），此地遂為秦國所佔領；屈原也就在這一年的五月，投江自殺，為國捐軀。

說屈原的故鄉在楚國京城，今江陵，主要地是根據屈原的作品哀郢。哀郢是哀郢都的陷落，是屈原在公元前 278 年 2 月逃出郢都以後作的。哀郢說：

“去故鄉而就遠兮，遡江夏以流亡。”

又說：“發郢都而去閭兮，恨荒忽其焉極！”

他稱郢都為“故鄉”，又說“去閭”，——“閭”就是里門，可見他的故鄉，確在郢都城內。

說到“閭”，順便要說到古代貴族的居住情況。在領主封建社會，等級制度森嚴，貴族們在城內居住，自成一個區域，不與工商等平民混雜。楚國有三大貴族，即昭氏、屈氏、景氏，他們聚族而居，特成一區域；因此，他們住的地方被人們稱為“三閭”（三個里門）。後世稱屈原為“三閭大夫”（首見於今本王逸離騷經章句序）就是因為他住在三閭內，也兼管三大貴族的宗族譜牒等事；並不是楚國的“官階”內，有一種“官”叫“三閭大夫”。從屈原的最可靠的作品哀郢，以及他被稱為“三閭大夫”這一點來看，可以相信：屈原的家在楚國京城（郢都）里。

因此，後人說屈原的故鄉在今湖北最西境秭歸縣（此說首始於晉袁崧，今人有信之者），那是錯誤的。我以為秭歸這地方，屈原去過，有他臨時的家，後人便附會說：他是秭歸人。其實那是臨時的家，不是“故鄉”。根據屈原自己的話，才是不可動搖的鐵證。（孫作云）

問：中國歷史課本第二冊第七十二頁“南宋的‘車船’和‘海船桅杆的裝置也有改進’”，二者各是怎样裝置的？如何使用的？（曹縣王樹勛）

答：我國造船業，特別是船上的裝備，到了宋代有很大的進步。

南宋的車船，據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二）中的記載：“湖船……更有車船，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現在按原理推測，車船的裝置應該是船上（大約在船艙兩旁）安有車輪，即用許多支槳輻輳成輪狀。輪子半在水中，用人

力兩足踩它旋轉，好像駕設龍骨水車木架上的轉軸與踏輪（枴木）似的，因此激動水面，使船行加速，達到“其速如飛”的效果。“夢梁錄”所寫的車船，指的是杭州西湖的情況。其次，“宋史”（卷三六五）“岳飛傳”又記載南宋洞庭湖附近楊么的起義軍在洞庭湖中也曾利用車船作戰時說：“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陸游“老學庵筆記”（卷上）說湖北起義軍鍾相也利用過車船作戰。南宋時，除杭州、湖北水上使用車船做載運及戰艦使用外，長江下游水上也出現過車船，如南宋對金采石之戰，“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四）引熊克“中興小曆”說：“敵復來，望見車船，遽却。”由此可見我國在南宋時代，車船的使用是很普遍的。

南宋海船桅杆的裝置也有很大的進步：那時普通海船的主桅高約十丈，頭桅高約八丈，船長十多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據徐兢“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的記載，當時海船桅杆上帆篷的裝置分作布的與篷的兩種，布帆多到五十幅，風正時張布帆，但垂下五分之一使不同風勢相拒，風偏時則張開左右翼兩個利篷，便于隨時張合，符合風勢。大約海上航行正風的機會很少，布帆不及利篷張合隨意，所以用處不及利篷。據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四）的記載：北宋嘉祐年間（1056—1063）蘇州崑山縣造船工人因外國航行商船在海上遇風桅折，飄流停岸不能走，他們即教船上人將桅杆裝在轉軸上面，可以靈活起倒。這可證明當時我國海船上桅杆已能安在轉軸上面，可以隨便起倒，不怕風折，是一種進步的裝備，但那時外國商船上還沒有這種設備，還從我國傳去這種轉軸上裝桅杆的辦法。（程溯洛）

問：人類文明的發源地為什麼都在許多河流旁邊土地肥沃的地方？為什麼不發生在大陸的中部或遠离河流的地方？（嘉興吳福榮）

答：首先，“人類文明的起源”乃歷史上一句特定的語句，是指奴隸制社會開始的人類文化發展的飛躍，以別於所謂“野蠻時代”的原始社會文化。可參閱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第九章“野蠻和文明”。

其次，說“人類文明發源地在許多河流旁邊土地肥沃的地方”，這種提法是不科學的。最古文明的發源地之所以在四大河流域（即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以及黃河流域），根據現在許多人類學者和古史學者的意見，認為西藏、蒙古高原以西，里海以東地帶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群棲息之所，世界其他地區的族部都是先後由這個地帶遷徙去的（參

看賈蘭坡“中國猿人”一書的插圖），在這個最早的人群棲息地帶的周圍，有比較宜於農業生產的河谷，就是四大河流域。並非任何一條有肥沃土地的河流旁邊都成為最古文明的發源地，比如美洲也有許多大河，但印第安人文化發展却遲緩得多。

此外，我們必須注意古時人類活動的地理區域是與人類社會發展階段，即生產力發展的程度分不開的。例如人類處在採集自然食物和狩獵時代，富於天然森林和無數禽獸的地區是當時歷史條件下最好的地區；當人類進入以畜牧為主要生活經濟的階段，則草原地區是最好的地理條件；及至進入農業經濟時代，平原或肥沃的河谷，便成為農業生產者集聚的地區了。而人類文明起源四大河流正是具有這樣的一種條件，即這裡在較低生產力水平之下即能創造高度發展的農業經濟。這裡的土壤是由每年大規模的氾濫沖積而成的，不僅肥沃而且特別鬆軟，完全無須鐵器和複雜的農業技術，就能夠得到豐富的糧食。但是在這裡要發展農業卻需要發展水利，這一方面要求打破閉塞的氏族公社大家聯合起來，另一方面也需要很多的人手，於是氏族制的解體和奴隸制的發展便同時開始了，奴隸制的國家也出現了。因此這些地方遠在鐵器出現以前，甚至在青銅器出現以前，便進入了文明階段，而其他地方的居民則仍然過着原始的生活。（華明）

問：希臘人究從何時移入古代希臘地區？其移入情況怎樣？最早的城市國家斯巴達和雅典各在什麼時候形成的？（濟南劉玉澂）

答：首先應當認為希臘人和歷史上其他民族（或部族）一樣，並不是什麼由“純粹的種族”所構成的。“希臘人”一詞出現很晚，一直到荷馬時代還沒有表示所有希臘人的一個通稱。所以，所謂“希臘民族”（或部族）乃是歷史上形成起來的、由許多不同的部

落融合而成的“民族”。但是關於遠古時代巴爾干半島民族遷徙的問題，到現在還沒有徹底解決，所以各部族相互關係的問題也還不能做具體的說明。

現在通常認為公元前二千年代以前居住在愛琴海諸島和中、南希臘的居民即是希臘史家修昔的德斯所說的卡里亞人、皮拉司吉人和勒勒吉人，他們最初可能是從小亞移來的，克里特文化就是這些人的創造。以後到前十二世紀為止有兩次大的部落遷移。一次是所謂亞該亞人在前一七〇〇年左右的遷移，他們自北希臘的狄撒利亞進入中希臘和南希臘，毀滅了當地的克里特文化中心，土著居民一部被殺，一部與之融合。後來就發展了所謂邁錫尼文化。另一次是所謂多利亞人（或多利安人）在前十二世紀自伊庇魯斯南移，進入中希臘和南希臘，毀滅了邁錫尼文化。以後就開始了所謂荷馬時代。亞該亞人和多利亞人就是所謂希臘人祖先的兩個大部落集團。近代的考古發掘證明，早在公元前三千年代他們就居住在北希臘，處於新石器時代，金屬的利用不過剛剛開始。而氏族部落制度還牢固地保存着。至於他們移動的原因和具體過程卻不能知道。多利亞人移動的原因，大約是由于受到在他們北邊的部落的壓迫所引起的。但是移動的結果，我們決不能想像為原來的居民被屠殺淨絕，而後來的希臘人乃是純種的亞該亞人或多利亞人。可參考捷克學者保羅·奧力味所著“論古代希臘希臘部族的發生和發展問題”（史學譯叢一九五五年第二號）。

斯巴達和雅典自氏族部落進入國家的過程約在前九至八世紀，其國家制度的最後確立則是前七至六世紀。關於這個過程的最初階段，我們還不能做具體的說明，保留下來的只有一些傳說，通過傳說能夠窺見一個大致的輪廓而已。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就根據關於提秀斯的傳說給我們敘述了雅典國家形成的基本輪廓。（華明）

文 史 哲

（一九五六年第五期要目）

- | | |
|---------------------------------------|-------------|
| 批判華崗的“巴甫洛夫學說的哲學基礎”…………… | 呂運明 |
| 批判華崗的“階段發育”的謬論…………… | 陳 機 |
| 通過五代十國到宋初的歷史過程認識唐末農民大起義之更深遠的社會意義…………… | 趙儼生 |
| 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下）…………… | 王仲華 |
| 論游牧民族的宗法封建關係（討論總結）…………… | 蘇聯“歷史問題”編輯部 |
| 論康有為的“托古改制”思想…………… | 李澤厚 |

總發行處：山東青島郵電局

世界歷史參考圖片(四)

文藝復興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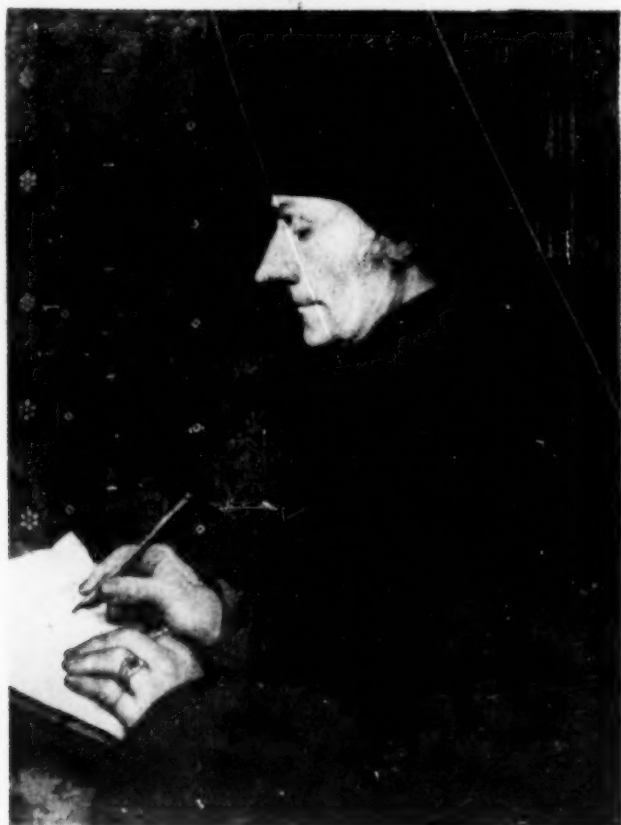
圖一 馬丁·路德画像

德意志克拉那黑(1472—1553)作
(采自德國照片)



圖二 英國女王伊利沙伯画像

英國無名画家作(約1590)
(采自英國照片)



圖三 著名人文主义者伊拉斯瑪画像

德意志小荷尔宾(1497—1543)作
(采自法國照片)



圖四 歌童

荷蘭荷尔(1580—1660)作
(采自德國照片)

群众歌声

(双月刊)

創刊啓事

为了及时地更有计划地供应群众歌咏活动材料，丰富群众文娱生活，天津市群众艺术馆特编辑“群众歌声”双月刊，自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创刊，其主要内容为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及人民现实斗争生活的群众歌曲，及群众喜爱的民歌，翻译歌曲，以及音乐评论、音乐活动消息和有关音乐歌舞演出的照片等。

本刊每逢双月二十五日出版，每期定价 0.08 元，半年三期 0.24 元，全年六期 0.48 元，全国各地邮局新华书店均可订阅。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电部天津邮局发行

新書介紹

怎样做个好干部

任 棧 著

0.22元

本书结合实际情况对有关干部修养方面的问题，如党对干部的关怀与要求，如何正确认识党的干部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政治思想锻炼，加强理论与政策学习，贯彻群众路线，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与改进工作以及提高政治警惕性等作了简明的讲述，并批判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认识，可作为一般干部的自修读物。

怎样做个好社员

青年团天津市委委员会财贸私企部编 . 0.11元

本书结合手工业工人的思想情况与具体事例，说明做一个优秀社员要从以下六方面努力。一、以主人翁的态度从事劳动；二、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技术和文化水平；三、协理事会改善经营管理；四、树立爱护公共财产的优良品质；五、发挥团结、互助互学的精神；六、努力锻炼身体，不断提高健康水平。书中对青年手工业工人的一些不正确思想，作了分析批判。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发行